

# 逃出巴爾幹

保·巴介甫 著

陳翰伯

朱葆光

合譯

# 逃 出 巴 爾 幹

保 陳 朱  
巴 翰 葆  
介 伯 光  
甫 伯 光  
著 譯

中 外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四 年 十 二 月



# 逃 出 巴 爾 幹

著者 保·巴介甫  
譯者 陳翰伯  
發行人 孫伏園  
出版者 中外出版社  
上海 愛多亞路一七二號  
重慶 美專校街九十七號  
北平 西長安街甲二十三號  
東北總經售 今日東北社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國民三十三年六月慶初版  
國民三十四年二月北平再版

# 逃出巴爾幹

巴介甫著

陳翰伯  
朱葆光合譯

## 目錄

譯者序言	一
前言	三
第一章 走入黑暗	七
第二章 德國祕密警察的德萊克斯勒	二〇
第三章 我爲什麼不殺掉希特勒	二八
第四章 德軍的行進	三九
第五章 荷馬住過的地方	四四
第六章 巴爾幹的團結	五九
第七章 鮑里斯末世	六六
第八章 希特勒坦克車之油	七三
第九章 預言家克利浦斯	八三
第十章 美國女間諜	九六

第十一章	救命的司機	一一二
第十二章	史達林建議，希特勒佈置	一一七
第十三章	會議	一二二
第十四章	離奇的故事	一三〇
第十五章	唯有莫斯科知道	一四二
第十六章	「南斯拉夫萬歲」	一四六
第十七章	天空游擊隊	一六三
第十八章	革命的襲擊	一七七
第十九章	蘇妮雅	一八二
第二十章	沒一個德國人活着離開巴爾幹	一九六
第二十一章	無人之地	二〇一
第二十二章	逃出	二一七



## 譯者序言

這本書的作者是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巴介甫 (Michael Parlov)。巴介甫是保加利亞人，因為反對納粹主義和一切法西斯主義被駐保加利亞的德國祕密警察捕入集中營。

巴介甫在這本書裏毫無隱諱地暴露了巴爾幹的真相，說明了現在巴爾幹真相的來源，指出發展的方向。書裏的一切故事都是他親自看到，聽到，或體驗到的鐵一般的事實。這些事實裏有淚，有血，有火，有非人類所能想像的殘酷，有非祕密警察所能消滅的憤怒，有為社會正義與永久和平而不顧生死地奮鬥的男女老幼。

巴介甫用生動的筆調把不怕餓，不怕冷，不怕死，不怕痛苦的男女志士從事自由和解放奮鬥的經歷描繪出來。他在許多動人的故事裏給予讀者關於現在巴爾幹政治與生活的一些明確的知識。

原書是倫敦 O. D. P. 公司出版的。為了節省篇幅，譯者略將冗長的敘述稍予刪節，但故事的發展是絲毫沒有變動的。章次也略有更動。附此一併聲明。

封面裝幀是金風烈先生的設計，這是應該特別感激的。

譯者——一九四四年五月，重慶。

逃 出 巴 爾 幹

三

## 前言

一九四一年夏天，德國進攻俄國的幾個星期以後，幾百頂降落傘從紅軍的飛機上降落在巴爾幹，要在所有巴爾幹各國與佔領軍作戰，並且幫助組織地下的反軸心活動，後來，在那一年，我自己看見過幾位在工作中的跳傘者。我看見他們作戰；看見他們死掉。他們的英雄氣概鼓舞我去記述他們的故事，這些故事形成了本書的一部份。但是他們還有不少事情，比勇敢還稀罕的；他們被一種清楚堅定的理想激勵着，他們就是爲了這個理想作戰，死掉。這些跳傘者並不是俄國人——他們是保加利亞人，克羅特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斯洛文尼亞人。他們在一起作過戰（許多人現在還在作戰），他們的範例奠定了巴爾幹革命的地下團結的基石。依照我的意見，這種地下的團結是有關巴爾幹與東南歐洲的戰爭的最有意義的政治現象。這種團結一定要在整個巴爾幹發生偉大的影響——正如南斯拉夫現在的實際情形（一九四三年春天）所證明的——當和平到來的時候，這種團結也是應該計及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在這本書裏，我提供出在巴爾幹的這些新的，而且是最重要的政治現象，主要的是我自己觀察得來的見解。我企圖以一個記者的眼光，而不是以政治家的眼光觀察他們。我會經努力做到公正，



而不是中立，因為我並不相信中立。中立只是那些拒絕面對着他們自己罪惡結果的人們的庇護所。

在這本書裏，沒有一個人是虛假的，沒有一件事情是幻想的，雖然，遇有必要，許多談話是從我的猜測得來的，這是一本記者的著作，是一本個人經驗的著作。一九四一年三月，當德軍渡過多腦河，從羅馬尼亞到保加利亞，進行對希臘和南斯拉夫攻擊的時候，我自己發現我是索非亞警察廳的目標了。那位盤問我的德國秘密警察解釋着，我是被認為若允准我離開保加利亞，一如我所料及的，是太危險了，而且讓我自由，也是很危險的。自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我曾任倫敦泰晤士報駐索非亞的記者，德國秘密警察加給我的主要罪過是我的「有害的文字」，和「可惡的觀念」，做爲一個新聞記者，我是幫助傳佈了這些。

一年以後，我自由了，而且遠離了巴爾幹的恐怖。這本書也包括那一年——當然是最多事，而且在各方面也是我的生命中最有趣味的一年。我密切地和巴爾幹地下世界保持接觸，我的生活使我和游擊隊接觸，和全歐各地逃來的難民，逃脫遭受活埋的希臘與南斯拉夫軍官，各種非法份子，納粹人口犯子的女犧牲者，最重要的，還有爲巴爾幹團結進行決死鬥爭的巴爾幹聯邦主義者。那可是比生死鬥爭還重要的事情。我參加了一個新世界的誕生，是有關巴爾幹的，是一種生活的新觀念的建立。

我這本書在某種限度以內，雖然是談到了監獄，集中營，德國秘密警察，與警察的交手戰，可

絕對不是一本「恐怖作品」，也不是另外一本「我剛從納粹集中營裏逃出來」的故事。我是敘述我個人的經驗，不過我敘述的方式是聯繫着那些曾經並且正在進行巴爾幹的反納粹戰鬥的人們的經驗的。我的結論只是我個人的見解，也並不代表任何政府的或政治活動的，巴爾幹的或非巴爾幹的，官方的或非官方的，或者是在任何國家的任何政府部門的見解。

由於許多理由，這本書裏提到的許多人的名字，我希望他們還都活着，某些城鎮村莊的名字，以及有關我的亡命的詳情，都曾經是改變了的。我曾經試圖忠實於各個事件的真實結局，但是我的筆記和文件還是在德國秘密警察那裏，我只能依靠我的記憶，所以我希望如有我忽略了或是忘記了的有關任何我所敘述到的政治事件的詳情，我都要請求加以原諒。

米哈益爾 巴介甫。一九四三年三月，倫敦。

逃  
出  
巴  
爾  
幹

六



## 第一章 走入黑暗

「對不住，這樣匆匆忙忙請大家過來，不過事情的確是緊迫……」

英國駐保加利亞公使藍得爾發言的語氣，緩慢而堅決。當他的話頓住時，只有壁爐中的煤炭爆裂聲打破室內的沈寂，火影照射在他那堅定而顯示着勤勞過度 and 緊張的面孔。

「一個英國國民，」他鄭重地繼續說，「同時是本公使館的一個職員，在最神秘的情形之下失蹤了。他是從索非亞坐着東方快車到伊斯坦布爾的旅行中被綁架了去的。他的手提箱還在車中，可是人已毫無踪跡了……」

我們大家都像瘋狂似地速記着，決定不遺漏一個字。顯然這是頂重要的新聞。半小時以前我們接到緊急通知，請到英使館來。這樣匆匆忙忙地把我們召集過來，是有充分理由的。我們在這裏聽到的，是英使關於德國祕密警察第一次公開打擊英國駐保加利亞外交使節事件的陳述——這正是希特勒因擊南斯拉夫前六個星期，也正是他的軍隊從羅馬尼亞越過多腦河南下到巴爾幹的心臟「保證這個半島的和平與確保其中立」的頭一天。那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四的晚間。

我們一共有十幾個人，都是英美報界駐索非亞的代表。其他的外國記者大半都已到貝爾格萊德

和伊斯坦布爾去了，以求不受德國的檢查報道巴爾幹的新聞。這種檢查在第二天就正式開始了。我們和新聞專員倫西曼一起，圍着英使藍得爾坐成一個半圓形。

「關於這個事件，公使可以告訴我們一些詳情嗎？」美聯社的著名軍事記者聖約翰發問道。

「是的，可以。失蹤的人名叫格林維區，他在本星期一坐火車離開索非亞到伊斯坦布爾去。因為是本館的職員，他帶有外交護照和外交簽證。當晚火車一過保加利亞邊境的斯維稜格勒車站，他就不見了，此後誰也沒有看見他。火車開入土耳其國境後，他不在其中。土耳其當局對這一點很有把握。和他同坐這列車的其他英國國民一到伊斯坦布爾後就直接打電報給我，但直到此刻我們百般打聽，都無結果，保加利亞當局聲明完全不知，並向我保證他決不是因為他們的要求而離開火車的。我對他們的解釋不能滿意，我今天已要求謁見內閣總理，並通知他說，他們對這事件見解非常強硬，要求立刻告知格林維區君的下落。」

「關於格林維區本人，你能告訴我們一些消息嗎？」

「他本來是一個俄羅斯人，他入了英國籍已有二十五年了。他在本公使館充任館員也有十五年以上了。」

「他帶了外交公事包或什麼別的文件沒有？」

「不，什麼也沒有。他只是帶着自己的行李旅行。」

「他在公使館裏的職務到底是什麼？」

「他是護照管理員的副手。」

談話繼續了下去，直到我們知道了一切，公使館對於這次神秘事件不幸知道的也不多。公使又宣佈兩件驚人事件，這兩件都是在過去四十八小時以內發生的。保加利亞黑海沿岸主要港口布爾格斯英國領事館的房子，在頭一天晚上被搜查了，保險箱的門被打開了，許多文件被偷走了，再前一天晚上，索非亞公使館護照管理辦公室也被搜查一遍。大門是闖開的，幾張桌子上的抽屜打了開來，公文也被偷走……。

「對於這種搜查和盜竊，你能够加以說明嗎？」

「不，我不能够。我只能告訴你們事實，並且說明我的深深的失望，這種事情會發生在這一國家裏，還和我們維持外交關係呢。」

「公使，你想外交關係還會維持多久呢？」

無疑，這問題是最重要的。

「這完全要看保加利亞政府，」這就是藍得爾先生的簡單答覆。「如果保加利亞政府決定允許德軍開入國內，我當然要向我的政府建議謝絕外交關係。」

「是不是說，如果德軍正式開入保加利亞，英國就和保加利亞政府斷絕外交關係，是不是在羅



馬尼亞的程序不會重演呢？」一個記者問。

「是的。我並不知道德軍開入布加勒斯特以後，英國公使館還要留在那裏的理由。我自己可並不準備在這種屈辱的境況中，還要留在這裏。」

訪問差不多完了。公使和倫西曼顯然很疲倦，很擔心的樣子，我們決定早點走了。

我失望了。這次的訪問無疑的是一件大事，可是我感覺到這是我充當國外記者從索非亞最後發出的一段新聞。單是這一件事情就使我很擔心，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我的工作的確是有趣味的。現在是該完結了。

在疲倦的一天之後，和倫西曼在一起吃飯倒是真正的休息。倫西曼是我遇見過的最友善的英國人之一。一九四〇年索非亞英國公使館派他當新聞專員。他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家，而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是英語國家中最精通巴爾幹和保加利亞歷史的學者之一。他能夠完完全全地用保加利亞語說話和寫作。他還是一個怕羞的人，在大規模的官方集會中，通常的地位是在一間屋子的角落裏，在那裏，沒有人擾亂他，他能很有興趣地觀察屋子裏的圖畫或傢具。他也很謙遜，不肯承認他懂得巴爾幹問題和保加利亞歷史，只有熟悉他的朋友們才知道他到底懂得多少。對人，特別是對待新聞記者，倫西曼是成功的。從一個新聞記者的眼光來看，在德軍抵達之前的幾個月中，他以最大的機

智和效率，把公使館的新聞專員室變成了一家大的新聞社。對於倫西曼的這個位置，只有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就是太晚了！在戰前，駐索非亞的英國公使館並沒有新聞專員，沒有任何新聞或宣傳的工作，在這裏，戈倍爾向保加利亞派出了二百多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新聞記者和宣傳專家，爲「新秩序」舖平道路。在巴爾幹別的國家裏，情形是一樣的。

在戰前的幾年裏，在巴爾幹差不多沒有做過什麼事情用以對抗德方宣傳的影響。法國的宣傳倒真的獲得了不少的成就，特別是在昔日的盟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兩國中，法國的崩潰是一個痛苦的打擊。法國提出了這些國家的期望，可是卻沒有方法去實現，他們怎麼會決定參加爭取歐洲自由的鬥爭呢。英國曾經有意——以有效的支持給予這些國家。但是英國却未曾試圖說服它們，這就是爲什麼在法國失敗之後某些巴爾幹領袖聽戈倍爾的宣傳的理由之一。我並不想掩飾任何巴爾幹傀儡子的罪惡。對於英國的態度，我的惋惜要比責備更多一點。但是，在保加利亞，在南斯拉夫，在羅馬尼亞，對於許多人民，英國只是地圖上的一片粉色的島嶼。它們不能一如英國懂得自己那樣地懂得英國，也不能預見英國的英勇抵抗，因爲它未曾試圖在真正的見解中把它自己告訴它們。

倫西曼是一個老練的主人，在吃飯的時候，從不談起當前的局勢。

十一點以前，我走回家去，當天晚上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辦。我的情報員從多腦河口路斯打來了一個緊急電話。我立刻接過電話來，我接到的消息是糟糕的。那天晚上，德軍開始在多腦河上架起

浮橋開了過來。他們都穿着制服，並不想稍加掩飾。顯然，這個意思就是說他們的公開抵達將要在清晨宣佈。幾分鐘以後，一個當地的新聞記者打電話來告訴我，在索非亞週圍的大路上，德文的指路牌正在加緊趕造中，這個意思就是說德軍期望在次日或星期六開入索非亞。過了一會兒，我又接到一件最重要的情報：已經有了種種預兆——某一高級政府官吏正在準備乘坐飛機立刻離去。所有這些情形只是說明了：保加利亞政府已經決定簽署加入軸心三國公約，總理或外長將要前往德國，進行通常的慶賀，並且向他的新的主子去接受第一次的訓令。僅僅還差一件事情——官方公報。

我坐在辦公桌旁，工作直到兩點。我確信這是最後的電報了。我寫了幾百字當做第一部。我打算清晨再送出新的新聞和情報。我打電話到日內瓦和伯爾尼，但是有人告訴我，因為電話線是被官方佔用了，直到明晨七點以前是不能通話的。這真奇怪，但是再想這些事情，我就太疲倦了，我睡了。

「起來！」

我張開眼睛，本能地又閉了起來；一片可怕的光亮弄瞎了我。我迷惑着要去明白是發生什麼事情了。是夢嗎？

「起來！」



西。

一隻大手從床上掀開了我的被窩。我又張開了眼睛。光亮不在我的臉上，可是我還看不見東西。

「別想抵抗。那是沒有用的。起來！」

我從床上爬起來。

「站着。舉起手來。」

「你們是誰？」我終於問道。

「舉起你的手來！」

我只好服從。

「把燈開亮！」他下令道。

我扭亮床旁的電燈，瞥了一眼桌子上面的鐘，四點過十分。

「穿上衣服！」那個傢伙又下令道。「我再說一遍，不要抵抗。你看看那兩個人的手裏舉着什麼東西。現在，你快點。」

我看了看那兩個舉着手槍的人。我就開始穿衣服，一句話也不說，我想拖延一會，因為我需要時間思考。

「快！快！快！我不是告訴你了嗎，不要浪費時間。」

我也不理他。我能不能逃掉？但是有一個人站在門口，窗戶又太遠，另一人的手槍離開我不到兩碼遠。糟糕了，我想。今天晚上我還睡在家裏，我真是一個傻瓜。我穿好了衣服，鞋子，我問道：

「這是什麼意思？你們是誰？你們要什麼？」

「警察。」那個人簡單地答道。

「那裏的警察？」

「不必多問。」

「你爲什麼半夜三更闖進我的屋子來？」

「這不關你的事。」

「你的警察證件呢？誰讓你們來的？」

「別問這些可笑的問題。來呀，我要搜查房子了。」

「爲什麼？你們的拘票呢？」

「我有口頭訓令。」

「誰的口頭訓令？」

「我的上司。」

「他是誰？」

「我早就告訴你了，不要問可笑的問題！你是想抵抗嗎？」

「是的！上帝知道，是的！」我突然叫道，我都奇怪我自己。

「我不是告訴你了嗎？那是沒有用的。」

「你到底是誰？」

「好吧，我是政治警察局派來的。我有警察總局的命令。」

「要搜查我的房子嗎？」

「是的。」

「還有別的嗎？」

「還要逮捕你。」

「你們不能沒有寫好的命令而來逮捕我。這是非法的。」

「別這麼傻了！昨天我還抓了一個上校呢。是穿着制服的。我們現在有特別訓令和特別權力。你應該知道。」

「告訴我你的名字。給我看看證件。」

「爲什麼？」



「我要知道你到底是誰。」

「好吧。」

他給我看了看警察證，我把他的名字抄了下來。

「你這個傻瓜！」他說，笑了笑。「我的名字對你沒有什麼意思。來吧，快點呀！」

我失望地坐在床上。那兩封打好了的電報放在我面前的床頭櫃上。最後的電報呀！永遠打不去了。

「那是什麼？」那個人看見了桌子上的電報，問道。

「你自己看吧。」我答道。

他拿起來看了看。

「這正是我所要的東西。」這就是他僅有的說明。「喂，放在皮包裏。」

我回過頭來，看見他正對那兩個中間的一個人說話，他手裏拿着皮包。他把手槍放在衣袋裏，打開皮包，把稿子放在裏面，一句話也不說。

「過來，」那個人說，「看看你的桌子。」

我們到鄰室裏去，我的桌子和書籍都在那裏。

「請查查吧！」我答道。當他搜查桌子的時候，我安心地等待着，不動地坐在那裏。他沒有找

到什麼，除了幾份電報之外。有一個抽屜裏都是信件，包括十年以前我在大學時代的情書。是用英文寫的，那個人就非常有興趣起來。

「誰寫來的？」

「我不知道。」

「爲什麼是英文？」

「我不知道。」

我真覺得有趣，想跟他開開玩笑。他把這些情書也裝到皮包裏去了。

他又開始搜查我的書架，看了看那些書本子，現出煩惱的樣子。

屋子裏一共有四百多本書，全部挨本搜查一過，要好幾個鐘頭。顯然，他並不願意全部搜查這些書，他是很急的。我管他呢，我可不忙。

最後，那個人翻看了差不多五十幾本書。

x

x

x

x

x

搜查完了的時候，是清晨六點半了。我在一張文件上簽字說明他們已經辦完了。他們沒收了我的全部的電報，幾本書，幾十封信（包括情書在內），還有一本住址錄。

「現在，走吧！」

「到那裏去？」

「你馬上會知道。」

我穿上大衣。

「拿兩條氈子，幾件襯衣，襪子，鞋。」他說。

我又走進屋裏，那兩個舉着手槍的人跟着我，我準備好要帶走的東西。這個意思就是集中營了。我忽然感覺到恐怖的驚駭了。

「過來，走吧！」

「好！」我答道。

我跟着他走了出去，那兩個帶槍的人在後面跟着我走。外面有一輛汽車，我走了進去。

「到了，出去吧！」

又是那個人。我走了出去。我是在那裏呢？我也沒有功夫看一看，因為我立刻被推進第一個大門裏。黑色的走廊。那兩個人還是跟在我的後面。他們會開槍嗎？我又在想。但是我可沒敢回頭。我是太疲倦了嗎？太淡漠了嗎？太驚恐了嗎？太勇敢了嗎？我還是不知道。

一扇門打開了，我走進一間小屋子裏。兩個人還是跟着我。屋子裏面有一張小辦公桌，一個穿制服的警察坐在那裏。



「打開你的口袋！」他命令了。

我聽從了。

「三層樓，十二號監房。出去吧！」

我離開那間屋子。忽然有一個人從什麼地方出來了。

「跟我走！」我們走進一個狹長的走廊，那裏有五六名持槍的警察。

「十二號監房。」

「在這裏。」

我走過去幾步，一扇鐵門忽然打開了。

「進去！」

在門口我只能看見黑暗，但我還是順從地走了進去。我聽見背後的大門關上了，我本能地閉上了眼睛——太黑暗了。

## 第二章 德國祕密警察的德萊克斯勒

「哎呀，是米哈益爾啊！」

我張開了眼睛，但還是不能看見。

兩隻手臂搖動我的肩膀。我看出了一張瘦瘦的，沒有剃鬚子的臉，一雙閃光的綠眼睛睜視着我的眼睛。那是喬治瓦爾科夫 (George Vokov)，索非亞的新聞記者，前任「午報」編輯——「午報」是索非亞最民主的報紙，是在一九三七年被封閉了的——也是我的很好的朋友。

「告訴我們吧，是怎麼一回事呀！」

我坐在地板上。喬治拿兩塊濕手巾放在我的額上，我覺得鬆了一口氣。漸漸地我習慣黑暗了，看見在這監房裏還有兩個人呢。是一間極小的監房，大約十英尺長，五英尺寬。剛在低矮的屋頂下面，一面牆上有一扇小窗戶。窗戶上糊着黑紙。對面是一扇大鐵門，上面有一個小孔，像是照像機上面的透視鏡似的。僅有的傢具是兩隻瓦缸，放在對面的角落裏。我奇怪那是幹什麼用的。

「那是什麼？」

「你到底說話了，」喬治答道，「我以爲你變成啞巴了呢。那兩隻缸是裝水的。」

另外的那一個人笑了。

「一隻是裝水的——所謂淨水，像我們一樣，你是要喝那種水的。另外一隻……」他笑了，「我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我不能說髒字眼兒。」

我明白了他的笑話。

「這是你第一次被捕嗎？」另外那個人問我。

「是的。」我難爲情地說道。

他說話的時候，我看見他的一條腿是癱在地上的，好像不能行動，是癱瘓了的。他的腳捲在一件濕襪衣裏，顯然這是他的唯一的襪衣，他的胸口是赤裸着的。

「你怎麼了？」

「你是說我的腿嗎？」

「是啊，是怎麼一回事兒？」

喬治對我皺起眉頭來，很快地阻斷了我的話：「不要問這些傻話！前幾天他是從刑房裏出來的。我們今天都要去的。所以最好你聽着我的。」喬治接着說下去，我吓得不再說話了。「你現在是在監獄裏了。是科學的監獄。有兩件事情你必須記牢。第一，你能在這裏活下去——這是在最壞的時候，只要想到——你能在這裏活下去！第二，誰都不要信，絕對不信。現在把新聞



告訴我吧。你看過今天早上的報紙嗎？」

兩天以後，清晨幾點鐘的時候，我們還在睡覺，鐵門突然打開，一個人被踢了進來。他選好監房裏的另外一個角落，把大衣墊成一個捲兒，坐在上面，帶着友誼的微笑脫下他的帽子來。

「諸位，請允許我自己介紹一下吧。我是扒手蔡科。」

「久仰！久仰！」喬治冷淡地回答他。

過了半小時，當喬治決定起來的時候，這位新來的人猜問道：「你們都是政治犯啊，不是嗎？」

「你怎麼知道？」

「喂，你看，我雖不知道你們姓甚名誰，可是我能够知道你們每一個人的職業。我自己曾經進過全國各地的每一個監獄……」

「你是什麼時候被捕的？」喬治接着問下去。

「兩三天以前。」

「到底幾天？」

「不記得了。我也不管。」那小傢伙的臉色陰沉起來。

「你從那一個監房裏來的？」

「就是在這座樓裏。三層，二層，一層，他媽的，擠得像地獄似的。都是政治犯。我一個人也不認識。每天都有幾百個新的。」

「你還記得在監房裏看見過的那些人的名字嗎？」喬治又問。

「這怎麼能夠呢？他們不願意告訴我他們是誰。他們以為我是來偵探他們的。」

喬治漸漸得到了一些他要知道的這座大樓以內幾個人的情報。他送給扒手一支紙烟。他的精神振作起來，開始對我們敘述他的故事。他是賊。他並不覺得羞恥；相反的，他對於這種職業還引以為榮呢。

他對於法律的看法是永遠不要偷盜五千里瓦（保加利亞幣名，五千里瓦約合英幣十鎊。——譯者註。）以上的東西。如果你偷了價值五千里瓦以上的東西，那麼你就要被判徒刑三年或三年以上。這就糟了。五千里瓦以下是很安全的；只有一年或不到一年就行了。這是政府替他花錢的休息日。可是這一回，警察又來麻煩他了。是爲了政治問題，他說。

「我從來沒有咒罵過統治着這個該死的國家的人，」蔡科激動地做着結論，「我還是不罵的。但，法律是法律呀，他們捉住我，就應該根據法律把我送到刑事犯檢察官和法庭那裏，不要把我關在這裏，浪費我的時間。我還是一個政治犯呢！誰知道，他們也許要把我送到一個鄉村裏。」

「那不比監獄好嗎？」我問道。

他奇怪地望着我。「當然我不願意去。我在鄉村裏能幹什麼呢？」

我們笑了起來，同意他的見解。喬治又問：

「這一回你又爲什麼被捕呢？」

「我是政治局勢的一個無辜的犧牲者呀！」

我們大笑起來，他却笑笑，又說：「他們逮捕我是因爲那些該殺的德國人呀。」

十天以前，清晨三點鐘，這正是他這行買賣「最合適的時間」，他正打算進入一間「好屋子」裏去。這座樓房的後門是他的一個女朋友故意沒有下鎖的。（「她跟罪惡一樣地醜惡，但對我却很幫忙。」）打開廚房的門是很容易的，他在客廳裏工作着的時候，絕沒有人聽見他。最後，他的衣袋裏塞滿了戰利品（當然是值五千里瓦以下），用脚尖輕輕走回廚房裏去。再有五分鐘的功夫，他就可以平安地跑出屋子，走向實行燈火管制的大街上。可是，過了一會兒……悲劇來了，這一下子可把他變成了國內政治局勢的真正犧牲者了……

「我剛走到門口，我聽見一種可疑的聲音。有人在外面試着用一把幹鑰把門打開。一定是我的同行！這個時候誰還想從廚房大門偷着進來呢？一定是老黑彼得，我想。他是我的夥計，跟我在同一區域以內工作。我走到碗櫃後面，等着。他媽的，不是老黑彼得！一定是個初出茅廬的，我想。」



他連柵門門都不碰……你猜以後怎麼樣了？」

「我們不知道，還是恭聆雅教吧。」

「最後該死的門給打開了，有三個人闖進廚房裏來！」

「是同行嗎？」

「不是的。他們帶着手電筒走進來了。我看見他們手裏都有手槍。正當他們忙於對着臥室亂嚷嚷的時候，我沿着牆根溜到廚房門口。他們當然沒有看見我。我無聲無息地打開了門……」

「怎麼樣了？」

「『舉起手來！』兩個人叫了起來，把手槍放在我的肋骨上。是該死的警察。」最初他以為這是他的倒霉，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就看出那種情形了。他氣極了。警察不是爲他而來的，是爲了這所房子的主人。主人是一個反對政府的政治家。他在前一會兒還打鼾呢。

警察把他推回到屋子裏去。他們說他企圖逃跑。有一個穿便衣的打了他一耳光。他向他們證明他是誰，是怎麼來到這裏的，可還是白費。他把破抽屜指給他們看，把衣袋翻給他們看。但是那個穿便衣的回駁道：「你不能騙我。我知道你是那個傢伙的從犯。」他忽然回頭看見一個穿着睡衣的人，正在安慰哭泣着的妻子。

最後他們都被帶到警察署來，蔡科懇求釋放出去。刑事庭是很知道他的，他想靠這一層脫開這

件倒霉的事情。但是一點兒也沒有用。十天以來，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拷問他毫無意義的事情。他們說，那個打斷的人曾經寫過反對德國人的傳單，蔡科是散傳單的。他幹什麼要散傳單呢！他是一個賊呀！他可沒有想要改行。前兩天，他們把他的被捕通知給刑事庭。當然刑事庭立刻認出了他。他們說，是「我們這裏的老主顧」，雖說如此，政治部方面還是主張把他留在樓裏，做爲他們的犯人，再進行更進一步的偵察。「你知道，刑事警察都是極好的人。他們從不打入。他們把你抓住了，就把你送到法庭裏去。這才是法律。但是這些政治部的豬獯們呀，才是世界上的敗類呢！」

「是的，他們是的。」喬治粗野地說。

x

x

x

x

x

這位扒手的故事使我們大笑起來，也使我们忘記了憂愁。但是他的故事也幫助我理解了我自己被捕的時候所不能明白的事情——沒有一個人聽見一點聲音，警察就跑到我的臥室裏來了。「他們害怕抵抗，」蔡科說；「如果他們按電鈴，等你打開前門，你就會有時間毀掉你的全部文稿。此外，你還可以拒絕讓他們進來。按照法律，他們是不能夠在夜間動手的。這完全是德國人的辦法，他媽的……」

他一直不停地說到午飯時間，警察打開大門，丟進五塊麵包，他叫了起來，說他可不是政治犯，根據監獄規則，他們是應該多給他一點東西吃的。警察砰然關上大門，他吃了一口就罵一句：

「吃了十天的麵包夾涼水！這是違法的……」

「午飯」之後，他還在罵呢，我們又開始做「下午散步」，這只是在監房裏走來走去半小時。扒手可不情願散步。散步的時候，我們都不說話，這也是他受不了的事情。直到我們開始我們的經常的遊戲的時候，他的精神才重新振作起來。遊戲是拿麵包糰做骰子戲。扒手瘋了。鐵門忽然打開，有人叫我的名字。

「該審你了。」喬法低聲說，「我認識那位來請你的人。祝你幸運吧！」

我走出門去，看了看站在那裏的人。他是一個骯髒的，面色灰白的人，一支香烟屁股貼在嘴唇上。也不拿下來，就粗聲粗氣地叫道：「跟我來！」

我們走到二層樓的一間大廳外面，有許多通到裏面去的門。那個人打開了右手第三門。

我走進這間屋子的第一個印象就是潮溼的烟氣，門對面是兩扇大窗戶。右方有一張大辦公桌，旁邊擺着幾張皮椅子。左方有佔滿一牆的一個大畫架子。兩個人坐在椅子裏，吸着烟。第三個人在屋子裏走來走去。他站住，看看我。我認識這張肥大的臉，頭髮梳得怪可笑的，一小撮灰色的短鬚。

這是德萊克斯勒，德國秘密警察駐保加利亞的頭子德萊克斯勒 (Ulrich Draxler)。



## 第三章 我爲什麼不殺掉希特勒

在納粹新秩序恐怖的國土之外的人們對於這些刑訊的故事，持有下述兩種見解之一。他會斥之爲「戰爭宣傳」，不去相信。或者把它當作是討厭的東西，而加以忽視，就乾脆不去讀它。這是自然的。在這麼許多恐怖的歲月之後，大眾的興趣是遲鈍了，差不多每一個人，戰爭與戰爭的結果對於他們自己是足夠恐怖的了，不必再在書報雜誌裏，更進一步地要求人們的同情了。

由於這種理由，我也不必再討厭地敘述我在德萊克斯勒手中的我自己的經驗了。在納粹集中營裏居住四個月，要比在史達林格勒毫不間歇地作戰四個月是更艱苦的。我想我是有權利這麼說的，我經歷了納粹刑訊機構的每一階段。

在另一方面，我也要警告那些持有「這不過是宣傳」態度的人。納粹地獄是存在着的，沒有一支人類的筆管會把這種恐怖的最小的一部份傳達出來。歷史再也沒有記錄過德國人在波蘭和俄國淪陷區所犯的罪惡更黑暗的事實了。納粹的野蠻比任何最巧妙的宣傳所能發揮的還要兇惡。當我在埃及的時候，會和幾個英國軍官談過話，他們曾在戰爭中看見許多參戰的德國官兵，後來都變成戰俘了，那些英國軍官打算使我相信「德國兵也都是好人」，我可有點發惱了。

德國兵不是好人。古語說，當你力量給予他的時候，你纔能判斷一個人的真正性格。握有力量的納粹，不是別的，就是一隻野獸，雖然他在監獄裏要馴如綿羊的。

德萊克斯勒站在我的面前，我真覺得把他殺掉才痛快，他有禮貌地向我解釋，爲什麼他希望我告訴他一切事情。這就是說我所知道的關於「英美」秘密間諜工作在保加利亞活動的一切事情。我告訴他，我什麼也不知道，這是真的。他回答我，他有權利處我死刑，這也是真的。

德萊克斯勒說保加利亞語，說得很好，但是，他不願意讓當場的另外兩人明白他所說的話，他也常常滑出一些惡劣的英語。他說他可以提出控訴，舉出一些「證據」來支持他的控訴，他又提出我這案子真是無法挽救的，但是……（常常是要「但是」的）。如果我還想保存我的皮肉，還有別的法子可以保證，如果我供了出來，只要懺悔我的罪過，他是可以憐憫我而把我釋放的。

那天下午，我真的煩極了。我要求喝一杯水。德萊克斯勒搖了搖頭，帶着和善的微笑說明他可以不給我一點食物或一杯水的。他的聲調是軟的，差不多是溫柔的，他又說：「你不要那麼倔強地騙你自己了。我們打算讓你說話的時候，你是絕對不能拒絕說話的。」

我從來沒有做過英國或美國の間諜，關於這些事情，我是一概不知。德萊克斯勒可不這麼想。他說登努萬（Donovan）上校是美國全部間諜工作的首領，他說：

「你最後一次看見他的時候，他給過你什麼指令呢？」

關於這一點，我覺得很有趣。登努萬上校曾於一月二十日訪問索非亞，這是在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一年冬季裏，他做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那是人人皆知的巴爾幹和歐洲旅行的一部份。美國公使伊耳(G. H. Fair)曾經把我和所有的外國記者在一起介紹給他，我想我一共看見過他兩次。

他把對於保加利亞的印象以及此次訪問的用意一類的消息告訴給我們，我都把它寫在電報裏了。我把這種情形解釋給德萊克斯勒聽，但還不能使他滿足。他用最暴烈的字句攻擊伊耳。「他也是幹秘密間諜工作的。」他尖聲叫道，「我們完全知道他在維也納的可惡的活動。(伊耳在陶爾佛斯任總理的時候，曾在維也納任美國公使。——作者註。)當時他充任陶爾佛斯與白宮之間的聯絡官，現在他在領導全巴爾幹的美國間諜組織。」

關於伊耳的審問，差不多是一小時。我真奇怪，警察對於美國活動會有這麼大的興趣，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德國或保加利亞都沒有對美作戰呢。

十點——審問是兩點開始的——德萊克斯勒和他的助手都走了。屋子裏只剩下我一個人，還有一個年青的警察，他得到的訓令是監視我，直到我編出我的「懺悔錄」來。他是好人，我要求喝一杯水的時候，他請我喝了一杯咖啡，還有兩塊火腿夾肉麵包。我告訴他我沒有什麼可寫的，他就把我送回監房。





醫院的椅子，有皮帶子連到椅子把手和椅背上。

赤裸在屋子裏的還有十幾個人。四五個穿便衣的來回走着。忽然來了一聲尖叫。我們回頭，看見一個挨餓以致消瘦得不像樣的人，在歇斯迭里地喊着：「把我帶走吧！把我帶走吧！我說。我賭咒我一定說。」

那個人給帶走了，還在叫着。

「瘋了，也許要瘋了。」喬治小聲說。直到此刻我才知道他是站在我的旁邊呢。

電燈熄掉了，但是屋子裏還是微亮的，牆上的小燈還亮着，在半暗中，我看見兩個人抓過一個赤裸的人形，把他帶到一個角落裏去了。那邊很黑，我看不見他，但立刻就又聽見他了。有一種奇怪的聲音，好像是一根棍子在空氣中揮動（後來我才知道這是橡皮鞭子的聲音），他以不可喘息的哭叫做爲回聲。

又有兩個人走到我們這一堆來，又抓走一個赤裸的人形。但是，這個人大叫了一聲，向那兩個人撞去，猛力地撞在一個人的肚子上，把他撞倒了。那個赤裸的人也倒了。我們不能再失掉時機，所有的囚犯都衝了過去，參加鬥爭，……響了兩三聲槍，電燈又亮了，我的回憶只能記得是一陣跟來的喊叫，咒罵，和鬥毆的混亂而已。

x

x

x

x

x

因此，我們總算沒有在牙科試驗室裏遭到傷害。第二天早晨，我們檢查自己，就只好這樣想吧。喬治的眼睛給打腫了，我還好，只是右腿痛得不能走路了。

從我們監房去的另外兩人沒有歸來。他們兩個人被丟進「大寶塔」裏去了。（原文作 *Big Tower*，*Berta* 是一個德國姑娘的名字，她底父親是克虜伯兵工廠的老板。兵工廠出產的巨砲就以「大寶塔」命名，曾在第一次大戰後期發揮威力。——譯者註）「大寶塔」是一隻大爐子的別名，按設在索非亞的警察監獄裏。管理員都是吉普西流氓。人數要看政治情勢而定。如果政府是不得人望，決定腐敗到底的，這批吉普西人就住在平常不執行死刑的警察署裏。名義上，他們是當清道夫的，但這一帶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重現是表示什麼——幹大寶塔的事情。大寶塔是政府創設的，首領是贊科夫（Alexander Tsankov）教授。一九三三年，殺掉總理斯坦包里斯基（Stamboliski），然後在國王鮑里斯，一批軍官，和馬其頓派恐怖主義者的組織的支持之下，宣佈自任總理。有兩位斯坦包里斯基的部下消失在大寶塔的爐口裏了。幸好這種野蠻的制度暫時沒有使用，還是需要德國人來把大寶塔重新搬出來。

隨後幾天以內，我又過幾次受審。有一整個下午是問到給倫敦泰晤士報的電報，要我宣佈情報的來源。我不能出賣我的同業和左翼方面的朋友，他們曾經很幫過我的忙，並且非只一次地供給



我頭等的新聞。最後，他們告訴我，因為在我的文章裏，許多情報是反對德國人的，所以要把我送交德國軍事法庭。我指出我是在保加利亞的國土以內，我提出應受保加利亞法庭裁判。德萊克斯勒又用他的平常的遲鈍的諷刺技巧了：「我們不能再給你這種愉快了。」

第二天早晨，他那位保加利亞助手，祕密政治警察局長巴維爾巴夫洛夫（Barth Parlov）也出席審問了。「爲什麼你認爲英國會打勝仗呢？」他問我。我答道，我的理由很多，而且很複雜。交給巴夫洛夫，他看了一遍，笑了。

「抱歉得很，我們不能替你發表。」

「我比你更抱歉呢。」我反擊他一下，他又把我送回監房了。

最後，一天黃昏，在又一次的受審中，德萊克斯勒從辦公桌上伸過脖子來，向我提出了一個讓我躊躇不安的問題：

「你爲什麼不殺掉希特勒？」

十點三十分，我吃了第三片阿斯匹靈。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最厲害的一次頭痛。這是應該由希特勒負責的。我出席了一次兩小時不停的喊叫比賽——男人，女人，兒童，黑衫的，褐衫的。

「你可以很近的看見希特勒。」我的朋友普立啓兩天以前對我說。

柏林，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日。希特勒下令舉行「世界史上空前最大的檢閱」以慶祝他的五秩大壽。許多政治家，大使，公使等等都被邀來與會。我是巴爾幹記者團中的一員。這是我第一次到柏林，我喜歡這個都市，我決定在慶賀大典結束各代表團各歸本國以後，再在這裏停留兩個星期。

五月，義大利外交部長來到這裏簽訂軸心協定。我在那裏採訪這件新聞。又是許多慶賀，檢閱。我們和李賓特羅甫握手，他比平常像是更凶惡的樣子，和齊亞諾握手，他比平常像是更可笑的樣子。五月底，南斯拉夫的保羅（Pala）親王來了。保加利亞總理喬賽凡諾夫（Georgie Koychev）也在六月間跟着來了。檢閱，慶賀，官方公宴，流言，叫電話，世界的和平，領袖的才智……足够新聞記者頭暈目眩了。

希特勒要親自歡迎南斯拉夫的要人保羅親王，所以普立啓提議要到車站上去「很近地」看希特勒。我們的衣袋裏帶了許可證，必須在領袖（指希特勒）到達車站之前的一小時到達車站。這就是說，我們必須再用一小時，穿行在那衝鋒隊的無盡的警戒綫中。最後，我們終於到了車站了，是在指定時間的五分鐘之前。宣傳部的吉賽先生——他的任務是招待外國記者——已經站在那裏等候我們，他護送我們走進月台。

車站上裝飾着鮮花與國旗。衝鋒隊用繩子攔了起來，那邊集合了幾千名兒童。每一個兒童手裏拿着一面南斯拉夫國旗，和一面德國國旗。後面有一大筐夾肉麵包。兒童從清晨七點就到那裏了，

希特勒要經過的大街上，也排滿了兒童。還有護士和救護車，以防兒童暈倒，實際上暈倒的佔很大一部分。

我自己都差一點兒暈倒，雖然是吃了三片阿斯匹靈。兒童輪班高呼，聲音震耳欲聾。一直喊了一個鐘頭，納粹要人就要到的時候，這聲音就更加像是在地獄裏了。戈倍爾，李賓特羅甫，萊德爾，海斯，牛頓特（第一次穿國社黨制服），布羅什赤，季德爾，希姆萊，最後是戈林，都在那裏，我們這一羣不到二十人的新聞記者正好站在他們的背後，在他們與我們之間，一個人也沒有——沒有衝鋒隊，沒有警察。

希特勒慢慢走到我們面前來，後面跟着十二名衛兵，他舉手答禮。他開始和他的幫手們握手，這簡直是很好看的，這羣納粹流氓僵直地在他面前立正，就像是一位將領檢閱一羣兵士似的。這個短小而無勇的人，一頂大帽子戴得太前了，他那可笑的鬍子，像女人似的蒼白的面容，他的假笑，這個人並無動人之處。當時，我想，這一定是傳說中的希特勒的替身，而不是一個偉大的領袖——自己……

火車進站了。希特勒前往迎接保羅親王，戈林居中介紹。軍樂隊奏南斯拉夫國歌，但是喊聲那麼高大，一個音調也聽不見了。我吃完了我的阿斯匹靈，不能再擠入專給新聞界預備的汽車了，我跟普立啓一同步行，走出車站。



「來這一趟值得嗎？」他問道。

「當然。至少證明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殺掉希特勒並不是不可能的。我自己就會經可能殺掉他。」

普立啓笑了。「爲什麼你不殺呢？你會獲得榮譽。你會被寫在歷史裏……」

「誰知道？或許有這麼一天，我沒有這麼幹，是會惋惜的。」

「不用說，你那篇可能寫出的自述，標題是『我爲什麼殺掉希特勒』。是全世界每一家報紙上的首頁新聞啊。」

「事實上，我只能寫『我爲什麼沒有殺掉希特勒』。這是沒有什麼報紙會把它當做首頁新聞的。」

「我們有許多證據，某天你說過，你沒有殺掉希特勒，很表惋惜。」德萊克斯勒接着說下去，  
「你又說，如果你再有第二次的機會，你就不再失掉良機。」

「你的意思是說，你真的要把這一件事情當做一回事嗎？」

「是的，這是你的腦筋的一種表現。沒有人拿這種事情開玩笑的。」

又一次受審是關於美國伊里諾斯大學的。我的護照上有美國的簽證，他們又在我的文件卷宗裏找到我和伊里諾斯大學的通信——一封電報，上面寫着許可我在該校進入研究院研習新聞學。德萊克斯勒想着在伊里諾斯大學裏一定會有什麼可惡的與神祕的東西。他把那封電報讀了幾遍，末後又問我，我怎麼會在陸地上幻想着我還能去美國，因為潛艇已經不能使船隻通過大西洋了。因此，我們開始談到潛艇，護航隊，以及海軍方面的事情。後來，他又怪叫一聲，咒罵一般美國大學，他說，美國大學都是猶太人辦的，曾經欺騙過德國的威爾遜，不是美國大學教授嗎？

兩天以後，喬治又被送到牙科試驗室裏去了，我還留在那裏。那位扒手又被送回來，住了一晚。我們都很覺得有趣，他對我們講，他怎樣終於「承認」了曾經散發那個打斷的政治家起草的傳單。「我拒絕無限制的挨打。所以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承認。他們要我寫下到底是那一天那個人把傳單交給我的。我就隨便寫了一天，這樣才終止了全部無聊的事情。」

第二天早晨他又被帶出去了。同天晚上，一點左右，喬治和我也被帶了出去。在這麼晚的時候，我們想一定是要到牙科試驗室裏去，但是我們被送到院子裏來了。我們的手都上了銹，我們被推進一輛車子裏去了。

## 第四章 德軍的行進

車子停住了，我們被引進索非亞車站警察署的後院裏去。大約有八十幾個人已經集合在那裏了，全帶着手銬。我們又遠遠地看見了我們的那位老朋友扒手。這是我最後的一次看見他。

我們之中的半數被帶出月台去，裝進一輛德國軍用車，上面寫着「囚犯」。警察在走廊監守着，火車立刻開出車站去了。我們是往南走，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在那裏，是另一所監獄，是集中營，或是死呢。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了普洛夫狄夫。我還是帶着手銬被拉到車站警察監獄中，在那裏，我們還要等候乘下一班車來的那些囚犯們。

我們看見跟我們在一起的警察都在專心地閱讀從他們的衣袋裏掏出來的一本小冊子。這是一本初學者使用的簡易德文文法，附着一小部德保字典，是一本印刷精美的布面袖珍本。以後我又發現國內每一個警察和每一個士兵都有一本德國當局白送的這本書。所有的官吏和學生也都各得一本。當我們還在那個污穢的監房裏的時候，我們又看到另外一種宣傳的技巧。那裏關着十個普洛夫



狄夫的學生，他們會因散發反德傳單，在城內牆上用粉筆寫反德標語而遭逮捕。他們是工人黨的黨員，在被帶進監獄裏來以後，他們還是不肯浪費時間，在牆上寫滿「打倒國王鮑利斯」！「打倒法西斯主義！」「趕走德國人！」喬治和我過去跟他們談話。他們知道喬治是誰。有一個人說：「在德軍開到的最初的十天晚上，我們在城裏放滿了傳單。傳單上只有三四個字，越短越好。長篇大套是不行的。一張傳單應該造成一個很快的印象，必須讓他一看就知道裏面的意思。」

那天早晨十點鐘，一個布爾格斯人，喬治和我被帶出監房，又被推到開往阿森諾夫城的火車上去。阿森諾夫城是在普洛夫狄夫以南十五英里的一個小鎮。我的心沉下去了，我知道在那裏是沒有監獄的，如果當局的意思是必須把我們拘禁在一個村子裏，衛兵是會告訴我們的。

「我們是要到集中營裏去了。」喬治喃喃地說。我打了一個寒顫；此刻之前，集中營還沒有在保加利亞存在。喬治解釋道：

「集中營是德國制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份。集中營是跟着德軍的復興而來的，正如物品供應一樣不可缺少。」

鐵道是和一條大路平行的，從窗子上我們可以看見德國軍隊正在那裏行進，坦克車和各種車輛前腳跟在面隆隆而亡。我們的眼睛所能看到的田野上，擠滿了重砲，坦克車，坦克車之後還有很多

的坦克車。我們把這些東西指向送我們來的警官看：

「英國皇家空軍會把這些東西炸到地獄裏去。」喬治說。

「在希臘的英國皇家空軍是很脆弱的，」警察反駁道，「德國空軍會把它們擊碎。」

這就使我想起，我個人以為英軍參加巴爾幹之役是在此次戰爭中英國最高尚的行動之一，而結果在英美兩國或許還沒有得到充分的讚揚。我認為英軍參加巴爾幹之役在讚揚某些失敗高於勝利的人們的信念中是無上光榮的。

在一九四一年最初的幾個月中，當英國派遣軍隊前往希臘的時候，是沒有勝利的希望支撐着的。勝利是不可能的，在空中，在陸上，在人數和裝備兩方面，德軍有絕對的優勢，他們還保留了很大的一支軍隊，準備在那年夏天進攻俄國。但英國還是派出了全部它所能夠剩下來軍隊——據官方統計，總數是六萬人——去援助希臘，雖然這是符合英國利益的，但也使英國放棄了在利比亞方面的收獲。

「以我們一切可能拿出的力量援助希臘的決定，意味着停止利比亞勝利的進攻和抽調尼羅河畔一大部份軍隊。實際上這就是放棄利比亞，好使我們對希臘踐約，如果將來的歷史家要找一個例子，說明英國怎樣履行約言，他們就要在這裏去找……如果在國與國之間，血才是一種擔保的價

值，那麽後來海軍是註定了要去盡力支付的。」（見英國海軍部出版，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東地中海海戰紀錄「馬爾他以東與蘇彝士以西」一書。——作者註。）這就是那支軍隊，英國人，澳洲人，新西蘭人的一支很小的軍隊在一九四一年四月所打的最力量懸殊的戰役。

四月六日，德軍開入希臘，並非從保加利亞開來的，而是從南斯拉夫的瓦達爾河流域過來的。在那邊，希臘的邊界並沒有良好的防禦，德軍就毫無困難地一直推進到薩羅尼加，同時，希臘人還在北部與保加利亞交界的設防地帶，英勇地抵抗另一線的德軍攻勢。所以，在最初的幾天以內，瓦達爾以東的全部希軍已被截斷，在西部的希軍，就是曾經進入阿爾巴尼亞的那支軍隊也陷入了同樣困難的處境；當他們還在對義軍作戰的時候，他們又在後方被德軍攻擊了。從此以後，整個戰鬥的攻勢就落在英國遠征軍的肩上了。

最後我們到了阿森諾夫城。喬治和我被送到當地警察監獄中，那邊有六個武裝的衛兵準備押送我們，並且要立刻就走。衛兵頗為友善，並且勸我們雇一個騾子，運我們的提包。「要走很遠啊！」有一個人警告我們。他是彼得·齊維科夫，後來變成了我們最可靠的朋友之一。他允許我們在當地的一家小酒館裏來一次最後的盛筵，他就在那兒告訴我們要在那裏去。山上專為「最危險的政治活動分子」建立了一個新的集中營。



我們吃完了，他又喃喃地說：「現在你們可以趕快抽煙。上面是禁止吸煙的。」

當我們穿過叢林，走到一條可以直通集中營的山隘時候，齊維科夫又說道：「你們可不要告訴他們是雇了騾子的，那羣野獸會給我們很多麻煩的。」

「誰是野獸？」

「阿森諾夫城的警察局長。」他說。

我們爬了六個鐘頭的山，一路都無話可說。喬治和我都陷入深思。最後我們聽見遠遠的有狗叫了。

「就在那邊，」齊維科夫說，「在山的那邊。」

我們拿下提包，僱給我們騾子的那個農民回到山谷裏去了。我點起最後一支紙煙，小心謹慎而毫無興緻地噴着煙圈。我們往上走，立刻就看見了電網的尖刺在白雪的圖畫裏顯出不吉利的線條。

## 第五章 荷馬住過的地方

幾隻狗還在野蠻地嗥叫的時候，押送我們的警察把我們帶進了一間像小山舍的屋子。這間屋子有幾百挺步槍靠在牆邊，門口有兩挺機關槍守衛着。「來，來，」喬治開玩笑道，「我們拿槍去打死幾個德國人吧。」齊維科夫大笑起來，但我却感到十分喪氣，十分疲倦。

我們在那間兵器庫裏停了半小時，有五個穿了制服的警察來接替我們的押送員。我們走出去的時候，齊維科夫友誼地對我們眨了眨眼睛。

「脫衣服！」一個新來的命令道，他看見我們的眼睛裏有了恐怖的閃光，就又把囂地說：「別擔心，我們只是要把你們的衣服搜查一下。」

他們差不多搜查了一小時。我們的提包和箱子都被打開，每一件東西，不管是多麼小，都被那五名警察詳細地搜查一過。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澈底的搜查。我們赤裸裸地站在那裏，兩個警察檢查我們的身體，「唯一沒有看過的地方就是我的肚子！」喬治說。

我們穿好了衣服，帶進和剛才那間一樣小的屋子裏去，只有一張桌子和兩三把木椅。牆上掛着兩張大照片；希特勒和國王鮑里斯。一個紅臉的人，有一對遲鈍的眼睛，黑頭髮，但是他的頭頂完

禿光了，穿着警務長的制服，坐在桌子上。旁邊坐着一個極年青的人，穿着德國軍官制服，吸着煙斗。

警務長意義深長地笑了一下，打開從桌子上拿過來的兩個卷宗，看了看裏面的文件，又把它交給了那個德國人。他讀着，也在笑，不時看着我們。

那位警務長衝破了沉寂；「以後你會知道營裏的規則。現在我只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如果你有逃跑的計劃，你最好現在在這裏就拋棄這個念頭。對於想要逃跑的只有一種處罰的辦法。就是一顆子彈打進你的胸口。」

集中營剛好在四千英尺高的比齊佛山山峯的下面，這座山可以俯瞰阿森諾夫城和普洛夫夫狄夫（又名菲利波波利斯）兩城，和色雷斯區域的大部份。這是洛多普山脈的最可愛的地方之一，根據傳說這裏是荷馬誕生的地方。除掉了南斯拉夫的波斯尼亞山脈和阿爾巴尼亞諸山之外，這座山或者是巴爾幹半島上最少有人來訪的區域。最近的鄉村叫做巴齊科佛，是在下面山谷裏。

這個集中營叫做「岡達沃達」（Gonda Voda），是因爲樓房附近的一座樹林裏從山上流下來的閃爍泉水得名的。在各種斯拉夫系的語言中，沃達就是水；根據神話，岡達是「從前」住在那裏的一個勇敢優秀的牧羊人的名字。他並非生來就是牧羊人的，而是一個流亡出來的王子。他的父親，



一個強盛王國的無情統治者，曾經下令要處他死刑。因為這個戀愛了一個美麗的農村姑娘的岡達，拒絕和他父親爲他挑選的一個醜陋的公主結婚。所以，岡達逃了出來，住在洛多普山的荒野森林裏，他就在那裏做了牧羊人。他吹出來的牧笛的音調是很美麗的，可也是十分憂傷的，因為這是他的心聲。他不能忘掉他的美麗的農村姑娘。他坐在一塊石頭上，吹着笛子，看着羊羣和平地在他身旁輕擦過去。有一天，他是太高興了，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流了出來，流下兩頰，掉在石頭旁邊的草地上。這些眼淚就是岡達泉裏的奇怪的泉水。王子死了，可是他的眼淚在他死後却永遠永遠地活下去了……

當然，我們在營裏的時候，我們嘗到的唯一的好東西就是岡達的眼淚。我們的午飯和晚飯只是一碟子水豆湯，兩塊薄麵包。早上只有麵包和熱水。

比食物更糟的是屈辱的生活——不用說還是德國的制度。六點三十分，十二點三十分，又在晚上六點三十分，營裏搖起鈴來。囚犯都到院子裏來聽候點名，然後我們到「食堂」裏去——就是有兩顆老松遮住的院子的一角。值班警察用桶子提出來，一桶是十二個囚犯的。然後我們就趕快把湯喝下去，因為天氣太冷了，不然，我們站在那裏，就會被凍僵。爲了好奇，我看看錶，到底多久纔能吃完午飯。從「開始」的命令，到「停止」的命令，平均是五十秒到七十秒。

杜斯妥耶夫斯基解說人是「最會適應一切事情的一種動物」。我剛到營裏的時候，我常常想到

他的句子。組織幾個人到警察住的樓裏去偷一兩塊麵包，這些都變成了比歐洲的戰爭與和平還要無限重要的問題。偷幾塊劈柴來燒火是每天的重要的目的，好像也值得冒警察的鞭子，甚至吃他一顆子彈。

我們的宿舍是在大樓裏專爲囚犯劃出來一間正方的大屋子。我們睡在地板上，每人只分給三英尺的地方做爲睡眠之用。夏天是不可忍受的，冬天倒還有點好處——不太冷了。窗戶造得很不好，風會把雪颳進屋子裏來。我想用襪子，手巾堵住空隙，但風又是常常獲勝。我們請求拿點報紙或紙張來堵住，但這是違反營中規則的：報紙，不管多舊，完全禁止，任何紙張也是如此。

喬治和我來到集中營的時候，只有四十七個囚犯。當天黃昏又來了囚犯，這樣我們就成爲「最初的五十名」了。四月初，數目加到一百，馬上是二百，三百，五百名了。五月底，我們共有六百人。八月底，當集中營被一支游擊隊攻擊着的時候，裏面已經有囚犯一千名以上了。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捷克人，俄羅斯人，猶太人。囚犯們事實上正是一個國際聯盟的縮影，……稍爲不同的，就是我們大家都能諧和地生活在一起。甚至赤俄和白俄，在食物與溫暖的共同尋求中都忘記了他們的思想的論爭。

營裏的長者——我們管他叫做聖彼得，是一個八十六歲的挪威人。他的名字是漢斯吉爾梅登，

他說的俄國話，法國話，德國話，英國話，和他說挪威話一樣好。在上次大戰之前，他曾在諾佛羅西斯克任一家英國運輸公司的代表。俄國革命以後他住在保加利亞黑海港口的瓦爾納城，以後又在那裏當挪威領事。他的那所在海邊上的大房子，同時是領事館和他的辦公室，不幸是瓦爾納城的最好的房子之一，因此德國人自然要把那所房子佔去，就把他，他的妻子，他的姪子，還有一個六十歲的俄國老祕書都送到集中營裏來了。這個俄國人是很有趣的。他還相信帝制的俄國。他是激烈的反德的，和大部份在巴爾幹，特別是在貝爾格萊德的白俄不同，在那裏，這些白俄對於比較重大的事情完全盲目不知，他們充當第五縱隊，做出了對於曾經無限制地款待過他們的國家不可名狀的損害。但所有在我們營裏的白俄確實都是和白色白俄（親德的）相反的赤色白俄。他們並不歡喜布爾雪維克，但是如果你膽敢對他說納粹的德國可能擊敗共產主義的俄國，他就會極厭惡地譏諷你。根據他們的意見，俄國兵士就是俄國兵士，是無限地超越德軍的，至於他的制服上是有顆紅星或一塊帝制時代的徽章，那倒是次要的。

營裏的精神正和大家的種族一樣，是國際性的。爲了方便，囚犯不是根據國籍分組的，而是根據了大家的定讞的，我認爲這是一種進步的分化方法。因此，我們的宿舍就叫做「貴族院」，因爲我們大家都是親英的。往下一個宿舍是「赤色大廳」，工人黨的黨員都住在那裏。往下是「吉普西人總部」，關着所有各種混雜份子，「部長室」裏面住着各種大人人物，從前的部長，高級官吏，外



交官，政黨領袖。在別的樓裏也是同樣的分割的，唯一非政治犯的宿舍叫做「大蝨子宮」，官是不大的，但却有窩藏全集中營最大蝨子的榮譽。

四月中，當外面的朋友得到允許能把食物包送進來的時候，空氣弄得非常激憤。在幾百名囚犯中，只有二三十人能够經常收到食物包，當然這也就造成了供應品分配的極大的不平等。因此劫奪食物的事情就發生了。幾次的劫奪都報告給警務長了，他差不多只是聳聳肩膀，並且說明他從頭到尾就反對把食物包送進來。

觀察人類監獄生活的效果，真把我嚇壞了。自我犧牲與自私自利，無情，心地與性格的高尚，殘酷與理想時時是在交替着。人在最壞的物質環境中，在沒有法律，沒有社會公斷足以約束他的本能的時候，在這些本能成爲他唯一的防禦武器的時候，人性的真實方面就顯露出來了。我相信這是真的。

有幾個人精神錯亂了。我的一個老朋友，一個新聞記者，陷入一種完全瘋狂的狀態中，表現的形式就是對於犯罪有極尖銳的感覺，雖然跟我一樣，他的被捕也是沒有任何合法根據的，他認爲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他想他是馬上應該被槍斃的，並且認爲多過一天就是人家給他的特別憐憫。他會坐在那裏幾個鐘頭不動地幻想等候劊子手把他帶上絞架去。最後他被送進瘋人院裏去了。

有些人瘋狂地信起宗教來，有些人開始留起鬍子來。

有一個人給警務長當情報員——四個月以來我只發現了一個。他是一個可疑的傢伙。他曾經學過英文，上帝才知道他是在那裏學的，他曾經在索非亞給一個美國記者當過幾個月的助手。他從來不聽任何人談話，但是他却常常什麼事情都知道——甚至連戰爭什麼時候結束，怎樣結束都知道。他和那些得到食物包的囚犯們特別友善。他是陰險詭詐，在各種方面令人討厭的東西。在他被釋之後，他公開地變成了德國的特務，在索非亞警察局裏當起情報員來了。他的名字是亞涅夫，現在他大概是到地獄裏去了，因為據我所知有些地下運動的份子曾經決定把他幹掉。就是在營裏，一天晚上他也曾經遭過痛打，我們宿舍裏的人都參加了。有人告訴這是一種故意的設計，是用在全世界監獄情報員身上的古舊的辦法——用一塊線毯蓋住那個人的頭：這一個屋子的所有的囚犯都要參加毆打，這樣才不會把責任加在某個人的身上。

提到了我們的實際工作，關於此點，我們對警務長贏得了最有趣的勝利。我們每天工作九小時——從七點三十分到十二點，再從一點三十分到六點——是在集中營附近的山路上。由於嚴寒，不只對於我們是不愉快的，對於手持刺刀必須監視我們的那羣不幸的警察也是一樣的。要把山路上的石頭砍下去，我們只有普通的鍬子和鏟子來辦這一件工作！我們決定去訴訴苦，選出了一個代表團

去和警務長商議。代表團指出國際日內瓦勞工協定曾經規定工作日爲八小時，所以我們工作八小時以上是非法的。我們大爲驚奇。警務長同意了。他還告訴我們，幾年以前，他還是一名普通警察的時候，曾經處罰強迫工人工作八小時以上的人。因此，由於法律，我們少做了一小時額外的可憐的法律呀！法律上還說着任何人未經審訊不得下獄，但是我們所得到的好處，只是關於工作時間的一點。

警務長決不是集中營的真正的頭子。一位隱匿在幕後的德國少校每天都在所謂參觀的名義下來一次集中營。保加利亞在名義上還是一個獨立國，還只是德國的盟邦，所以不能用一個德國人公開地充當集中營負責人，那位少校只是一個「參觀者」，是警務長私人的朋友而已。

除了在德國軍用庫房，兵營，和軍火庫週圍的軍事區域之外，這種德國式的統治制度在全國各地都是一樣的。例如，沒有一個德國人在索非亞警察局佔有正式的位置。他們只是……友誼的顧問而已。德萊克斯勒自己只是索非亞「德國納粹黨主席」，再也沒有別的了。在每一個城市裏，特別是在比較重要的中心，那些德國行政官，德國司令官都有大批聯絡官，因此他們對於保加利亞行政方面的控制還是間接的，非正式的。

③ 少校來的時候常常帶着兵士。他和警務長談話的時候，兵士就在營裏散步，也和我們談話。這原來是不許的，但沒有人理會那一套，我們的警察也常常參加談話。懂得德語的囚犯就當翻譯。許



多駐紮在城裏的兵士是從捷克蘇台德區來的。我極想知道這些人的態度，他們僅僅是在過去兩年中才直接受到納粹的管制。喬治懂得一點捷克話，他又是一個捷克民族的讚仰者，他坦白地和他們談話，我顫抖地想着談話的後果。

「我痛恨你們，」他對他們說，「我整個靈魂都痛恨你們。你們今天是在這裏，明天就會在巴爾幹某地死掉。或者，如果你們還能在巴爾幹活下去，你們就會死在俄國。那就是你們那位發瘋的領袖把你們送去遭受屠殺的地方。」

這些蘇台德人的反應是有趣的。他們不是納粹黨員，只是單純的兵士。他們完全誠摯地相信德國是會打勝的，等德國打勝以後，他們就會有富饒的捷克土地。捷克人就要被送到別處去。這種說法使我和喬治都極爲氣憤。他們不是百分之百的納粹，但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德國人，所以他們願意德國掌握世界霸權。

我們和外界沒有任何交通，報紙是絕對禁止的，我們所得到的唯一的消息是新囚犯帶來的。三月底，送進來二十幾名兵士，三名下士，兩名軍官，他們給我們帶來了極受歡迎的消息，說是三月二十七日西莫維克 (Simovic) 將軍在貝爾格萊德舉行政變了。我們都想這是可能的，現在南斯拉夫一定是參加同盟國了，德國人一定是被趕出保加利亞了。這些無根據的謠言都開始傳佈起來。又

一批新來的人告訴我們索非亞政府已被推翻，國王鮑里斯已經逃到德國去了，軍人聯盟已經宣佈成立共和國。但是到了四月，我們的希望都幻滅了，新囚犯的數目突然增加了幾百人。三座大樓的每一間屋子都擠滿了人，警察增加到一百五十名了。

送進來的那二十幾名兵士真讓警務長煩惱不堪了。他們被捕的時候還穿着制服呢，因為他們有「反對國家」的觀念才被特別政治警察抓進來的。顯然現在警察已經有新的權力，比軍隊還有勢力了。當警務長威嚇他們，說是要把他們禁閉起來的時候，他們回答道，如果他敢碰他們，他們就動武。他下令說是除了麵包以外什麼東西也不給他們，他們乾脆用武力搶來一桶湯，並且說要把警務長弄死。警務長大為恐慌，他們不能鼓勵別的囚犯起來反對他們，於是他給了他們若干特權。

離我們五英里遠的地方有一座婦女營。裏面有從全國各地抓來的青年婦女三十名，婦女勞工協會區部領袖，有六名大學女生，曾在索非亞大學課堂裏發表反德演說，還有二十幾名女孩子，她們差不多完全是無辜的，也不關心政治，她們只是某些反政府的政治家的女朋友而已，幾名前任部長和軍官的妻子，還有六名妓女，她們的政治思想在某種方面警察認為是可疑的，另有十五名婦女是索非亞外交界方面的；同盟國外交官的情婦。

不用說我們是從來沒有看見過婦女營的，但是我們從警察那裏知道那邊一切的事情，許多警察

也在那邊值班。這些純樸的警察都是青年農民，這個婦女營對於他們實在是他們生活中最值得興奮的事情了。他們的眼睛簡直要從腦袋裏跳出來，看看這麼美艷，時髦，和赤裸的腿。（當春天到來的時候，女囚犯都穿起短褲來，）但是，最後，當這羣婦女決定實行日光浴的時候，對於那些警察簡直是太妙了。這些女囚犯向婦女營的指揮官提出了一件書面抗議，因此，日光浴也遭到禁止了。

集中營裏大部份的囚犯是保加利亞人。其次是希臘人。他們大部份是來自保加利亞黑海沿岸各城市的，他們的家族在那裏已經住了幾個世紀了。我以濃厚的興趣觀察着這些希臘囚犯，我又以更濃厚的興趣觀察着他們和保加利亞人的關係。我和他們相處四個月，日後在保加利亞以及保人佔領下的希臘和希臘人接觸的結果，關於希臘問題我得出了一個不平常的結論，這是巴爾幹半島上最難解決的問題，所有巴爾幹問題專家是會同意我的結論的，也許羅馬尼亞和匈牙利關於特琅西里瓦尼亞的問題是一個可能的例外。

我認為如果我們從正確的觀念去觀察巴爾幹問題，這個最難解決的問題是不會存在的。要說在巴爾幹半島上是住着五六種不同的民族，他們唯一的打算，就是一有機會就砍斷別人的喉管，這種觀念是不對的。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歷史事件都證明了這些民族並不是相互憎惡，而是相互尊敬的。他們的主要的意志是和平相處。



保加利亞人最初來到巴爾幹半島是在第七世紀從伏爾加河沿岸遷來的。和那些較早來到這裏的其他斯拉夫民族不斷地跟拜然廷 (Byzantium) 王室的帝王作戰。但是，第五世紀時土耳其人征服了巴爾幹各國，確保內部的和平達三世紀之久。雖然土耳其政府是很落後的，也不會有個誠實的歷史家會否認土耳其對於他們統治着的民族表現了值得欽仰的寬容，並且允許他們沿着他們自己的路綫，在他們自己的文化與經濟生活的基礎以內去向前發展。最活躍最有進取心的是希臘人，他們馬上變成了全土耳其帝國裏的商人。他們是島民，是水手，他們控制了海上交通與商務。因此他們就散住在整個地中海東部海岸，直到今天，在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甚至在俄國的許多區域中，大多數的沿海居民都是希臘種族。

在十九世紀，巴爾幹各國一個跟着一個地從土耳其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了。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偉大時代，一般人都相信，某一民族能够揮動旗幟，在一塊國土上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它未來的昌盛與快樂纔能確保。我希望二十世紀一定會證明這種信念實在是一種妄想。也許最好的例子是蘇聯提供的。不同民族的兵士在共同理想和共同利益之上聯合起來，併肩擊退了侵略者。

在岡達沃達的納粹集中營給了我一種客觀的教訓去證明此事。在這裏，我看見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友好地一起工作。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下旬，當這個集中營被游擊隊攻擊的時候，俄羅斯人，

希臘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以同樣的英勇對德人控制中的保加利亞警察作戰，俄羅斯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爲了共同的鬥爭在一起死去。

但是，爲了什麼會使每一個希臘人痛恨所有的保加利亞人，每一個保加利亞人想扼死所有的希臘人呢？就是爲了二百英里長，平均五十英里寬的一片土地，這片土地是在愛琴海北岸，東面是馬里薩河，西面是斯特魯馬河。這片區域的北疆就是洛多普山。直到一九一二年，這片土地是屬於土耳其人的。一九一三年以後，在馬里薩河和米斯塔河之間的東半部屬於保加利亞，在米斯塔河與斯特魯馬河之間的西半部屬於希臘。一九一九年，保加利亞喪失了它那半部，是協約國劃給希臘的。現在無疑的這片區域上大多數的人口是希臘人。一九一三年以前，大多數人口並不是希臘人；這也是真的。也不是保加利亞人，而是土耳其人。但，就是在那個時候，住在各港口的希臘人倒不在少數，土耳其人主要的是住在城市裏，保加利亞人散居在村中與山上。

這一片土地是國王鮑里斯領土修訂計劃的第一條，也是保加利亞全國所謂愛國團體大聲呼喊着的一片土地。這一片愛琴海岸的土地是保加利亞唯一的出海口，是保加利亞南部的自然海港，所有的公路都是通往愛琴海的。這個理由是很够響亮的。不只是從經濟方面去看，就是從普通常識方面去看，在保加利亞南邊的，巴爾幹最富饒的區域之一的色雷斯沃土若是沒有通海口，似乎是很荒唐的。但是不是就說這片愛琴海邊的土地必須組織在保加利亞國家以內呢？

在我看來，我不這麼想。我的理由就是任何一個觀察家的普通常識的理由，這些觀察家都認為巴爾幹半島應該是一個經濟的與地理的單位，而不是一個棋盤，那上邊的不幸的棋子每隔十年或二十年就要被推來推去。

希臘人是巴爾幹的水手。幾世紀以來，他們都住在巴爾幹的東部海岸。幾世紀以來，希臘人都是有志航海的，而南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都是巴爾幹的農民，牧羊人，和小城市的手工業者。這是自然給他們決定的。不能單是因為保加利亞人的利益需要海上貿易就把保加利亞人置入一個水手的國家裏去，同樣地不能只是因為希臘的利益要求希臘須在農業上不倚賴隣國而把希臘人變為農民，這種試驗是注定要失敗的，爲了兩國的利益，兩國必須合作。水手必須還當水手，因為這是他們的職業，農民必須耕種土地，因爲土地是他們的。他們的兩種生活方式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的。希臘在愛琴海北岸的港口的內陸保加利亞南部還是對這些港口採取封鎖的辦法，這些港口是不會有真正繁榮的。如果通往愛琴海上的自然出海口永遠被剝奪不得使用，保加利亞南岸商業每年都會遭受很大的損失。在這種不知不覺的情形中，遭受痛苦的是兩方面的人民。他們還要遭受痛苦。直到廢除這種人爲疆界的普通常識獲勝的一天爲止。

悲觀主義者否認巴爾幹各民族人民和平相處是可能的。我認爲各族人民自己能够並且一定會作到的。倘若得到機會人民是和近視的統治者不一樣。如果人民不能得到這種機會，他們是會去找的，



這就是要流血了。如果我們還是以戰前自滿的態度去對付巴爾幹問題——實際上歐洲大陸上的所有的問題也都是同樣的，我們就要面對一種恐怖的革命高潮了，這革命會盪除一切人爲的疆界。

## 第六章 巴爾幹的團結

巴爾幹團結的觀念不是新鮮的。最初懷抱這種觀念的是十九世紀的巴爾幹的革命份子——塞爾維亞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他們清楚地看見如果半島的經濟與政治的平衡能够保存，在土耳其統治下的團結是必須維持的。不幸，巴爾幹各族人民不是在同時完全獲得解放的。是一區一區漸漸獲得解放的，因此，巴爾幹的團結就遭受危險了。

巴爾幹的悲劇就是這個半島常常被強國用來當做棋盤，在上面玩他們的強權政治的消遣。巴爾幹國家自己從來未把他們的力量團結起來去抵抗外來的危險，外來的鼓動使他們消損自己的實力自相爭鬥。事實上，這些內部的戰爭就是強國之間紛爭的預演而已。

我在這兒強調的巴爾幹團結和巴爾幹聯合的觀念已經又成了不只是對巴爾幹而且是對歐洲，結果甚至於是對全世界的一種重要東西了。這次戰爭確實教訓了我們「和平是不可分割的」，是集體的，與全世界有關的戰爭的陰影，或是戰爭的威脅一旦降落到地球的最遼遠的一角，中立的行動，孤立主義，或者是在「綏靖」掩護下的投降都不能阻止黑暗的擴展了。

巴爾幹國家關於巴爾幹團結所做的最近的一次最嚴重的試圖是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的一九一二年的同盟。在西歐，沒有一個國家相信這些弱而不重要的國家居然敢跟一個強國土耳其作戰。但是，當保加利亞軍隊在三個禮拜的期間，在色雷斯作戰，一直到達君士坦丁的大門的時候，並且當塞爾維亞人和希臘人在馬其頓粉碎了土耳其的抵抗的時候，世界才承認了巴爾幹同盟的力量，這個同盟在一九一三年也通過倫敦協定而予以承認了。

不幸，這次巴爾幹團結的勝利是短命的。錯誤主要是由於奧地利。維也納外交部用了幾十年的工夫力圖挫敗巴爾幹國際團結的努力。一九一三年，奧國與德國的外交勾結，共同努力勸導保加利亞斐迪南王(Ferdinand)對塞爾維亞和希臘交戰了。這是一八八五年的重演，那年，奧國驅使塞爾維亞的米蘭王(Milan)反抗保加利亞，開始了塞保戰爭。一八八五年，塞爾維亞人民猛烈地反對國王的政策，國王不是別的，只是奧國的代理人。塞爾維亞軍被擊退而且失敗了。一九一三年，保加利亞的斐迪南王是更加背信棄約了，他也被擊退而且失敗了。一八八五年反塞爾維亞人的外力和一九一三年的反保加利亞人的外力挑起了兩國人民之間的流血。哈利遜(H. D. Harrison)是一個關於南斯拉夫問題消息靈通的英國人，在他的著作「南斯拉夫的靈魂」裏正確地指出「塞爾維亞農民是深深地關心保加利亞農民的，他們是把保加利亞農民當做兄弟的。」保加利亞人對於塞爾維亞人也是感同的。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雙方都受了政府互不信任政策的痛苦，至於希臘人和羅馬尼



亞人就不必說了。

直到上次大戰以後，那些大聲宣揚這種理由的呼聲還是從那些國家裏發出來的，這些國家的從前的統治者對於巴爾幹的破裂是要負責的。這種呼聲是來自斯丹包里斯基 (Alexander Sarrbhoily) 的，他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三年是保加利亞的總理。

斯丹包里斯基堅決地相信巴爾幹各國應該形成一個大聯邦，專心致志地合作，爲了和平與國際諒解而工作。一九一九年，當他任總理兼任保加利亞出席和會代表的時候，他簽訂了尼里條約 (Treaty of neutrality)，他向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希臘的總理發致私函，表白他的友誼，並且建議要忘掉宿仇，保證他的國家在誠懇的合作中忠實地和他們共同工作。但他不是一個夢想家，他都知道他的理想不是在一夜之間就能成功的。依照他的意見，第一步是建立所有的南方斯拉夫人的聯盟。早在一九一〇年，他創造了 'Yugoslav' 這個字眼（意思就是南斯拉夫），做爲象徵所有的南方斯拉夫民族聯盟的名詞。

一九二三年三月，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兩國的代表在尼西 (Nis) 簽訂協定，在這裏，未來的完全合作的基石就奠定了。斯丹包里斯基對一個朋友說：「再給我幾年的功夫，我就可以拆毀塞爾維亞人與我們之間的現存疆界了。」

他僅只需要幾年的功夫，南方斯拉夫兄弟之邦的巨廈就可以建造起來了。但是，這種工作

也非需要他不可，不幸一九二三年，他就下台了。

斯丹包里斯基之死把巴爾幹友誼之鐘又向後倒撥了幾年。在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的歷屆政府廢除了斯丹包里斯基的建設性的外交政策。這件事情在南斯拉夫造成了不利的反響，當貝爾格萊德與索非亞只是以猜疑互相連繫着的時候，關於安定巴爾幹的外交努力就不能成功了，因為南方斯拉夫人形成了巴爾幹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他們所佔住的區域在戰略上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因為貝爾格萊德和索非亞之間的互不信任，才使形成巴爾幹聯盟的第二次嚴重的試圖終歸失敗了，這是說一九三九年南斯拉夫，希臘，羅馬尼亞，和土耳其在雅典簽訂的巴爾幹公約。因為沒有保加利亞參加，這個巴爾幹公約在地理上是背理的，巴爾幹國家中最富於巴爾幹特質的國家並不包括在內。同樣在政治上也是背理的，因為這些巴爾幹國家互相保證了它們的巴爾幹邊境，這就差不多是說它們是保證它們內部的邊境——就是它們與保加利亞的邊境。因此，這個雅典巴爾幹公約是個傑出的反保加利亞的公約。

這樣，國王鮑里斯的政府對於巴爾幹公約的觀念採取對立的態度得到了諒解。

巴爾幹團結的一切努力在過去五十年中都遭到失敗的另一原因，是因為解決巴爾幹問題的企圖是在這種態度中的，它反把困難複雜化了，擴大了，因此招致了外國——非巴爾幹——干涉的不幸

約束。巴爾幹的問題被看做是一個巴爾幹國家與另一個巴爾幹國家之間的獨立問題了，這些問題是只能在整個巴爾幹方面予以解決的。這些問題必須在巴爾幹利益的一般路線上予以解決的。現在，我可以靜坐下來寫一整本關於馬其頓問題的大書，例如，可以拿統計，以及歷史與地理的論斷證明馬其頓是屬於保加利亞的。同樣毫不費力地，我還能使用那些同樣的論斷，我可以製造另一本同樣篇幅的大書，證明馬其頓是屬於塞爾維亞的。這並不是說爲了要達到妥協，就把馬其頓分做兩部，局部的滿足保加利亞人與塞爾維亞人的要求。不能認爲馬其頓是可以換過來換過去屬於兩個巴爾幹國家之一的一塊領土，而應該是屬於住在那裏的所有各民族的巴爾幹的領土——是希臘人的，阿爾巴尼亞人的，羅馬尼亞人的，土耳其人的，以及保加利亞人的。

在任何巴爾幹國家之中並沒有清楚的地理邊界。只有巴爾幹半島當做一個整體纔能算做是一個很好的確定了的地理單位。在人種方面，位置是更不確定的。沒有一個專家，無論多麼聰明和有學問，能够在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之間，在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之間，在保加利亞與希臘之間詳細地劃出一條「民族的」疆界。甚至在多腦河方面，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之間構成了一條很好的自然疆界，也沒有把羅馬尼亞人完全從保加利亞人那裏分割出來；有十萬以上的羅馬尼亞人是在保加利亞方面，又有十萬以上的保加利亞人是在羅馬尼亞方面，墨索里尼曾經把希臘西北部放在他的阿爾巴尼亞被保護國中，在那塊土地上，人口主要的是阿爾巴尼亞人。在另一方面，許多希臘人也要求



把整個阿爾巴尼亞南部當做希臘的領土。那一方面對呢？兩方面都不對。在希臘，有幾個區域裏的多數人口是阿爾巴尼亞人，在阿爾巴尼亞，有幾個區域裏的多數人口是希臘人。在所有糾紛很多的巴爾幹領土上，都是這樣的。

沒有一個巴爾幹問題可以引入舊式的民族主義的宿仇中而能得到解決，這好像是很奇怪的——在納粹暴政的這幾年之中，因為巴爾幹各族人民自己建立了名符其實的巴爾幹聯盟，再有這種企圖是一定要失敗的。這是左翼的力量促成的，說得更明確一點，這就是在英美兩國被誤稱為「共產黨」的力量。在巴爾幹各地，我看見過他們在工作。當然，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趕走納粹侵略者。但這還不够。對於將來更有意義的是他們關於整個巴爾幹問題的態度是正確的這個事實。他們認為巴爾幹的政治與經濟的團結是不可分割的，他們的目標是建立巴爾幹聯盟之上。這就是當時從我的觀察中得來的結論，自此以後，許多事件都證明了這個結論。

特別是南斯拉夫，現在不只是苦于德國的殘暴，而且還苦於嚴重的內戰。左翼的力量，就是英美報紙稱做是游擊隊的，正在日益壯大，依照我的意見，除非他們會被一支強大的外國軍隊粉碎，他們一定會是南斯拉夫未來的主宰。他們已經有了俄國的支持。在保加利亞，只有「共產黨」才是把有效的和有組織的抵抗加諸德國人及其傀儡的唯一的力量。在希臘北部，情形也是一樣的，無疑

的，在其餘希臘各地存在着同樣的趨勢，馬其頓就不必提了，在那裏，聯盟主義者——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和希臘人——是佔絕大多數的。由於在蘇聯戰場極多的和正在增加的羅馬尼亞人的傷亡，或許同樣的趨勢也會在羅馬尼亞發展起來。

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這是巴爾幹各國政治情況的一般趨勢。

## 第七章 鮑里斯末世

集中營的警務長自認爲是一個演說家。有一天，在六點三十分點名之後，他和那位德國少校昂首進入院子，他就在那裏發表了演說。他的演說，每次只有很小的一點變化，都是關於新秩序的黎明和最後勝利以後所有歐洲人一定享受的和平與繁榮這一類通常的無聊的話。五月一日，我們慶祝納粹的勞動節，這真是讓大家最激動的一天。這一天對於許多囚犯倒是一個真正的假日，真正的慶祝——國際勞動節。

警務長用幾次演說說明國王鮑里斯和他的政策。這些演說都把他描繪成一個中心的巴爾幹政治人物——「巴爾幹新秩序的花崗岩的基石。」這就是警務長說的。

有一次他說的是對的。因爲光榮是有價值的，鮑里斯無疑是巴爾幹各國裏秩序的花崗岩的基石。他也是歐洲近代史中最有趣的人物。

他自稱是保加利亞人的國王，鮑里斯三世，保加利亞人民稱他做德國人鮑里斯。索非亞的政治家稱他做鮑里斯末世。根據保加利亞憲法，由於「上帝的恩寵與人民的意志」，他才是國王。我沒



有能力斷定上帝的恩寵是從那裏來的，但是，當一九一八年秋天，他的父親「狡猾的」斐迪南逃離本國，他宣佈稱王的時候，人民的意志當然是不能算進去的。事實上，人民的意志是宣佈成立共和國，以斯丹包里斯基爲總統。

二十五年來，鮑里斯是一個成功的國王，這是說關於他的主要目的——保持他的職業——的一點上是成功的。對於最後一次的威脅——暗殺——鮑里斯是用極大的勇敢去對付的。他還是站在那裏，沒有被暗殺，爲了他自己，直接的或間接的，是數千人民之死啊！

在他統治的二十五年之中，鮑里斯有過十一位總理——一個保守黨人，一個左翼農民黨人，一個法西斯蒂，三個民主黨人，一個共和黨人，一個將軍，一個年老的陰謀的朝臣，一個有能力的職業外交家，一個考古學教授。在這些人中，有兩人是自然死去的，有一個被暗殺了，有一個正在公共集會上抨擊國王的獨裁政策時候死了。其餘的人現在還活着：有一個是德國的代理人，有一個是因爲反德活動而被下獄，有一個是國會反對派領袖，有兩個已經湮沒無聞，有一個是保加利亞駐瑞士公使，剩下的一個就是現在的總理。除掉最後的兩人還在給國王服務之外，剩下的人都非只一次的坐過監獄，在這十一人之中，只有兩個多少是經過自由選舉，成爲國會多數黨的領袖，代表了人民的選擇。

x

x

x

x

x

一九四〇年，索非亞政治家描寫鮑里斯的政府是「一種沒有權威的政府」。這是十足的真實。在那個時候，除了警察權之外，政府是沒有別的權力的。這已經足夠使這個政府實施它的政策——就是把住政權。爲了這個是需要王宮的支持的，如果政府還是充當一個馴順的工具，這種支持是可以實現的。王宮當局是要依靠軍隊的支持的，這就是指那些和國王在一起的將軍們。但是爲了要把這羣將軍們保持在週圍，鮑里斯也曾經進行過持續十八年的長期鬥爭。

在上次大戰之後，許多軍官都是軍人聯盟的會員。軍人聯盟的領袖威爾契夫 (Vasilko Vokobratov) 上校曾在一九三五年被判處死，但是由於幾個英國國會議員的干涉和全世界民主派的抗議，對他的判決減爲無期徒刑。一九四〇年他被開釋。他所倚重的柴伊莫夫 (Chirko Zaimov) 將軍，一個保加利亞軍隊中最有能力，最得人望的人物，在一九四二年六月被判處死了，這是由於國王鮑里斯的內閣杜撰出來他有謀叛的罪過。

威爾契夫是一個真正的民主派，十幾年以來都是反對鮑里斯對內對外的政策。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他組織了一次軍事政變。他拒絕擔任新聞中的閣員，他的助手喬吉耶夫做了總理。他是親南斯拉夫，親俄，並且是親英的。他要和南斯拉夫簽訂一個軍事同盟，做爲巴爾幹團結的基礎，只有這個才可以抵禦德國的東進。

他在國內進行了激進的教育的，財政的，與行政的改革。但，當他準備一次普選——無疑他是

會得勝的——鮑里斯和將軍們在一起弄了一個謹慎安排的陰謀，就在一九三五年實行政變推翻了政府，這年秋天，國王逮捕了威爾契夫和五百多名軍官。一九三六年，軍人聯盟被封閉，宣佈非法了。一九三八年，痛恨德人，支持軍人聯盟的參謀總長皮夫 (Yordan Pev) 將軍在陸軍部門被槍決了。自此以後，軍隊就服從了王宮，沒有一個軍官敢於冒犯鮑里斯政權了。

鮑里斯的外交政策還是一個謎。他是名符其實的親德的嗎？還是在心裏親英的呢？

當時機到來的時候，鮑里斯當然想要把他自己的命運和希特勒的命運分開，他不會相信德國的勝利的。但這不是因為他是親英的。他也不是曾經親德的，他的親德只是戰術，當他保留王位的希望要寄托在「親英」上邊的時候，他便扮做親英的。他一向只是親鮑里斯的。

德國進攻波蘭時候，巴爾幹各國是完全不團結的。羅馬尼亞和波蘭是有一個軍事協定的，羅馬尼亞首相卡林尼斯哥 (Aronand Carinescu) 對於這個協定是信任的，最後在德國人默許之下他被鐵衛團暗殺了，因為他要使羅馬尼亞立刻站在波蘭方面反抗德國。但，國王卡羅爾寧肯保持中立。土耳其和英國是有一個軍事同盟公約的。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希臘，和土耳其還是屬於巴爾幹公約的。保加利亞是中立的。

保加利亞總理喬賽凡諾夫 (Kiosajivanov) 認為巴爾幹各國要想得救，必須組成一個友好國家



的聯合戰線。他同意參加巴爾幹公約，就詢問土耳其和南斯拉夫，請它們爲保加利亞出面調解。

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嘉芬哥 (Grigore) 表示願意和保加利亞合作，並且準備割讓多不魯甲這片不重要的領土，這是一九一九年羅馬尼亞佔去的。國王卡羅爾是另種想法，雖然這樣，半官方的交涉還是在索非亞與布加勒斯特之間進行着，一九三九年末，好像可以得到協調的樣子。一九四〇年二月，在貝爾格萊德召開最後一次巴爾幹公約國會議，會議上同意應該以合理的條件讓保加利亞加入公約。土爾其外交部長薩拉茹格魯（現任總理）向鮑里斯和喬賽凡諾夫提議願充調人。在他們談話之後，喬賽凡諾夫更得了鼓勵，他對我說，巴爾幹團結的目標終於要達到了。一九四〇年二月十四日，他把巴爾幹合作的全部計劃向鮑里斯說明了。就在那一天，不孚衆望的內政部長從內閣裏被擠出去了，喬賽凡諾夫向國王提出了內閣總辭職。同時又向他提出了一份新部長名單。但是，鮑里斯告訴他，他接受他的辭職。

因此，喬賽凡諾夫的巴爾幹合作計劃化爲烏有了。宮庭方面認爲他的外交政策太危險了。

在保加利亞政治中，鮑里斯一人就有很重大的作用。說他的妻子，義大利國王的女兒吉奧凡娜，或是他的姐姐柔杜西在政治上對他有些影響，是完全瞎說的。柔杜西是一個醜陋的老處女，他只對於她的慈善事業有興趣。王后吉奧凡娜帶着兩個孩子，十一歲的瑪麗路易和六歲的西密昂在義

大利消度大部時光，西密昂是王位繼承人，據索非亞報紙所載，他正在「他的父親的真正民主的傳統中」接受教育呢。

如果再一次楚爾朗式的表演要在巴爾幹玩弄一番，這個孩子就很可能繼承保加利亞的王位。鮑里斯是會學他父親的例子——爲了兒子，自行退位，歸隱在一個德國的城堡裏。

什麼時候鮑里斯才會努力與盟方接觸呢？

現在已經有了象徵，他正在準備一個這麼辦的計劃。他已經派遣他最信任的外交家，前駐德公使德拉甘諾夫 (Pavel Draginov) 上校充任駐西班牙公使。他在葡萄牙建立了一所很大的公使館，他又派遣前任總理喬賽凡諾夫駐在瑞士。

但是鮑里斯的最好的朋友與合作者並不是一個保加利亞的外交家——而是德國駐土耳其大使巴本先生。巴本正像鮑里斯並不是百分之百親希特勒的，而差不多還是親巴本自己的。巴本正像鮑里斯也並不相信德國能够獲得整體的勝利。

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他們這樣的推斷着：紅軍馬上要被擊敗了。德國巨大的兵力就可以分身去對付英國。經過巴本，和聯合國的關係就會建立起來。一個妥協的和平即可簽訂。俄國是唯一戰敗國，倫敦和華盛頓不會因此而覺惋惜。德國會讓出西歐和斯堪的納維亞，並且會把它的生

存空間限制在東歐方面……

紅軍從那個時候起粉碎了這種希望。但是，鮑里斯現在反倒相信他的地位是更強固了。因為紅軍正向巴爾幹邁步前進，他就不再浪費時間，趕快向倫敦和華盛頓取得接觸。請看他的是怎樣的獻出他的方案來吧：他是歐洲唯一的沒有向東線派出一個兵士的傀儡份子。根據他的宣傳，他並沒有佔領在歷史方面種族方面並不屬於保加利亞的領土。真的，他可是把軍隊派到塞爾維亞去了，這只是爲了幫助內迪支 (Neditch) 去粉碎游擊隊呀。什麼是游擊隊呢，那還不是俄國支持着的「共產黨」嗎？他從來沒有正式說過一個反對英美的字。如果西方國家不願眼看「共產主義」在巴爾幹獲得勝利，他們現在就必須援助鮑里斯，鮑里斯還有一支強大而完整的軍隊呢……

如果是盟軍而非蘇軍侵入巴爾幹，和鮑里斯辦一次交涉是會像和達爾則辦交涉一樣的成功。但這只是臨時的權宜之計。還會引起恐怖的内戰，而且還不只永遠是内戰。這對於所有歐洲其他的傀儡分子派也是一樣的，你能够永遠壓迫某些人民，你也能够在某些時間之內壓迫所有的人民，但是你却不能永遠壓迫所有的人民。



## 第八章 希特勒坦克車之油

一個寒冷，颶風的三月天，我們從做工的大路上走回來吃午飯，我看見押來了非常大的一批囚犯，他們都在大樓裏面，聽受檢查。我們剛喝完最後的一口湯，他們開始來了。我們渴望要知道外面的消息，我們都把他们圍了起來。

他們一共是十七個人，都像是強壯的樣子，只有一個身高瘦弱的老人。其餘的都是中年人，他們的臉上都帶着不愉快的經歷的痕跡，把每一個人住監的年月加在一起，總數是差不多二百零七年，判決死刑一共是十九次。（有一個判死刑三次，但都逃出了劊子手的殺害。）他們大家都冇假牙——眞牙是在幾年以前和警察的許多鬥爭中被敲掉了——沒有一個不是在同樣的情況中把手臂或大腿弄得殘傷了。一個人有住過歐洲每一處監獄的榮譽，連一處英國監獄在內（因爲沒有護照而進入英國）。一個人曾在西班牙內戰中作過戰，在政府軍方面充當上校，以後就又進入一處法國集中營。他通過瑞士，義大利，南斯拉夫，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監獄，最後逃到了俄國。一個人會和中國人在一起抵抗日軍。一個人在巴西監獄中住過五年。其餘的人曾在美國和澳洲坐過牢。他們都能說很好的俄語，許多人還能說法語和德語，四個人能說很好的英語，並且熟悉英國職工運動

的歷史。

有三個人我是老早認得的。一個是索非亞的律師，曾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坐牢，以後他又免費爲無力交付訟費的政治犯辯護。第二個人是裁縫，今年人約三十五歲，十七歲那年被判苦役十一年；第三個人是我的一個老朋友彼得羅夫（Peter Petrov）曾在印刷所工作，是保加利亞左翼青年運動的領袖之一（後來他被警察殺死了）。

這些人都是保加利亞工人同盟的主要領袖。保加利亞政府就叫他們做共產黨，但這並不是最正確的定義。他們是親蘇的，但還不能把他們當做是正統的共產黨黨員。有些人有共產黨的觀念，並且傳佈共產主義的理論，但是各地的許多領袖就從來沒有讀過一本共產黨的書。據我想，最接近事實的推論，這個工人同盟是包括着英國工黨，職工會，獨立工黨，共產黨，和許多別的獨立左翼份子的。

這個工人同盟可以博取全保加利亞工人的一致信仰，如果給予一次機會，如果舉行一次真正自由的選舉，它可以在所有城市裏，包括首都都在內，很容易地取得勝利。在鄉村中的力量是難於估計的。無疑的，工人同盟的影響正在全國增漲起來。

這些工人黨黨員對於營中的囚犯和警察都給了很好的印象。他們都是很好地組織起來的。他們

管理營中的衛生事務，並且建立了一種有效的醫療制度。還有更有價值的，就是他們第一次安排了一道獄中人稱做是「運河」的玩意兒——與外界的交通。他們得到了報紙、信函，還有書，他們只分給他們自己看，由於彼得羅夫的關係，我也能够享受他們的許多權利。我差不多讀遍了他們的書，大部份是翻印的左派作品。喬治是他們認為絕無可疑的惟一的「外人」，他也得到剪報資料，書和情報的贈品。

四月上旬，又來了四個工人黨黨員，是保加利亞南部哈斯科佛城的青年學生。他們和另外的五個學生在一起，因為散佈反德傳單而被憲兵逮捕。那五個人在幾天無情的刑訊之後，死在阿森諾夫城的警察監獄裏了。九個人都受過最惡毒的刑罰。在一根棍子的頭上，綁起一塊布來，點了火。囚犯都塞住嘴，用繩子捆住，躺在地上，就拿起那個火把去烤他的胸口與膝蓋之間的部份。主要的是專烤他的生殖器，如果他還能活下去，就終生殘廢了。

我看見了他們烤黑了的身體，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憤怒的。他們的同志把他們放在赤色大廳裏，想法子減少他們的痛苦。警察都走了過來，熱心地幫助他們，某次，甚至警務長都感動了，允許購買綳帶與藥膏。有兩名警察立刻自告奮勇願意到城裏去買。傍晚，他們回來了，一個警察喃喃地告訴我：「真他媽的野蠻。舍弟跟這些少年的年齡正相彷彿。」

這四個少年，以及後來我所遇見的幾個人，他們最渴念的壯志，如果需要，就是爲了他們的信



仰忍受一切痛苦，他們幫助我明白左翼的心理。後來，當德軍在俄國進展着的時候，我還能記得他們的蒼白慘痛的面容，我知道當時退却的左翼的力量是永遠不會被擊敗的。

我和左派的往來，是在一九三九年年終，由於一件奇怪的事情。十二月間，工人黨的祕密報紙「工人行動報」發表了一篇激烈的文章攻擊「財閥的戰爭宣傳」。在這篇文章裏，所有親盟方的編輯與記者都被指為英國情報部收買的份子。我自己被描寫做一個「危險的新聞記者，打算讓保加利亞參加西方帝國主義列強方面的戰爭。」

這篇文章可真讓我煩惱，因為我並不願意參加糾纏不清的索非亞政黨政治。做為一個新聞記者，我要和所有的政治領袖保持接觸，但我還是不願意牽連在他們個人的糾紛中。否則，我就不能給我的報紙拿出事情的真相。但這可不是容易的。所有各政黨領袖都是互相猜疑的。

工人黨的領袖是最多疑的。因為在保加利亞，沒有一個的政治運動是從特務份子那裏受到過這麼多痛苦的。有過一個這樣的特務份子居然到了工人同盟組織的最高機關。一九三七年，他被派任三人委員會委員之一，這是領導索非亞分盟的。在一九三九年國會選舉中，這個人代表工人黨和各反對黨進行一切交涉，並且和農民運動派簽訂了一個政治協定。這是自從一九二五年以來國內兩大最有勢力的反法西斯政黨進行和解的第一步。但是他把這一份協定的原稿交給了警察當局，警察就

逮捕了代表農民黨簽字的領袖和工人運動的領袖。

因此工人黨對我的懷疑是很自然的。在他們的眼睛裏，我是「世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報紙」的代表，我也毫不猶疑地說到他們當時的活動對於盟方是有害的。但是，由於彼得羅夫，我終於在完全信任中和他們建立了關係。

彼得羅夫是少見的聰明人。直到一九三五年，他還是一個印刷所的普通工人，在這個印刷所裏出版我工作過的一種報紙。我們變成了好朋友，我常常到他的小房子裏去訪問他。他管制一架工人黨的祕密印刷機，他很信任我，徵詢我關於用最好的方法編寫攻擊政府外交政策的非法傳單的意見。（他一人包辦，只有一個小孩子幫助他，每月平均可以出版傳單二千份。）

我對彼得羅夫訴說關於「工人行動報」那篇文章的冤枉。兩天以後，他就把我介紹給那份祕密報紙的編輯。這位編輯後來告訴我，彼得羅夫是曾以「生命」來擔保我的。

我見過這位編輯幾次，我們也變成了好朋友。他在警察局受審的時候，他身體裏的每一塊骨頭都被打壞了；警察管他叫做「啞巴」。他一進警察局，就真的變成了啞巴，威脅和刑罰都不能誘使他吐出一個字來。一九四一年秋天，我又見過他一次。那時，他是一小批工人的領袖，白天睡在不同的隱避所，晚上就工作起來，在燈火管制之中散發傳單和報紙。

關於那篇文章的事情不久就被忘掉了。第二年，彼得羅夫和那位編輯供給了關於各傀儡政黨活動的最有價值的情報。彼得羅夫曾經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上旬告訴我，有一百多輛德國軍用卡車從羅馬尼亞經過多不魯甲開入保加利亞，並且在向巴爾幹山地急進中。彼得羅夫告訴我的消息每一點都是正確的：德軍排成四隊開來，穿着藍色的外衣，車輛都偽裝做民用車輛，也沒有號牌。他們在所有經過的各城市中購買食物，用羅馬尼亞甚至法國的錢幣付款。

這真是一件大事，我認為國際上的複雜事件將因此而起，我就決定去請教英美公使館。他們詢問鮑利斯政府，陸軍部對英美陸軍武官的說明是來了幾個德國「技術專家」，對保加利亞軍隊防空訓練。這當然是胡說。德軍是在巴爾幹山地組織防空網，做對付盟機空襲羅馬尼亞油田的前哨。

我把「技術專家」到臨的消息打出了一個電報，結果外交部就召我去；我第一次被責「散布謠言」。我證明我的消息是正確的，他們又說我是洩露軍事秘密了。最後我又問他們，從什麼時候起德國技術專家的活動能够算做是保加利亞的軍事秘密呢，他們就讓我平安地出來了。

這裏，我要談談巴爾幹戰爭中最有趣的插曲之一：羅馬尼亞油田的爭奪，這是歐洲最大的油田，是希特勒機械化部隊最重要的油之源泉。這次的爭奪是德國人獲勝的，不是在軍事戰線上，而是在外交戰線上。



一九四〇年十月，德軍開始湧入羅馬尼亞，他們大批地開來還是在十一月間。十月廿八日，墨索里尼對希臘發動了他的不幸的戰役，到了十一月底，他就把自吹自擂的法西斯軍隊的真正價值向全世界表明了。當時英國皇家空軍是在希臘大陸上活動着，這些基地距離羅馬尼亞油田只有一小時的航程。那時候油田的防空設備還完全沒有；德國剛剛開進羅馬尼亞，巴爾幹納粹最高指揮部對於英國皇家空軍攻擊油田的觀念，正在痛感驚恐不已。他們的需要是這麼大，他們甚至於提出要求把按照比例配備在保加利亞軍隊中的數目極少的高射砲移交給他們。他們的「技術專家」在極寒冷，極猛烈的大風雪中，開始以空前的速度組織高射砲隊。

李賓特羅甫過來援助巴爾幹德軍總司令李斯特（Littorj）了。十一月底，國王鮑里斯被召到貝希台斯伽登希特勒別墅去。他得到確切的訓令，要照顧羅馬尼亞油田。希特勒要他必須不顧一切始終保持中立，反對德國，甚而還須設法使盟方支持他的政策，這個把戲，鮑里斯玩得很好。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保加利亞外交部費了最大的力量向索非亞的英美外交官說明，國王想要努力把德國人趕走。羅馬尼亞油田的問題是提出來了。外交部長申明如果英機飛過保加利亞去轟炸羅馬尼亞油田，希特勒就會跨過多腦河，佔領全部保加利亞。因此，英國爲了巴爾幹的和平，爲了它自己的利益（——就必須自行約束，不要干涉德國在羅馬尼亞的石油供應，以便把德國人趕出保加利亞去。威廉街勝利了。（威廉街是德國外交部所在地。——譯者註。）保加利亞接到英國的正式

照會，英國尊重保加利亞的中立，絕不轟炸羅馬尼亞油田。

但是實際上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呢？德國人知道在羅馬尼亞方面防空力量的不足，畏懼英國皇家空軍空襲的結果，就巧妙地表演了一次外交的有效行動，使油田不再遭受危險，並且給他們時間在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山地中組織防禦。

不只如此。歐洲的情勢使羅馬尼亞油田爭奪戰更趨複雜了。希臘在英勇抵抗，但是，雖然有戰略的成功和兵士的英勇，希臘戰爭機器的能力——這是一個小的戰爭機器——已經竭盡全力差不多到達了枯竭的階段。除非——這是不可能的——一支強大的英軍能够在希臘本土登陸，否則必須把不可避免的德國的侵入希臘予以延遲，到最後可能的一刻。這是個悲劇的場面，一九四一年的英國不能在歐陸任何地方抵抗裝甲部隊的猛攻，在巴爾幹和東地中海沿岸尤其不能抵抗，因為英國只能經由繞道好望角的漫長海路把供應品送到那兒。它所能辦到的就是在軍事上，以及某種限度的外交上去從事延緩性的戰鬥行動，爲了這種需要，英國對於羅馬尼亞油田的態度更易理解了。希臘人當然要依靠英國的外交，盡可能地使德國人離開保加利亞，爲了這種理由，希臘也反對轟炸油田。他們小心謹慎地不要惹動德國人，雖然他們是在和德國的盟友作戰，德國公使館的全體職員還留在雅典，希臘公使也在柏林。

我有許多希臘朋友，他們都批評政府採取的這種態度，並且斷言希臘必須在義大利侵入希臘領

士的時候和德國斷絕外交關係。他們推斷德軍不能在冬天進攻希臘，因為德軍剛剛開入羅馬尼亞，正在那裏遭逢許多很大的運輸困難。把這個理論說得更有希望一點，我必須再加上在二月底以前德軍想通過保加利亞是很困難的。那時以前，多腦河是結冰的，保加利亞的鐵路和公路也都不能應用。三月間，當德軍跨過多腦河進入保加利亞的時候，他們把他們的軍隊準備了一個多月，才去發動進攻南斯拉夫和希臘。

我個人相信，如果那時對德軍採取勇敢的行動，就是對羅馬尼亞油田採取毀滅的空襲，那就比採取過分小心的辦法延遲德軍的行動更爲有利一點。

此外，在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政治影響也是很深的。我從可靠方面知道，在羅馬尼亞所有親盟方的輿論，以及大部羅馬尼亞人民，都是歡迎轟炸羅馬尼亞油田的。我對於這件事情特別感到興趣，我自己在所有重要的保加利亞政治家作了一次小小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這個測驗給我證明民主和左派政黨的領袖，歡迎英國空軍實力表現在羅馬尼亞油田。他們指出羅馬尼亞油田的毀滅是英國在巴爾幹各國最好的政治宣傳。

距離集中營約有十五英里，在阿森諾夫城山谷當中，有一處很大的德國軍用飛機場，據說這是在巴爾幹最大的一處。一共停有三百多架飛機，飛機的喧鬧是可怕的，在孤立的山巔上，飛機的聲



普把戰爭帶到我們的身邊。我們都同樣詛咒這些德國轟炸機，當一架飛機在我們眼前起火焚毀的時候，我們都幸災樂禍地高興起來。警察告訴我們兩個飛行員都燒死了，這件事情使我們快樂了一整天！

四月六日，黎明時分，我們都在痛罵納粹飛機三點鐘的時候就把我們吵醒了，飛機場上探照燈通明，空中震動着引擎的聲音。我們從宿舍的窗口上向外張望，心都沉下去了。顯然，幾百架飛機這麼早起飛不是爲了一次愉快的旅行。第一批雙引擎轟炸機慢慢地飛向遠方去了——慢慢地飛，是因爲帶着重量的炸彈，速度給減小了。我們也沒有力量辨別的事情，只好罵，看着它們。鐘鳴六下的時候，飛機還在起飛。我們出去工作的時候，天上飛機飛滿了。有些又回來了。我們數了數出去的飛機。有兩百五十多架飛機向南方——到希臘去。現在它們又向西飛了——到南斯拉夫邊境去。

後來，地面也開始回響毀滅的聲音。我們距離希臘邊界不過五十英里。飛機吼聲還在繼續。囚犯中的軍官對我們解釋說砲火的聲音是來自南方的。這個意思是說希臘人正在還擊，我們都很高興，但時間並不太長。下午，聲音停止了，沉默又來臨了。我們也知道這是什麼意思——納粹匪軍進攻希臘了。希特勒的巴爾幹閃擊戰開始了。

## 第九章 預言家克利浦斯

一九四一年德軍征服巴爾幹是軍事行動常常在開火之前就決定勝負了的公式的最好的證明，軍隊只要按照外交活動和祕密武器所鋪好的軌道向前邁進就行了。納粹在南斯拉夫和希臘閃電戰旋風式的成功，政治勝利結果要大於軍事的成就——在戰前十年間自盟方取得的政治勝利。

一九四〇年十月，德軍以和平的手段進入巴爾幹半島：是由於羅馬尼亞總理安多尼斯哥將軍的「邀請」，來充任羅馬尼亞軍隊的「教官」。絕大部份羅馬尼亞人民是親法，親英，並且是反德的。羅馬尼亞，由於它是最大的，最富饒的，在國際上最重要的巴爾幹國家，曾在一九一八年巴黎和會英法支持之下得到了最大最富在國際上最重要的巴爾幹國家的地位。但是德國的外交仍把盟方外交的巴爾幹堡壘變成了第一個參加納粹新秩序的巴爾幹國家。

其次就是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在戰略上，保加利亞是更重要的。在保加利亞領土上的德國空軍根據地距離伊斯坦布爾和海峽只有半小時的航程，這種事實對於東南歐和中東整個局勢的影響，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越發清楚。保加利亞位於巴爾幹的心臟地帶，在整個半島上軍事活動的理想根據地。德軍進攻南斯拉夫證明這是不錯的。李斯特將軍在背後偷襲南斯拉夫軍，截斷他們

退往希臘的通路，這只是因為他能够運用在保加利亞根據地上的大批集中的兵力去實行出擊。開戰的第二天，他的裝甲部隊便從保加利亞東南部開始，到達了南斯拉夫重鎮斯科普利(Škopje)，控制了瓦連爾河流域，和南斯拉夫到地中海的唯一交通線。

在這次戰爭中，德國外交證實了是比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無比地優良。我認爲事實上他們在東歐證明了他們的外交優於軍事。他們用外交手段戰勝了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還有——西莫維克將軍的政變之前的南斯拉夫。西莫維克將軍的行動無疑地是這次戰爭最勇敢的行爲之一。德國勸請南斯拉夫保羅親王及茲維特科維克總理(Trivitchev)，以及他的外交部長瑪爾科維克(Marković)，在一九四一年三月廿三日簽字加入三國協定，但照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是更值得注意的外交成就。雖有南斯拉夫國內絕大多數人民的反對，納粹的外交還勸成了貝爾格萊德政府參加了新秩序。

關於保加利亞的德國外交的成功是更大的。在這裏，納粹還要和土耳其爭衡。土耳其曾在土保邊境集中數師之衆；土耳其是英國的軍事盟友，土耳其報紙公開宣稱「土耳其權益的邊界是在多瑙河」，對於那邊的德軍是很清楚的警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保加利亞的鮑里斯國王應召前往貝希台斯伽登希特勒別墅。在他和希特勒與李賓特羅甫的長時間談話中，保加利亞的命運決定了。鮑里斯原則上同意參加三國協定，並且允許德軍佔領保加利亞。但，他還打算獲得希特勒的允許，履行



以下三點：第一，勿在保加利亞領土作戰（這就是說不要攻擊土耳其）；第二，南斯拉夫也應參加三國協定；第三，保加利亞軍隊不得用於進攻希臘。

德國履行了貝希台斯伽登希特勒鮑里斯協定的三點。由於土保互不侵犯協定（一九四一年二月），土耳其的中立是確保了，土耳其對保加利亞採取行動的可能性也消除了；南斯拉夫在保加利亞簽字的一個星期以後參加了三國協定，保加利亞軍隊也從未用於德國任何一次的巴爾幹戰役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三點之中只有最後一點是直接關於保加利亞的，前兩條是有關德國與別國的關係的。因此希特勒毫不遲疑地答應了鮑里斯，他可以把它算做是別的國家採取的某種外交政策，其中的一國是土耳其——是英國的盟友。

一九四一年一月底，以下一事漸漸明顯起來，當羅馬尼亞的德軍正在準備跨過多腦河進入保加利亞的時候；最大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土保關係上，現在就是土德關係。假定德軍開入保加利亞，土耳其就要參戰了。英美報紙都在牽直地討論這件事情，許多報紙推斷希特勒不至於侵入保加利亞，因為他不願意從事經由海峽的很大代價的戰爭。我還清楚地記得，在二月初，我和保加利亞內閣某部長談話，我指明保加利亞人民對於土保戰爭是頂不歡迎的，這個戰爭對於保加利亞年青的工業城市、港口，和交通線都是災禍，這些城市港口和交通線都會被土耳其境內的盟方空軍炸成粉碎。他笑了笑，告訴我一個很有意義的答覆：「這是不會發生的。巴本在注視着這種事情。」

當時巴本正領導着德國在東南歐的外交活動。我從可羅方面聽得消息，他已經向國王鮑里斯保證，「土耳其對於德軍佔領保加利亞是不會起反響的」。我不明白這種保證是根據什麼的。我問了問在土耳其的所有的新聞界的朋友，他們答道土耳其人是會打仗的。同時，德國駐索非亞公使館正忙於說服保加利亞政界人士，說巴本的活動馬上就要收到土保互不侵犯協定的效果。一九四一年二月底，這個協定簽字了。這個協定強化了國王鮑里斯的地位，對於貝爾格萊德親德的統治者也是一樣。根據巴爾幹公約，使南斯拉夫盟友的土耳其對德國讓步了。德國的影響慢慢地增強了。因為土保互不侵犯協定就是土德互不侵犯協定。幾個月以後，這種純粹字句上的差別取消了，土耳其和德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因此，巴本活動的最高峯就是互不侵犯協定的簽訂，並且和在對德作戰的英國的一個盟友建立了友好。

土耳其的中立對於英國和對於德國一樣都是有利的。如果德國以全力通過海峽去進攻土耳其，如果希特勒的裝甲部隊進入了小亞細亞，英國在中東的地位就會大為危險了。對於土耳其的災禍，換言之，就是對於英國的災禍，也同樣是對於聯合國的災禍。

認爲德國的這些政治與外交的成功是戰爭爆發以後才得到的可驚成就，是錯誤的。我們也不能認爲英美外交的挫折是英美派駐巴爾幹各國的外交代表個人的失敗。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之

間，巴爾幹各國被認為是在英國利益範圍以外的。張伯倫自己在某次演說中曾經宣稱，剝奪德國在東南歐的經濟出路並不是英國的意思。英國對巴爾幹各國的貿易被忽視，甚至被阻撓了。直到一九四〇年四月，英國政府才決定組織聯合王國商務協會，這個協會完全靠政府津貼。主要的目的是發展對近東各國，特別是對巴爾幹各國的貿易。但是太晚了。由於義大利的參戰，交通線被截斷了。還有更要緊的是德國已經用了有系統的凍結信用的手段把每一個巴爾幹國家完全扼制住了。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登台的時候，德國並沒握有外國通貨和信用資金，以便在正常的方式上繼續對東南歐貿易。所以它開始採用沙赫特物物交換的制度，不到五年，巴爾幹貿易的獨佔就屬於德國了。戰爭來臨的時候，它已經掌握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全部巴爾幹貿易。

德國開始在所有巴爾幹各國購進這些國家亟需輸出的產品；這種商品都不能找到國外市場。因為許多巴爾幹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價格都是很低的。巴爾幹的農民不能售出他們生產的東西，因為他所得到的價格，還不足以抵消他的支出。這種不幸的情形迫使所有巴爾幹各國政府必須以實際價值兩倍以上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產品。但是這種政府津貼的辦法是不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的。

沙赫特的狡黠是足能抓住這種局勢的。當他的派任巴爾幹各國首都的代表提出比國際市場價格較高的價格去收購的時候，這個建議就被欣然接受了。這些條約都是在物物交換的原則上簽訂的，這是毫無妨礙的，因為巴爾幹國內市場正很需要德國供給的工業品。



如果德國送往巴爾幹各國的工業品和得到的農產品是相等的，這種制度就算行得很好了。但是沙赫特博士還另有主意。他很知道，德國不能再支付它所需要的從巴爾幹各國輸出的正在增加中的出口商品了，但是、雖然如此，或者正因為如此，它增大了自己的需要，到一九三六年，德國對巴爾幹各國負債很重了。這裏就存在着德國的便宜了，在這一方面，沙赫特的主意是和通常經濟生活的原則相反的。自然巴爾幹各國政府賒給德國這麼多的東西是很擔心的。但沙赫特十分明瞭快樂的債務人（德國）的非常的作用。真正敲詐行爲開始了。他提高德國工業品的價格，並且解釋只有如此纔能把他應允的東西送出國外。這就說明了德國爲什麼對巴爾幹各國只簽訂短期貿易協定——通常只有六個月。在每一新協定中，它都提高價格，增加欠款。這種不正常的形勢使德國人進入一種極有利的地位中，可以用毫無顧忌的效率來榨取。戰爭爆發時候，巴爾幹各國政府都變成了懇切求助的債權人了。德國人——這個下流的債務人不償付欠款，而且盡其全力增加欠款。

德國對巴爾幹各國的經濟窒息政策使它在政治鬥爭方面也能出奇制勝。用這種武器，它對巴爾幹各國首都都有勢力的金融界與商界，以及對於他們的政府，使用了強大的壓力。

如果英國駐保加利亞公使館對於保加利亞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能有一個比較完備的瞭解，在保加利亞的許多錯誤就可以避免了。同樣的情形也適用於美國公使館；但蘇德兩國外交代表却非

如此。除掉少數例外，英美外交官總是把他們的個人的接觸限於所謂上流社會。但是所謂上流社會，並不像在倫敦、巴黎、紐約一樣，在索非亞（貝爾格萊德也是如此），那樣的上流社會是不存在的。保加利亞人都是貧窮純樸的民衆，並沒有貴族階級。在所謂索非亞的上流社會裏這些外交家所挑選的朋友大部份是豪富的騙子，可疑的商人，和到處爲家的浮游份子。那些小公務人員，還有政治家，作家，詩人，教授，新聞記者，和大學學生是可以代表廣義的社會的。通過他們可以對於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得到一個清楚的概念。但是他們從未接近公使館人士。

那些能够清楚知道這些人民的英美人士是英美報紙的記者。這些記者看見了真實的人民，得到了真實的消息。

在這一點上，英國公使館態度最有趣的一個例子是發生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克利浦斯爵士訪問索非亞的時候。

由於保加利亞人民一致的親蘇感情，沒有一個英國政治家能比克利浦斯爵士在保加利亞得到更大的歡迎了，因爲他是英蘇友好的擁護者。當他受任駐莫斯科大使，到達索非亞候機前往莫斯科的時候，我自己都大爲訝異，我目睹了輿論的興奮。克利浦斯是六月六日從雅典飛來的，他還要在這裏等幾天飛機。他的出使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自然他的到達索非亞也會吸住巴爾幹各國所有外國

記者的注意。美國記者都從布加勒斯特和貝爾格萊德趕來看他。

克利浦斯爵士在索非亞的勾留若被好好地利用起來，很可以成爲英國威信的勝利。對當地記者發表兩三句話就可以打破戈倍爾的宣傳。當時戈倍爾在保加利亞的說法是：英國在心坎裏是俄國的敵人。現在在索非亞的這個人是相信英蘇合作的，並且決心爲英蘇合作而努力。新聞記者半小時的訪問可以寫滿在第二天早晨每一家報紙的首頁。當時保加利亞的新聞檢查還是中立的，他不能夢想扣留英國大使想好而後說出的任何一個字。我知道，因爲我是唯一見到他的新聞記者，我還是使了一個小計策才見到的。

英國公使館警告所有的新聞記者，外國記者和本地記者，說克利浦斯爵士絕不接見新聞界。

克利浦斯爵士來到這裏的第三天，保加利亞工黨社會民主派最有影響的領袖A先生給我打來一個電話。從前在一次國際勞工會議上，他曾經認識克利浦斯，他極想再見他一次。當他和英國公使館接洽的時候，他接到的答覆說這是不可能的，克利浦斯爵士太忙了，不能接見任何一個人。我說明A先生是誰，克利浦斯答應立刻接見。困難是在他並沒有聽見過A先生，他並不是常被接待的所謂社會名流中的一員，許多所謂社會名流後來都變成了國王鮑里斯親納粹外交政策的強力擁護者，A先生是代表了國內最有勢力的親盟國的民主運動的，他和他的政治同志控制着合作社協會，這是保加利亞最大的經濟組織，由每一個城鄉中成千的會員組成的，進行的辦法是按照職工會的原則。



（一九四一年，鮑里斯政府把協會完全置於政府控制之下，並且逮捕了所有的領袖。）

訪問安排好了的時候，我請A帶我去當他的翻譯。他同意了，他並不懂英語，我的出席會把事情弄得更好。但是他讓我立誓不要把所說的話告訴別人，克利浦斯告訴A的話——關於他的出使莫斯科，關於史達林，張伯倫，邱吉爾，關於阿比西尼亞，慕尼黑，以及戰前十年的英國外交政策——都可以成爲全世界每一張報紙上的大標題。現在，希特勒的進攻蘇聯已經證明是希特勒最大的錯誤，遠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克利浦斯爵士就預見了蘇德戰爭。我們應該記得，在那個時候的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裏，俄國的不受歡迎是僅次於德國的。這是法蘇外交關係斷絕的時代。芬蘭戰爭的回憶還很鮮明，法國共產黨都在運往前綫的卡車上用粉筆寫上「爲什麼打這場仗？」但是，那時，克利浦斯爵士就說德蘇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英蘇友好是必需的。當談話轉到史達林的時候，就更有興趣了。克利浦斯向A誠懇而生動地描述他在幾個月以前以私人資格訪晤過的這位蘇聯領袖。最後，談到所有有關蘇聯的巴爾幹問題，每一句話都是一條標題，每一個字都是預言。後來，A談到慕尼黑，他指出這個協定在東南歐方面，對於英國威信是怎樣的不幸。對於慕尼黑以及由此引導出來的政策，克利浦斯爵士用的字眼比A還要尖刻。「使戰爭成爲可能的就是這種政策。」他着重地指出，「我們正在用很高的代價去支付這種政策，將來我們的支付還要更高。」最後A談到保加利亞民主陣線問題。A說這是所有左翼民主運動授權他來談這個問題的。他們談到勞工運動的組織，

以及和極左派合作，等等。克利浦斯毫不遲疑地勸他要實行整個的合作：「你們的勞工運動必須統一起來。所有反法西斯的人們都必須在一起工作。」

我們離開了公使館立刻就到有許多朋友等候他的那間房子裏去，他們都渴望聽聽克利浦斯說了些什麼。克利浦斯的語句給他們留了很深的印象。這些語句在保加利亞提高了英國威信，比散幾個月的小冊子或無線電廣播都好。幾個星期以來，德方宣傳機構也想擊敗這次訪問的結果。主要的說法是描寫克利浦斯在莫斯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人。德國宣傳機構把史達林怎樣拒絕接見他的故事，蘇聯怎樣不信任他的文章，送給保加利亞所有的各家報館。英國新聞處對於這種納粹歪曲的毒惡的宣傳毫無對抗的辦法。

但是，如果在索非亞的英國官方人士不能表示他們自己是親蘇的，他們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對於此點採取中立態度，至少是絕對不要反蘇，不幸到臨保加利亞的某些英美賓客沒有使這種需要以十分圓通的手段把任務變得更容易達成些。

對於英國的威信造成了更嚴重的危害是由於許多所謂「半官方」的賓客，他們以私人資格在巴爾幹各國旅行，但是，他們的地位使他們能在巴爾幹各國首都會見重要的政治家。我只舉一個例子——也是最惡劣的例子——就是一九四〇年春天戴科西 (Kenneth De Courcy) 先生的來訪，他是

英國帝國政策協會的祕書，一種倫敦出版的新聞通訊的編輯。他的朋友對於他的巴爾幹旅行大事宣傳，對於此行的政治意義過份誇張，對於此行的動機大大地加以誤傳，結果，一九四〇年春天，戴科西先生到了保加利亞的時候，大家都把他當做英國戰時內閣的代表了！

他的見解對於保加利亞政府人士與輿論界都發生了最不幸的影響。戴科西先生曾被國王鮑利斯接見兩小時。他見過總理，外交部長，情報部長。他和重要的保加利亞政治家，政論家，新聞記者，報紙編輯舉行過幾次談話。在這些談話中證明他是激烈反蘇的。

此來唯一的成就就是他造成了對英國的憤慨，據他解說英國是蘇聯的敵人。當英國公使知道了戴科西發言的影響的時候，立即向報界發表聲明，說戴科西只是一個私人，他所說的只是他個人的見解，這都白費。沒有人相信這個聲明。大家仍舊認為他是英國官方的代表。

四個月以後，我和保加利亞外交部長波波夫 (Ivan Popov) 談了一次話，我想要說服他，英國還要對納粹繼續作戰，絕對沒有意思聯合德國，組織什麼十字軍，去進攻蘇聯，他答道：「你只看見英國報紙。英國的真心是什麼呢？它常常做和報紙上相反的事情。戴科西之行就是明證。」

蘇聯塔斯社駐索非亞記者把戴科西先生的發言盡量報道出去了，我們很容易猜想到對於蘇聯報紙讀者的影響。此事使索非亞蘇聯人士極為憤怒。可以推想得到，莫斯科的蘇聯人士更為憤怒了。



許多人都責備在巴爾幹各國的英國公使個人，說他應該擔負英國外交遭受挫折的責任。但我還要指出，要是談到保加利亞，在我看來，是不會有別的公使會比藍得爾先生（自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任英國駐索非亞公使。——作者註。）更好的了。但是，他能辦到的事情是嚴格地被限制住的。他的任務是執行延緩行動，而不是組織攻勢。沒有一個船長，無論他是多麼機智，也不能阻止一隻沉船沒入海底。他頂多只能辦到延緩沉沒。這就是藍得爾在索非亞辦的事；他辦到了。要罵所有駐在巴爾幹各國的英國外交官是消息欠靈通的，遲鈍的，懶惰的文官，是很合適的，我不能否認英國駐索非亞的某些人員是屬於這類的。但是藍得爾這個人，以及他的幾個助手是和兵工廠的一個熱心工人一樣敏銳而周到的。

藍得爾從頭到尾知道鮑里斯政府沒有輿論的支持，他和反對派的主要份子接觸起來，特別是在一九三九年，他和保加利亞國會議長——親英的，精力飽滿的莫善諾夫 (Borcho Mihanov) 接觸起來。不幸，此事的結果是國會被解散，莫善諾夫受到迫害。後來，在一九四〇年，索非亞政府密切注意着每一個常到英國公使館的反對派政治家。因此，爲了不危及這些人的個人安全，藍得爾必須勸告他們不要常來。無疑問的，若非因爲保加利亞政府的專制態度，藍得爾是可以繼續並且擴大他和反對派人士的接觸的，雖說如此，他的主要任務還是要和政府保持接觸。政府是鮑里斯呀！

保加利亞——實際也是全巴爾幹的政治之謎——是如此紛亂，沒有一個外國觀察家能在一兩年

之內把它摸清楚的。如果英美在巴爾幹的外交官還想玩點純粹的政治把戲（這是不同於純粹外交活動的），對於同盟國一定更有害處。政治把戲是複雜而危險的武器。除非是嫻熟於此中技巧，否則最好還是不要使用。

## 第十章 美國女間諜

彼得齊維科夫是集中營裏最有人緣的警察。因為他對於囚犯向來很友善，警務長很恨他，他對我們從不兇暴。他祕密地把紙煙分給我們，也常常設計帶進舊報紙來，他自己也很愛看報，對於政治也很有興趣。也許是因為這個，他對於新聞記者囚犯，特別是喬治和我，格外客氣。他常常就許多政治問題來徵詢我們的意見。雖然這個人的知識很有限——他只受過小學教育，僅僅能夠讓他識字寫字而已——對於他所說的「世界局勢」却有非常敏快的智慧和直覺的真實判斷。雖然那個時候，所有政府宣傳是企圖向保加利亞人民證明「事實上德蘇是軍事同盟」，是「不可分離的朋友」，齊維科夫的關於蘇德關係的普通常識並未被導入歧途，也絕不肯隨波逐流。（這還是在一九四一年三月。）

他有他自己的解釋：俄國並沒有放開保加利亞，好讓德國人去佔領它。俄國解放了保加利亞就可以在巴爾幹有一個忠實的朋友，因為俄國在黑海和海峽方面是有權益的。無論誰要佔領保加利亞，通過保加利亞去控制海峽，誰就會自然變成俄國的敵人。希特勒每月可以發表二十次演說，宣誓一百次，說他是俄國最好的朋友——這是不能騙人的。如果他真够朋友，他就應該不來巴爾



幹，遠遠地離開海峽。……

齊維科夫還是一個哲學家。他談到上帝與人，地球與太陽，鄉村與城市，等等。他對於每一件事情都有自己的學說，但也很熱心地傾聽別人的見解。他愛各種方式的談話。所以，有這麼一天，剛剛吃過午飯，我正在那裏洗刷碗碟的時候，他走過來對我說，他要單獨見我，我倒並不覺得奇怪。我把碗碟放在盆子裏，躲開別的囚犯，走了過去。他的眼睛裏帶着搜索的光芒，他也不能用通常鎮靜輕緩的聲音說話。顯然是出了什麼亂子了，我還沒有問他，他就悄悄地说：「我要正式地跟你談一次話，但現在可沒有功夫。是很長的故事，而且必須我們兩個人單獨地談。」

這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什麼事情呢？也許是外邊的朋友給我們送來一封信。也許他們要槍斃我們，齊維科夫是來警告我們的。也許是要釋放我們。

「今晚午夜以後是我值班，」他又說：「我到你的屋子裏去叫醒你。我們可以在平台上談話。」

我又回來洗刷碗碟了，但整天下午，我儘想着我的午夜之約。

齊維科夫就照他向我訂定的在午夜以後幾分鐘，叫醒了我。他比白天更加激動了。

「輕點！」他悄悄地說，「不要出一點聲音。穿上大衣。今晚冷得很。我在外邊等你。」

我們墊起脚尖走到樓梯那裏。他把旁邊的垃圾箱拖了過來，讓我坐在上邊，他蹲在我的旁邊，

把槍夾在兩腿之間。

「好了，是什麼事情呀？」

「我就告訴你全部的故事，」他說，「是關於聖人的。她要死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聖人！什麼聖人？你可別開玩笑啊？」

但我立刻看出他是很認真的。他很快地說，有時眼淚閃耀在他的眼睛裏，齊維科夫把聖人的故事告訴我了。

三月初，有一羣囚犯押到阿森諾夫城的地方警察總局來了，那時，齊維科夫正駐在那裏。一共七個人，六男一女。男的都是普通刑事犯，那個第七號囚犯，那個女的就是惹出事情來的。她不是個平常的女人，她是瘦弱極了，使你覺得只要碰她一下，就把她碰碎了似的，沒有一個警察敢碰她。到底是個聖人。第一，雖然她只穿一件薄大衣，單鞋，絲襪，外面有暴風雪，她也不怕冷。穿着厚衣服，裹着毛毯子的刑事犯盡在那裏發抖。警察都穿着特製的冬季的皮靴，穿着厚羊皮衣，他們還是不斷地咒罵着寒冷。只有這個女人一句話也不說。她一個人站在走廊上，冰冷的風颳着她的頭髮（她沒有戴帽子），顯然她並不覺得冷。她的臉呢？只要你看一下，你就會永遠記得。蒼白而且倦怠，但美麗還是從臉上照耀出來。她的眼睛是烏黑，溫和，深遠——比海還深，比天還遠。

這個女人是誰呢？她被作為女間諜而被捕的。她的名字是安吉拉拉沙羅夫 (Anzhelika Sharova)。據說她是個傳教士。一個和美國人在一起工作的新教徒。她和英美人士在一起太久了，當局就懷疑到她的教會工作是別種活動的掩護。當然，這都是無聊的，聖人怎麼會當間諜呢？在索非亞警察監獄中，她停留了幾天，當局盤問她，完全是徒勞心機，即便是最有經驗，最無情的稽查官也未從她那裏得到什麼。她引用聖經上的原文回答每一個問題。她心裏頭記得整本的聖經。她脖子底下掛着金十字架——神聖的十字架，他們想沒收它，可是沒敢這麼辦。

索非亞警察局送來的公文裏的指令是立刻把她送到斯威提尼古拉婦女集中營去。警務長下令叫她必須立刻離開，由警察押解。是下午五點半了，外面已經很黑。暴風雪越吹越猛，沒有人能走路了。晚上啓程，要在這樣的天氣裏步行六小時，只有警務長才有這種幻想。齊維科夫和另一警察正好值班，當晚就奉派押送那位聖人。在他當警察四年以來，這還是第一次提出抗議。警務長握着拳頭，敲着桌子，對他叫道：

「我不要這個女人留在這裏！你就照着我說的辦事。你這膽小的傢伙！怕雪！滾出去！」

齊維科夫離開警務長的辦公室，回到宿舍裏去，他的同事給他穿上所有能找得到的厚衣服。穿着厚羊皮大衣，是這麼沉重，槍都拿不動了。他們去請那位聖人的時候，他們吓了一跳，她既無行李，又無衣服。他們給她找來一雙兵士穿的沉重皮靴，一件厚大衣，穿了起來，一直拖在地上。她



笑了笑——這是警察們第一次看見她笑——他們也羞慚地對她笑了。後來，他們扯過一條氈子，披在肩上，這樣就動身了，三個人，走向含有敵意的夜晚，走向暴風雪……

要走半小時，才離開城裏。他們擠在一起走路，因為聖人太衰弱了，不能毫無援助地去與暴風戰鬥，他們用手臂挾着她。最後，他們走出城去，到了一條通入森林的陡峭的小山徑，大概是七點了。齊維科夫希望趕快走進森林，那裏會稍為不冷一點，從蓋滿了白雪的樹枝間透過來的風會不那麼猛烈。但是還要走一個鐘頭纔能進入森林。大風把白雪吹在陡峭的山坡上，小徑的痕跡也不見了。幸好齊維科夫和另外那個警察都很熟悉這一帶鄉村的道路，不然就要迷路了。但是，此刻天氣更加寒冷了。齊維科夫雖然穿着厚大衣，還是覺得冰冷的風刺入骨髓。牙齒大聲地打顫。他的同事也在發抖。但那些人却不言不語慢慢地艱步前行。

他們終於進入森林。齊維科夫知道他的希望又完了。風倒是真的不怎麼猛烈，但是應該往那裏走就更難了。白雪和樹木在他們的前面無盡地延伸着。所有的樹木在冰凍的晶瑩的背景裏都是相似的。雪地上有新印的足跡，那是剛剛走過去的一隻狼。他真替那位聖人擔心。她走得更慢了，突然倒在地上了。

他們拿雪擦她的臉和脖子，可是還沒有醒過來。她和一具屍首一樣埋冰冷，但她還沒有死。她

還在呼吸，呼吸出來的白氣昇向寒冷的夜的空氣裏。如果他們逗留在這裏，他們就要冒凍死的危險。齊維科夫的四肢已經麻木了。他們必須接着走下去。走——這才是要緊的事情。齊維科夫把聖人當個小孩子似的提在手臂裏。

但是半小時以後，那個同事也跌倒了。他主張就在那裏休息一會兒。齊維科夫知道，如果一休息，就站不起來了。疲倦征服了你，你覺得必須坐下休息幾分鐘。後來，你又覺得非睡覺不可了。好吧，你睡吧，你飄進美麗的夢鄉，你再從夢裏醒來，就已經死了……

齊維科夫真的嚇慌了。手裏提着一個半死的女人，一個要死的朋友僵臥在雪裏，他一個人怎麼辦呢？他真想現在在這座樹林裏再遇見派他們出來的那個警務長。他要掏出手槍來，打死他。是的，一定要歡愉地槍斃他。槍斃，是的，槍斃……槍斃，啊！他真笨，爲什麼不早點兒想起來這事呢？這是最後的一線希望了。他把聖人輕輕地放在雪地上。後來，他就向右方的黑暗中開槍，先開手槍，一槍，兩槍，三槍，又放步槍，打了五顆子彈。他放完了最後的一槍，就又挾起聖人來，在雪地蹣跚前走。他回頭看了看靠着一顆樹躺着的同事。他自己也想坐下來休息了。他的意志也模糊起來，神經都麻木了。他知道，現在末日就要來臨，他沒有力氣再想了。他坐了下來，手裏還是挾着那個聖人。她的臉像雪一樣的白，像雪一樣的光輝。她像是一個安琪兒。他屈下身子，當他突然聽見……難道是他的幻想嗎；是槍響啊，後來又是一響。有人聽見他放的緊急求救的槍聲了。救

命的來了。

他努力舉起槍來，搬動槍機。這回可沒有錯兒了；又有幾聲槍響撕破了森林的靜寂，在回答他的槍聲。

x

x

x

x

x

「來救命的是兩名森林守兵，」他接着說下去。「幸好他們的草房是很近。他們來到我們的面前，我們都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很難把我們拖進草房裏去。他們給我喝了一點烈性的酒，又喝了一點滾熱的茶，我立刻好了點兒。我的同事也喝了一點滾熱的茶，他在說着謔語，凍僵的腿痛苦極了。」

齊維科夫歎了一口氣，我渴望着他再接着說下去。

「他們拿雪擦聖人的全身，她也甦醒過來了。她張開眼睛，喃喃地說：『啊呀！』守兵也立刻看出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他們也罵起那個警務長來。他們時常恨他——這一區裏的人都是如此。他們給我們吃麪包，熱豆湯，疲倦得就在那裏睡着了。第二天早晨，風更大了，到了黃昏，就真的變成了颶風。那時，我們想着，我們的草舍會被吹倒，草舍像一個玩具似的躺在山邊。我們就這樣被雪困住三天三夜。聖人吐血了。她坐在大爐邊的小椅子上，眼淚流在面頰上，她告訴我們，她的小男孩還在索非亞患着重病，她簡直不能想到別的事情。她常常輕聲祈禱。到了第四天，天晴



了，我們可以走了。我一路挾着聖人把她送到了婦女集中營。我把她交給當局，立刻急忙回來向那個警務長報告。我把整個兒經過都告訴他了，他好像很擔心的樣子。他答應派兩名警察，牽了一匹馬去接我的同事，兩天以後，他從草房裏回來了。同日，聖人又從集中營裏送回來了。那裏的醫生說她患肺癆就要死了。不是普通的一種，而是奔馬性肺癆，兩個月就可以讓你死掉。把她送到普洛夫狄夫醫院，那裏的醫生說她頂多只活一兩個星期了。因此，我決心來問問你。我們怎麼辦呢？

「坦白地告訴你，我一時想不出什麼辦法。也許你可以給她的家裏送一個信兒去。……」

「她的家麼？」他打斷了我的話，興奮地說：「她的丈夫就在這個集中營裏，睡在你那間宿舍裏。他是你的朋友阿森拉莎羅夫（Arsen Lazarov）啊。」

「啊呀！爲什麼你不早說？」

「今天以前，我自己也並不知道。我想，我最好首先告訴你。」

「讓我想想，能够辦點什麼事情。明天早晨我們再談一次。」

我回到宿舍裏，叫醒了喬治。不把所有聽到的事情都告訴他，我就睡不着。離我們五碼遠，阿森拉莎羅夫在恬靜地睡着。他一點也不知道，明天早晨還許跟我們開玩笑呢……

安吉拉拉莎羅夫太太和美國人一起工作了廿多年。她是黑海沿岸納瓦爾城一個小康之家的女

兒。十八歲那年，他到索非亞大學去讀書，她的父親跟她麻煩，威脅她，她若不回家，就不許她繼承財產。家裏金錢的支持斷絕了以後，她就和別的學生一樣決心去工作，或者就餓死在大學裏。她在郊外租了一間可憐的房子。和兩個同學同住。她在小飯館裏當女侍者混點飯吃，她在商店或公事房裏做事，得到可憐的一點收入供她一月花費。但是她利用閒暇時間，在大學的圖書館裏和課堂裏，以赤熱的心情在那裏工作，只有那些從食物上節省出來錢去購買教科書的人纔能懂得這種赤熱的心情。

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安吉拉碰見了愛迪思烏格拉斯女士 (Edith Douglas)，她是一個三十五歲的美國人，她有老早就灰白了的頭髮，友善的藍眼睛，和一顆高貴的心。不到廿歲的時候，她跟一個美國教會一同來到保加利亞，從此以後她就住在保加利亞了。辦好事是她的職業。聖誕節的時候，他帶着從瀾朋友那裏收集來的禮物在貧民區旅行，她碰見了安吉拉。安吉拉知道烏格拉斯從最初就能互相理解。安吉拉的活潑，愉快，孩子似的熱心吸引了烏格拉斯。烏格拉斯也給了安吉拉很深的印象。她倆很有些相同點，這個女學生會向貧苦與艱困做熱切的戰鬥，以冀求得學問；這個年長的傳教士，離家數千英里，把生命貢獻給貧苦無告的人們，她倆不久就成了好朋友。

安吉拉獲得學位之後，參加了烏格拉斯的工作，幾年以來，都是她的最忠實，最得力的助手。烏格拉斯從美國得到一大筆基金，就和安吉拉在一起組織福利社，捐助醫院，開辦幼稚園，建立了

幾個婦女訓練班。她訪問全國各地的工廠，學校，鄉村，安吉拉到處伴隨着她。廿五歲那年，安吉拉和阿森拉莎羅夫結婚，他是曾經幫助過她的富有精力的青年商人。她生了兩個小孩以後，很少功夫和烏格拉斯一起工作了。她愛這兩個孩子，但和烏格拉斯的友誼還是毫未減低。

這個時候，阿森必須搬往黑海沿岸港口布爾格斯去開設分行。安吉拉還和她的兩個男孩住在索非亞，孩子在那裏上學。戰爭爆發的時候，阿森幾乎破產；他的事業大部份與運輸有關，差不多都停頓了，由於他的精力和機智，他計劃把它恢復起來。

安吉拉呢，戰爭又使她忙於社會工作了。烏格拉斯在幾個月以前回美國去了，好像是不一定能够回來了，所以所有慈善機關的責任都落在她的肩上了。她遇見烏格拉斯的舊友，索非亞等地美國大中學校的教員。她辦的是學生圖書館和招待所的工作，使她必須和索非亞英語聯盟取得聯絡，以後，又和管理這個聯盟的英國協會往來。她從來沒有想到她的活動是被警察認為可疑的。

當安吉拉常常前往英語聯盟的事情被報告給警察局的時候，「英美課」課長就派了一名偵探去盯她的梢。從軍事的眼光去看，安吉拉在首都常常去的地方是很重要的；都是軍火庫，中央電台，工廠，和兵營的附近地帶。英美課課長大大地感到興趣。他追縱到未被懷疑的安吉拉全家，當然他馬上發現了另外一件最富提示性的事實：她的丈夫住在布爾格斯海港，他的事業是和船與運輸有關的。還有一點，他是在禁港裏工作着的。從此以後，安吉拉的黑名單紀錄和阿森的紀錄上面，就有



了這麼一條標題：「可疑」，不久又變成「極可疑」了。一個警察永遠盯住安吉拉個人，把每一件活動都報告給警察總局，布爾格斯警察局接到訓令，要嚴密監視阿森。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阿森奉召入伍，被派往土保邊境。根據李斯特將軍的訓令，所有保加利亞軍隊都要集中在這裏。在祕密的掩護之下，李斯特的參謀部已經是在索非亞工作着，就是在那裏，組織了整個巴爾幹戰役。李斯特將軍後來變成了入侵希臘和南斯拉夫軍隊的總司令，最後成了一個元帥。阿森在邊境上住了三個月，挖掘戰壕，建造工事。他很歡迎德軍正式開進保加利亞的那一天——三月二日——因為就在那天，他奉命回到布爾格斯去。他對政治毫無興趣，在戰爭裏還是非常自私，他所歎惜的只是對於他的事業帶來了不幸的結果。他不喜歡德國人，因為是他們迫使保加利亞動員的，所以他才被動員了……

阿森到了布爾格斯，立刻就到當地的團部裏去報到。值日官召見阿森以前，他還等了半天。

「阿森拉莎羅夫嗎？」

「是的，先生。」

「你已經被捕了。」

阿森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被捕？但是……我……弄錯人了吧。」阿森訥訥地說。

「我並不知道你的案子，」軍官和善地清楚地說明這件事情，「我所知道的只是負責逮捕你，把你交給警察。」

「那麼我是退伍了嗎？」

「我不知道。」

「我在軍隊裏是不能被警察逮捕的啊！」

「從前不行，現在可不同了。」

兩個穿便衣的走進來了，抓住阿森，放入汽車裏，送往警察監獄，住了四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誰逮捕他，爲了什麼，完全不知道。第五天他又和另外四人被送往車站，推進一輛三等火車裏，上面寫着「囚車重地閒人免進」。車上有五十幾個人，大家都和他一樣糊裏糊塗的，沒有刮鬍子，很髒的樣子。沒有一個人知道他們爲什麼被捕，警察也沒有問過他們一個字。其中有七名兵士，和阿森一樣，沒有說明一點原由，就從戰壕裏抓來了。有從教室裏被捕的教員，工人在工廠裏就被抓了起來，醫生在早上兩點鐘從床上拖出來，碼頭工人在港口船上卸貨的時候被捉了起來。

晚上火車開走了，第二天到了普洛夫狄夫的時候，阿森的神經錯亂了。「殺人犯呀！血腥的殺人犯啊！」他大叫道。我是在那裏第一次見着他的。當把他帶進普洛夫狄夫車站監獄時候，他還在嗚咽呢。喬治對我悄悄地說：「別管他。他會平靜下來的。」

同時，毫不知道丈夫命運的安吉拉，正在索非亞的房間裏痛哭。她的鄰人，一個現在又入了伍的退伍的上校來安慰她。「你不必着急。出事的時候，我正在人行道上站在狄瑪（她的孩子）的旁邊，我大叫了一聲，他沒有聽見，他被汽車撞倒了，汽車停住了，沒有從他身上軋過去。他們是德國人，人地生疎，不知道這是一條死巷子。」

「啊，這羣野人，」她哀泣着，「他們到什麼地方把災禍帶到什麼地方。」

救護車開來了，把狄瑪送進醫院。他在手術室留了兩小時。三根肋骨被撞斷了，肺的下半受了重傷，兩隻手都被卡車輪子壓爛了。醫生表示沒有多大希望了。

清晨，安吉拉從醫院裏回家來，搶着睡幾個鐘頭。她就在那裏被捕了。

秘密警察局英美課長坐下來吃早飯的時候，大大感到滿足了。那天晚上他的部下順利地完成了他的指示：另有一批七十名「英美派」都被抓了進來。過去四天以內一共逮捕了三百三十六名。辦得好！他的迅速的行動拯救了保加利亞，不至於遭逢領英鎊的賣國賊發動國內的騷亂了。

課長啜了一口咖啡，又看了看那張嫌疑犯名單，他讀這些人的名字，政治家，前任部長，新聞記者，公務員，工人，男的女的。



他按電鈴，進來一個穿便衣的。

「拉沙羅夫太太怎樣表示？」

「她不肯開門，我們是闖進去的。」

「後來呢？」

「她喊了起來。一個穿着睡衣的男孩子走了進來，我們當頭給了他一拳，他就不再麻煩了。我們用手巾塞住她的嘴，就把她帶來了。她在十四號監房。還在嚷嚷着孩子和醫院什麼的。又罵德國人殺了一個什麼狄瑪，什麼狄納的，我也弄不清楚。我最後一次看見她，她在祈禱呢！」

「她不能拿宗教活動來騙我們。她是一個美國女間諜。」

「她胸前掛着一個十字架，現在還掛着呢。」

「你爲什麼不把它沒收下來？」

「值日兵想把它拿下來，但……」

「說下去！」

「他不敢拿。」

「她媽的，這是什麼意思……」

「是的。她喊道：『不要碰十字架——上帝會處罰你！』她看着他。」

「你是怎麼一回事兒呀？你喝醉了？」

「沒有啊！」他的眼睛不安地看着地下。

「你後來爲什麼不在上帝的名義之下，再拿下那個十字架來呢？」

「我不敢。說實話，我不敢。我也不懂。這個女人有點花樣。他儘看着我……。」

「你這個混蛋，怕這個女人呀，她是一個卑鄙的間諜啊！滾出去，把拉莎羅夫太太帶來見我。」局長，他的助手，以及野蠻出名的傢伙都把安吉拉毫無辦法。他們用飢餓威脅她，她答道，

「基督說人不能單靠麵包過活的。」他們用刑罰威脅她，有一天晚上，把她拉到三層樓的刑房裏去。她沉靜應付，毫不畏懼，悄悄地說：「上帝原諒他們吧，因爲他們並不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情。」他們用死威脅她，她的態度還是不變。警察給她起了聖人的雅號。夜晚，都到她的監房裏來。他們尊敬地聽着她，她把好日子的慰藉與希望的溫柔字句說給他們。

局長承認失敗，下令把她送到阿森諾夫城附近的婦女集中營去，齊維科夫是在那裏第一次見着她的。

那天晚上，喬治和我都睡不着了，不知道明天是不是要告訴阿森。齊維科夫告訴我，在安吉拉被捕的幾小時以後，她那在醫院裏的男孩狄瑪就死了。她並不知道。阿森當然也不知道。

最後，我們決定不再瞞着阿森了，特別是也許還有一線希望拯救安吉拉，那是通過朋友們的協助，或者乾脆向政府請願。我們告訴了他，他轉過身去，喃喃地說：「現在我相信我能殺人了。」但是他也毫無拯救妻子的辦法。他深自克制，毫不躊躇，他和他們一樣地生活着——工作與睡覺，玩笑與叫罵。

五月底，齊維科夫調到另一集中營去了，警務長注意到他和我們很好。七月——我離開集中營之後——他又調回來了。另外一個警察給我帶來了他的一封信，說是阿森還沒有被釋放出來。兩個月以後，附近的一批英勇的青年工人進攻集中營，企圖解救囚徒，沒有成功，值班的齊維科夫被打死了。

安吉拉從普洛夫夫狄夫的醫院被送往上帝才知道的地方。後來我聽說她死了，但是所有我遇見過

的警察都否認這件事情——一個聖人是不會這樣死去的。



## 第十一章 救命的司機

在集中營裏，一天最快樂的時間是晚上七點半鐘以後，在那個時間以後，是不準我們離開那坐大樓的；如果有人想跑出去，守衛是奉命可以開槍的。所以，我們常常集合在一間較大的宿舍裏，也沒有書，也沒有報，只好各自講每一個人的故事，消磨時光。有一天晚上，喬治告訴我們兩三年前在莫斯科的一次慶祝會中看見了史達林的印象。工人黨中最倔強的一個黨員崔契科夫，分成三次給我們講過引人入勝的西班牙內戰的故事，這次戰爭，從頭到尾他都參加過。另有一次，他對我們描寫所有歐洲各地的監獄，他的驚人的結論是德奧合併之前的奧地利監獄是最好的。另有一些聽衆，也是關於這一問題的權威專家，都一致同意他的見解。

波波夫斯基告訴我們一段有趣的故事，他是一個索非亞的記者，是被政府封閉了的「鐘報」的主人。一九二四年，他被任爲保加利亞駐阿爾巴尼亞公使。他是馬其頓恐怖團體的死敵。

有一天，地拉那保加利亞公使館門前有人來訪。他說是從波波夫斯基的父親那裏給他帶了一封信，他被請入公使的書齋。顯然那個人的神經十分緊張，當那人把手伸進他的衣袋的時候，波波夫斯基也掏出了手槍。時間正好！那個人的手剛要一動，波波夫斯基就先開槍了。他的目標很準

確，射中了刺客的手。那個人承認是一個馬其頓人的領袖派他來的。波波夫斯基把他的故事告訴給我們，又宣佈出來那個馬其頓人的領袖，非但是在這個集中營裏，而且就住在波波夫斯基的宿舍裏，已經變成了他的好朋友了！他對政治戰改取和緩手段了，我要很高興地說，就是在波波夫斯基把他辨認出來以後，他們的友誼也毫未消滅。

輪到我講的故事是唯一與祕密政治活動、暗殺，或政變毫無關係的一段。差不多就是一段怪事……

二月廿四日，星期日早晨，差不多剛打六點。真討厭，電話把我吵醒了。是美國大使館的秘書勃布格里格斯。

「你立刻到大使館來。公使要見你。」

我罵了勃布和大使館幾句，這是無聊的玩笑，就把電話放下了。勃布又來電話，對我保證，確有急事。我從床上爬了起來，穿上一條褲子，就跑出去了。

汽車司機看着我，吓了一跳：「啊呀，又有戰爭爆發了嗎？」

「沒有！」

但是他並不相信，他開動汽車，我聽見他喃喃地說道：「你們新聞記者六點鐘起來是不會鬧着

玩的。」

我到了公使館的時候，合衆社記者司培克和勃布正在屋子裏走來走去。許多新聞記者也在那裏，厄爾也在。

厄爾的樣子像是忘了先脫衣服就洗了一次淋浴。褲子都濕透了。襯衣敞開了，拉在肩膀上，肩膀上有一大塊黑色的傷痕。

「你們看吧！」他訴說着。

一個鐘頭以前，美國公使約翰和司培克都坐在麥克辛酒巴間的一張桌子旁邊，平靜地喝着粗劣的白蘭地酒。他們已經很疲倦了，正好剛要走出去的時候，樂隊爲了討好公使起見，就奏起「提柏拉里曲」來。（提柏拉里曲 *Tippahery* 是一九一四年歐戰時英國遠征軍人愛唱的軍歌。——譯者註）時間很晚了，酒巴間差不多空了，但是桌子對面還坐着一大羣人。有一個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喝令樂隊指揮停止演奏。經理趕快跑到厄爾面前，說這些先生們是假扮平民的德國軍官，他們認爲演奏「提柏拉里曲」是對德國軍隊的故意侮辱。厄爾點了點頭，把樂隊指揮招了過來，給他手裏塞了一張紙條。

「提柏拉里曲」又奏起來了。德國人站了起來對厄爾開始叫喊，讓他馬上止住。美國公使喊道：「這是中立國呀，我愛聽什麼音樂就聽什麼音樂。」德國人退了回去，又出了一個更有效的方



法去堅執他們的主張，給樂隊送去一大筆小帳，樂隊就當然報以令人欲困的探戈舞曲。厄爾從筆記本上又扯過去一張紙條，「提柏拉里曲」又響起來了。德國人可受不了了，其中的一個人照着厄爾的腦袋丟過一個香檳酒瓶來。他低頭避開，瓶子打到了手臂上。真可恨，他從他自己的桌子上揀起一個空瓶子，向那個德國人猛丟過去，正好打中那傢伙的頭蓋骨。

那個德國軍官倒下了。血從頭上流了下來。樂隊停止演奏，人都跑了，經理躲了起來，採取不干涉主義，女人叫了起來，燈光熄滅了，一個保持冷靜的不知姓名的流氓把抽屜裏的全部錢財都拿走了。

德國人不能不報失敗的仇恨。他們不管那個流血的傢伙，集中起來進攻美國公使。他們一共有十個人。他們根據德國大軍事學家史黎芬的計劃，實行進攻：右翼襲擊。這樣一來，美國人就用撕破了的大衣和褲子掩護退卻到戰略上比較有利的地位。他們把自己隱避在兩張桌子後邊，差不多用盡瓶子和酒杯了——這是他們僅有的軍火——這個時候救命的來了。

救命的是十五名彪形大漢的汽車司機。他們這一羣人剛剛走到街上，有一個茶房想起了個好主意——請他們進來參戰。厄爾，約翰，司培克三人都是司機們的最大方的顧客，他們就以極大的興趣進來參戰了。他們擊退德軍，把美國人救出了酒巴間，塞進一輛汽車，一直開往公使館。

當然這件事情造成了可怕的激動：在珍珠港事變以前，美國外交官打破德國軍官的腦袋是不常

見的。那個受傷的德國人在一個星期以內簡直是徘徊在生死之間，後來才漸漸復原。對於厄爾，這還倒好，沒有問題，如果那個傢伙死掉了，在索非亞的德國人就會把厄爾打死。還有，麥克辛酒巴間是人人盡知的德國人常常光臨的地方，其中半數職員是拿德國祕密警察的錢的。

第二天，所有的美國記者都把這件衝突的電報拍了出去。美國參院裏有人提議斥責厄爾，但是索非亞使館裏充滿了全美各地拍來的電報——「打得好，厄爾！」「再打他們一回，厄爾！」「希望你把他們打得起來，厄爾！」

那個德國人傷愈以後，這件怪事就算平息了。還有一個使人永遠記住這件事情的人是酒巴間的一的女人——露西，一個迷人的膚色淺黑的歌女，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她熱烈地站在美國人方面，向德國人丟過幾個烟碟子。結果她立刻被捕了，被禁閉在一個鄉村裏，但是她在那裏碰見了一個年紀較大的豪富的商人，就嫁給他了。於是她的故事有了個快樂的結束。

## 第十二章 史達林建議，希特勒佈置

集中營裏的囚犯大多是所謂「公約主義者」。他們是從全國各地逮捕來的學校教師，工程師，商人，公務員，醫生，學生，作家，工人，和農民。這些公約主義者是滿可改變東南歐全部戰爭形勢的一個事件的犧牲者。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三日莫洛托夫到了柏林。後來，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宣佈他訪問柏林表示歐洲德蘇權益第一次的衝突。德國外交部發表的內皮書說這個衝突不但由於對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問題意見紛歧，最要緊的是蘇聯堅決不放棄它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莫洛托夫訪問柏林時候，希特勒已決定進攻蘇聯，因為他已看清史達林反對他的計劃。所以莫洛托夫一走，希特勒立刻發動了外交攻勢，目的是鋪墊對蘇軍事進攻的道路。

希特勒邀見保加利亞國王鮑里斯。他們談了兩天，希特勒告訴他保國在德國的巴爾幹政治攻勢中要起什麼作用，希特勒覺得保國的作用是很寶貴的。這兒我要說說鮑里斯對希特勒計劃成功的最重要的貢獻。

希特勒和李賓特羅甫用巴爾幹蘇聯勢力的增大來威嚇鮑里斯。鮑里斯想到了紅旗特別心驚膽



戰。倘若反對他的國策的那些力量得到了蘇聯強大的支持，他的王朝便沒有希望了。於是他很快就答應了跟着希特勒走。南斯拉夫的保羅親王也這樣（因為同樣理由，甯親德國不親俄），羅馬尼亞的安多尼斯哥也這樣。一九四〇至四一年冬季德國在巴爾幹的反俄運動是這次戰爭中保守最嚴的祕密之一；同時德國的官方宣傳照常對德國的「盟友」俄國大事贊揚。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祕書長索包列夫到了索非亞，晉見鮑里斯時候提出了正是希特勒不讓他接受的建議。蘇聯建議立時簽立互助公約，換句話說就是軍事同盟。俄國準備依據公約保證保國的中立與完整，購買保國差不多一切的輸出品，並且正式向全世界宣佈誰若對保國加以絲毫侵犯，紅軍一定抗拒。俄國所要求的是俄國黑海艦隊在瓦爾納和布爾格斯的某些便利和允許俄國由自己出資擴充布爾格斯航空站（在布爾格斯附近已有一個俄國民用航空站供索非亞與莫斯科之間的定期飛機使用）。

鮑里斯告訴索包列夫說蘇聯的建議要經內閣討論，保國的答覆將來交給駐蘇聯公使。索包列夫走了，蘇聯公使等着……答覆始終不來了。俄國人自然不耐了。俄國人很知道保國人民一定都熱烈歡迎他們的建議，他們也猜疑——很對——鮑里斯政府可能遵照德國的指示盡力把蘇聯建議給祕密起來。倘若這個問題遷延過久，德國就得到喘息機會來加速在羅馬尼亞的準備。於是俄國把建議宣佈給保國各政黨。

各政黨在軍人同志會充份支持之下通過了個別的和聯合的決議案送交政府要求政府立時接受蘇聯建議。保國國會的反響尤其驚人。國會議員一百六十人大多數是在警察壓力之下選出支持政府的，但有一百五十四人作了一個擁護蘇聯建議的聯名呈文交給議長轉致政府。議長辦公室裏堆着全國各地拍來請求政府接受蘇聯建議的電報——沒有三個星期的時間他收到了十三萬封電報。到了十二月底時候他收到了二十萬封。電報上簽名的人計有一百五十萬（這個數字超過了選舉時的選民數目）。

那時全國氾濫了非法的傳單，「俄國保證我們中立！保加利亞人呀，要求政府立時締結軍事同盟！」索非亞每個房子（包括英德公使館，皇宮，和一切政府機關）的牆上用粉筆寫着「和俄國簽訂公約！」後來不久又有傳單氾濫了全國，可以算是一樣的，只差一點兒！「保加利亞人呀，要求政府立時接受蘇聯建議，俄國保證我們中立，並且給我們愛琴海岸！」一星期之後又出了一批傳單，裏邊除去俄國許給保國愛琴海岸之外，「還有土耳其的色雷斯。」

這是怎麼回事呢？

第一次傳單是工人發的，鮑里斯狡詐極了，他不公開和工人作對，他印了更多的傳單，把俄國許給保國愛琴海岸也印在裏邊來引人疑懼。保加利亞人都知道愛琴海岸是希臘領土，這就是說俄國願意犧牲希臘的利益，俄國和希臘作對。然而希臘跟義大利作戰，義大利是德國的盟友，所以德義

俄是合作的。這就是鮑利斯想叫保國人民相信的事情。

第三批傳單是德國的！德國把土耳其的色雷斯添進俄國對保國的許諾裏是爲了在土耳其人中間播下對俄國疑恨的種子，假借布爾雪維克政策的危險實行漁利！這種傳單是德國現實的典型的騙術。

十二月底時候，傳單戰線上的大戰門依然進行，索非亞的局勢很緊張。外長波波夫不敢在國會和外交部露面，還在家裏帶起沉重的外交病。鮑利新下令散播流言，據他的流言保國駐蘇公使正和蘇聯政府「談判」。這當然毫無事實——保國駐蘇公使斯塔門諾夫是個熱誠擁護俄保合作的人，他對於鮑利新的把戲一點也不清楚。最後，到了一九四一年一月，政府機關發表社論抨擊蘇聯建議是企圖「把保國拖入戰爭」，因爲保國和它的隣國關係很好，「蘇聯把保國的隣國的領土許給保國」。鮑利斯政府的目的是獲取時間並鋪墊德軍到來的道路。

倘若一九四〇年保國和俄國成立了軍事同盟，這個同盟能改變巴爾幹的戰爭形勢麼？我想能够。若有俄保互相公約，希特勒就不能順利地走進保國，因爲這意味着對俄戰爭——比他的計劃早六個月的對俄戰爭。他若在保國沒有基地，他不能從北面攻擊勇敢的希臘軍隊，也不能這樣迅速地粉碎了希臘軍隊的抵抗。在俄國和經由中東的英國的支持之下，南斯拉夫，希臘，和保加利亞軍隊結成的巴爾幹戰線能使戰局大爲改觀。

英國駐保公使藍得爾可以毫不猜疑地勸導保國政府接受蘇聯建議，但是他從未得到一個勸導的機會。保國外交部從未正式承認這種建議的存在，它正式把這種建議當作「共產黨的宣傳」棄置一旁。所以拒絕蘇聯建議的責任全在鮑里斯和他的閣員身上。一九四〇年十一月鮑里斯會見希特勒時已把保國命運和德國牢實地縛在一起，那年冬天他的一切把戲都是給保國人民佈置一個他們毫不知曉的既成事實。

俄保公約便這樣失敗了。一九四一年三月，德軍到了之後，在德國秘密警察協助之下，大批的逮捕開始了。「公約主義者」被捕了。至於給國會打電報要求訂立俄保軍事同盟的一百五十七萬人都捕起來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捕了其中最出色的男女五千人至七千人。其中最「危險的」男子——約二百五十人——送到我們的集中營裏。他們是著名的「公約主義者」。監禁他們的房子有個綽號叫做「郵局」，這個綽號爲的是使他們記住他們不幸的電報冒險。



## 第十二章 會 議

集中營的囚犯裏有十五個是醫生。每天早晨他們報告給警務長誰有病。按理有病的囚犯應該不必出去做工；但實際上這完全要看警務長的心情好壞。他心情好的時候很少，常常在別的囚犯出去修路時候，他叫病人打掃集中營或者在廚房裏工作。這種特殊工作往往特別地苦，以至病人甯可規避這種健康不良的便宜。他們不讓醫生去報告他們有病，他們甯願一搖一擺地出去做工。

這十五個醫生之中一個最精明強幹的是一個長着一副愉快的面孔淡藍眼睛的高大強健的人。他大約六十歲了，總是微笑，總是忙碌。他的名字叫保爾達哥夫(Parit Tagov)，我們稱他保爾大夫，或者稱「大夫」。他是個公約主義者，他在一九四一年六月初間死了。

集中營裏每個人對於大夫的死都大為震驚。他是害斑疹傷寒死的。這種病來勢突然，高度的熱要燃燒三四天工夫。倘若病者的心臟強壯，還有點兒活的機會，但百分之六十多是不可救治的。這種病的可怕是它侵入許多人聚居一處的地方能够迅速發展成狂烈的傳染病。

六月上旬可怕的傷寒進了我們的集中營。一天晚上有十個或十二個人發起高熱。保爾大夫樣子很憂愁，他到警務長的屋子裏去了好幾次去見警務長。過了兩天，這些人都被送到城裏，從城裏

又送到普洛夫狄夫的監獄醫院。後來有個警察告訴我他們都死了。

「一天半夜裏保爾大夫從他的「床」上起來，搖搖擺擺地，力盡聲嘶地喊叫：「都起來！都起來！」

我們安慰他，但是他已不認識我們了。

「我家的人都來了！」他嚷着。「我的女人和我的兩個女兒。告訴他們我平安無恙，我不久就回家了。」他突然不說話了，憤怒地注視我們。「你敢動我麼，你這污穢的警察豬仔。是的，我在那個電報上簽了名！我反對希特勒！反對國王！反對政府！不準動手！」然後他的聲調改變了。他的聲音低得像耳語了：「督察員，請准我看看他們。我已經七個月沒有得到他們一點音信了。我都要忘掉他們的面容了。請，請准我看看他們……」

我們設法讓他躺下。五點鐘時候警察來了用繩子把他捆到一匹馬上送他到醫院裏，馬要走五個多鐘頭纔能到醫院。

x

x

x

x

x

我們再也沒有見到他。警察告訴我們說他死前會把他太太叫去，但是他始終沒有清醒過來。縱然這樣，她都沒有得到許可單獨和他在一起。兩個警察不分晝夜在他屋裏逗留着：他在警察監視之下死了。

我們很煩惱，我們拒絕出去修路。警務長害怕我們暴動，另外請派了一百名警察來。這更叫我生氣，我們仍拒絕工作，於是警務長命令我們清理我們的宿舍。好個聰明的詭計，因為他知道我們是何等害怕傷寒的。

我們營裏的情形實在駭人。衛生條件壞極了。我們睡在擁擠的宿舍裏，一齊擠在地板上好像罐頭裏的沙丁魚。沒法防止一個人身上的蝨子爬到另個人的身上。蝨子是傷寒病的運送者。可是我們都有蝨子。

我們人人都有了「蝨子意識」，我們到處找蝨子。人們時時刻刻脫了衣服找蝨子。找到一個蝨子時候要極鄭重其事地走到爐子跟前把它火葬。我們都彼此害怕對方的身上有蝨子。我們用粗野的玩笑平抑我們的焦慮，但是不行，而且沒有一個人笑。

「別麻煩我，不然我就把一個蝨子扔到你身上去。」

「你不必發愁，你那麼瘦，蝨子也不至於自降身份去咬你的。」

我必須中夜纔能入睡，可是早晨兩點鐘治使我叫醒了。

「靜些！起來跟我到別的屋子裏去。」

「什麼事？」

「赤色大廳裏有個會議。快點！」

我穿了上衣，我們一聲不響，用脚尖走到門前。我們靜悄悄地進了赤色大廳——我們坐隣的宿舍。

不久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由工人發起的一個會議在這個屋子裏舉行。從別的宿舍來的人由工人們派人去接佔床位免得警察檢查時候有什麼異狀。工人領袖之一丹却夫作主席。他開始說話了：

「我們現在有個最重要的問題，也是個很簡單的問題。我們必須設法改善這兒的情況。倘若我們不改善，我們都要死。我們首先必須考慮我們之中是否有人能夠逃走。」

「這是不可能的」。喬治插嘴說。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我問。

「因為從今以後我們不是因為政治理由却是因為健康理由被隔離了。我們是個公共危險。」

「但是他們就應該不關心這個隔離地方麼？」

「當然他們應該關心的，他們應該派專門醫務委員會來視察。」

「那麼他們也須派醫生到這兒來麼？」

「他們應該派，但是他們不派。我要告訴你為什麼……」



他的話沒有說完，我們便聽見外面走廊上越來越近的笨重的脚步聲。

「裝做入睡罷。」丹却夫說。我藏在毯子下面。一切都沉靜了。後來我旁邊有一陣可怕的噓聲衝破了沉靜。

「就在這兒數數他們，不用進去了……」一個警察說。

「對麼？」

「對的，都在這兒。」

他們走了。

「你們不該太靜，你們這羣傻瓜，」喬治打破了沉靜。「你們是要裝做入睡的，不是要裝死的！至少你們裏應該有十個人做出噓聲，因為這是任何宿舍中的正常現象。但是你們沒有腦子。只我一個做出噓聲！」

我們不能跟他生氣，因為他完全對。他確乎比我們更會應付這些事情：所以在他又說話的時候，我們保持了敬重的沉默。

「首都警察知道了這個集中營裏有了傷寒病。內政部長也許知道，但也更可能不知道。不要忘記傷寒是保加利亞最危險的疾病。不要忘記倘若這種傳染病蔓延起來，幾個星期之內可以死掉成千的人民。不要忘記倘若這件事情一喧揚出去就要產生對於政府不利的誹謗。於是衛生當局要大為驚

慌，因為要知道倘若傷寒傳播起來它是如何吃不消的。所以我認為倘若我們想救自己，我們必須給在索非亞的我們的朋友們送個信去。他們設法叫衛生當局知道這件事。必須告訴國會，然後我們纔能得到醫藥的援助。但這確是不容易的！」

（願意幫助我們的唯一的一個人是警察齊維科夫，但是那時他已離開集中營了。工人們普通的「交通」太慢了。）

「並不如你所想的那麼難。你知道巴奇柯夫村麼？」丹却夫反駁。

「知道，怎麼？」

「那兒我們有個忠實的朋友，什麼信都可以為我們往索非亞送。」

「那麼誰把信送給他呢？」

「這就是我們要在這兒決定的事情。」丹却夫回答。

x

x

x

x

x

討論又繼續了一個小時。最後丹却夫總結會議的決定：

「明天大清早三個人設法到營外去。我們在營裏要盡力偽裝他們沒有出去。到達巴奇柯夫村的有一個人，兩個人或三個人都可以。他們送了信，然後回來。我們要設法使他們安全返回。至於詳細辦法，由我和喬治擬定。技術方面的事我來負責。大家同意麼？」

有一點我不同意：爲什麼冒着生命的危險出去的人們還回來呢？爲什麼他們既然出去不可以設法逃走呢？但是丹却夫和喬治，以及別的「代表」都反對我的觀點。出去的人必須回來爲的是不起任何嫌疑。倘若他們逃走了，警察就把整個區域包圍起來，巴奇柯夫村那個人也不能到索非亞送信去了。倘若三個人出去，把信送到，安全回來，全營的人都得救了。衛生當局要派醫生帶着藥品來，病人送到醫院去，索非亞的人民已知到了營裏的真相。

喬治說：「我領着去。我很清楚這些山路，我也認識這個村子。」

丹却夫反對：「不，這三人由我指派。他們要都是屬於工人隊的。我們是這兒人數最多的，也是最有紀律的。」

「真笨！」喬治爭辯。「倘若我們被捉住，我們得使他們認爲這是個人自作主意的行動。否則，你們的隊或者我們的隊要被他們疑惑在組織更大的行動。我說過許多次，倘若我們要共同工作，我們要經常在表面上裝出個別工作的樣子。」

我們覺得喬治的話是對的。

「伊萬（丹却夫的名字），你從你們的隊裏揀一個人，」他接着說。「我代表平均地權派去。那麼還缺一個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人，米哈益爾（巴介甫的名字）怎樣呢？」

我百感交集地接受了喬治的提議。丹却夫問我「你願意去麼？」的時候，我也想不起來我怎樣

回答，我順口說：「是的，當然願意。」

交給索非亞一個國會議員的短信送到巴奇柯夫村之後，我們安全返回了。



## 第十四章 離奇的故事

三天之後，有天下午，正在修路時候突然來令停止工作。叫我們立刻到營裏去。我們一隊一隊地聚在警務長房子的附近。我們都有點兒不安，一個騎警從城裏來了，在警務長辦公室裏跟警務長談話。這是壞消息，我們知道騎警時常帶着解往軍法處的人們的名單來。

一會兒一個警察被叫進警務長辦公室了。他出來時候，人人注視着他。他走近我們這一隊，把喬治叫出去，喬治臉都蒼白了，但是還有心開玩笑：「我不是對你說過他們要頭一個釋放我麼？」沒一個人笑。警察把喬治帶到我們住的房子裏，並且告訴我們不准再和他說話。這是個新辦法：叫誰離營就把誰和他的同伴隔離起來。在喬治之後，他們又揀出三個「赤色份子」。然後又揀出兩個「沒有色彩」的人，再後來是兩個馬其頓人。最後警察來到我跟前。我隨着他走進我的宿舍時候幾乎氣都出不上來了。我急忙收拾我的東西，然後鼓起勇氣問：「我們到那兒去呀？」

他是個和藹的警察，他回答說：

「不知道，一個緊急命令到了。要十六個人去！」

一小時後，我們一個一個地通過了檢查處——警察的一間屋子，那兒有七個警察檢查我們，防

止我們把什麼東西偷到營外。當然我們又把衣服脫掉，我們的每件東西都要經過最仔細的檢查。

二十五個警察帶着步槍和刺刀護送我們。步槍都裝好了子彈，警告我們說警察已奉命遇有我們不服從的行動時候立刻向我們開槍。但是對於警察誰都不大注意。我們對於走都太興奮了。我們那兒去呢？監獄麼？另一個集中營麼？軍事法庭麼？真也奇怪，我個人不想離開這個集中營。首都警察局裏的那場惡夢在我的記憶裏依然清晰的。我離開了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真覺得難過呢。

下山是鬆快的。我們漸漸忘掉了我們的憂愁，甚而有個人開始唱起來了。感覺長途跋涉煩悶的警察也漸漸友好起來，參加唱歌。走了四個小時之後，我們從森林裏出來。阿森諾夫城擺在我們眼前。每個人都本能地開始更快地走起來。這個城好像一塊大的磁石吸引我們。這個城——一個質樸的平常的比個鄉村稍大的保加利亞的城市——對於我們是個神祕的有魔力的東西，是和外界的一個聯繫。好多月以來，除去我們自己的沒有刮修的面孔和集中營周圍的山岳而外，我們什麼都沒有看見。現在我們覺得我們回到文明裏了。我們繼續走，不久，我們便進了阿森諾夫城了。

「一個女人！」

她朝着我們走來，我們的眼睛釘在她的身上。我們看出她感覺到侷促不安，她立刻走進一個屋子裏不見了。喬治當然又跟我動起氣來。

「我們的樣子那麼可怕，」他說。「你們還把人家吓壞了呢！」我們彼此一看。喬治的話是對

的。我們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看着好像土匪。每個人都有副太陽晒黑，沒刮修的面孔，每個人不是拿着一塊毯子就是拿着一個袋子，我們的樣子一定是可怕的。一會兒六七十個小孩子聚在我們周圍。當然警察把每個人都要趕開，但是我們十六個和二十五個武裝警察非常惹人注意。我們越走近市中心區。圍觀我們的人越多。

「德國人！」

這又是喬治——無論什麼，總是他先看見。一羣德國人——一共有八個——從人行道上向我們走來，我注視他們。他們年青，漂亮，穿著好，顯然吃得也好，在阿森諾夫城！他們在這個和外界距離遙遠的偏僻的保加利亞城市做什麼呢？他們在整個歐洲——從納維克到西西里，從波爾多到奧得薩在做什麼呢？德國人！保加利亞農民稱他們為蝗虫。真是個好名字！他們像蝗虫一樣什麼地方都去，什麼東西都吃！

最後我們到了一座大建築物前邊，建築物的大門上寫着「阿森諾夫醫院」。我們同護送的警察進去之後，一位醫生的助手叫我們洗澡，他說這是照例必須辦的手續，我們不知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和喬治冒險去洗。

我們從一個石頭樓梯上了第二層樓。什麼東西都是潔白的。我們幾乎不相信我們的眼睛了。醫生的助手引着我們走進一道長而窄的走廊，那兒有幾個房間。「這兩個房間是你們的臥室，」他



說。「七個人睡在這個房間裏，九個人睡在那個房間裏。」我們非常好奇地把門開開，乾淨的床，乾淨的被單！桌子！碗櫥！「還有，這是浴室，」這個人接續說。一個現代的浴室。一個光亮的潔淨的浴盆和一個淋浴器。「時間充裕得很，不必着忙，慢慢地洗。你們必須把衣服脫在這兒。你們的衣服都得拿走。你們在這兒時候，我們要依照規例給你們特別的衣服穿。」連喬治都忍耐不住了，他對醫生的助手說：「你最好現在就告訴我們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幾分鐘的工夫，他都告訴我們了。在索非亞關於我們集中營裏的傳染病譏諷紛紛。健康部請求政府趕快防範，於是警察當局決定着手進行。據說集中營裏有幾個傷寒病人，所以把這幾個病人送到醫院裏。明天有個醫生專門委員會從索非亞來。

神祕揭破了——我們的信顯然送到了收信人手裏。這都是好消息！

洗完澡，我們吃了一頓美餐，後來我睡覺的時候——睡在一個有白被單的真正的床上。我們判定生活又美麗起來了。沒有什麼可埋怨的了。

夜裏，我和喬治醒了，我們討論「最重要的問題」——逃跑的可能。我們兩人的床緊挨着，我們小聲地附在耳朵上討論。我們覺得機會是很少的。

我們計算我們三個窗戶下邊有六個警察，花園裏邊有六個警察。整個醫院被包圍起來。醫院裏



邊，我們門外的走廊裏經常有四個警察值班，樓下的大廳裏約有十多個。然而最大的不便是我們沒有衣服。醫院的睡衣和長衫成了我們晝夜的制服。只有得到外援纔能逃跑。但是我們太疲倦，顧不到想那些個了。喬治說：「明天再說罷！」他入睡了。我也差不多立刻入睡了，那天夜裏我是幾個月來第一次睡在一個真正的牀上，我睡得像一個初生的嬰兒那麼甜美。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時候，醫生專門委員會由阿森諾夫城警察局長陪着來到了，他警告我們不准說別的，只說我們身上覺得怎麼樣。人人都答應說「是」。但是醫生來了時候，我按照預先詳細商妥的計劃把我們所說說的都說給他們了，他們逗留了一個多鐘頭。計劃很好，我們每個人告訴他們的都是不同的事實，把這些事實拚合起來正好構成集中營情形的一幅逼真的圖畫。我高興我們沒有一個人訴說個人的情形，我們只說營裏普遍的情形。這是處理這類問題的最好的方法。倘若我們說個人的情形，醫生們可能把個人的情形報告給政府，於是得不到結果。幾個月之後就判明了這次和醫生們的談話獲得了成果，我們營裏的情形改善了。

下午我們居然得到許可在醫院的空地上散步兩小時。公路那邊，不過一百碼遠，我們看見有座小小的房子；也許是什麼旅舍。這座房子沒有什麼稀奇——一座普通的一層的農舍，但是我們第一次看見裏面住着的人的時候，我們幾乎不能相信我們的眼睛了。五六個年青貌美時髦裝束塗着脂粉

的女人。這次最先看見她們的當然又是喬治。他說：「看那些外國的鳥兒。」她們之中有兩個沿着離醫院十分近的公路走着。她們兩個穿着白色的夏裝，涼鞋；裸腿，她們都晒黑了。她們也許是從某個時髦的海濱遊息地來的。兩個都長得很好看，而且顯然是外國人。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們覺得太奇怪了，我由不得向一個警察問她們是誰。

他笑了，他率直地說：「噢，她們是布加勒斯特女人！她們到這兒現在已經四個多月了。她們是爲德國軍官預備的！」幾分鐘的工夫，警察把一切詳情都告訴我們了；離城大約五英里地方是德國在巴爾幹最大的軍用航空站之一。德國空軍軍官來到時候，從布加勒斯特（到保加利亞的所有德軍都是從羅馬尼亞來的）在飛機上帶來了二十個妓女。這是德國最好的組織精神！但這兒是個具有很保守傳統的偏僻的小城市，這些女人弄得全城嘩然，市長向德軍當局抗議。這些女人太惹人注意了，產生了一個很壞的印象。德國人便把這些女人遷到城外的幾處房子裏。我們醫院附近的這個旅舍就是她們住的。

用飛機從布加勒斯特帶來二十個女人到這個偏僻的保加利亞城市裏讓德國軍官取樂！這是新秩序！這個聽起來彷彿是天方夜譚裏的故事。然而事實是事實。她們就在我們面前！我們能看見她們的身段和她們的面孔，有時甚而能够聽見她們大笑的回聲。傍晚時候我們看到幾輛德國軍用汽車載着德國軍官來會她們。

公路那面的女人把醫院的平靜空氣完全打破了。我們很興奮。對於十多個好幾個月甚而連張女人照片都沒看見的男子，這是正常的本能。

「你們看，」喬治神祕地說：「全部問題就是運輸。她們就在路那邊。我們在醫院裏。我有一個計劃。你們給我全權罷。」

「給你！」每人都大聲說：喬治的組織能力是驚人的。那天他經由他自己的關係祕密地收到報紙。他還計劃過往索非亞送信的事。至於公路那邊的房子，第二天他便給建立起聯繫了。當然一切都在他自己心裏。他的原則是倘若一個人知道某件事情，那就意味着只有一個人知道。倘若兩個人知道，那就意味着十一個人知道。倘若三個人知道，那就意味着一百一十個人知道。倘若四個人知道，據喬治的計算，就意味着一千二百一十個人知道了。

我是唯一知道喬治的計劃的人。他通過醫院的司關認識了廚師，通過廚師認識了園丁，通過園丁認識了那個旅舍的侍者。喬治託侍者把一封信送給那些「太太們」。晚上侍者報告都辦好了，有兩個女人願意隨時到醫院裏來。至於價錢問題，喬治和侍者經過一番長時談判之後也解決了。只有運輸問題沒有解決，但是甚而這個問題，喬治在幾小時之內都解決了。晚上這兩個女人坐着守衛警察從不檢查的載重汽車進來。司機當然也是和喬治要好的。然後廚師爲這兩個奇異的來客開門，那



兒沒有警察。喬治說：「她們只要一進來就再沒有障礙了！」她們大約晚上十點鐘來。喬治把這些佈置告訴我們之後突然說：「那麼你們叫她們今天晚上來呢，還是明天晚上來呢？」

「今天晚上，今天晚上！」幾個人高聲地說：「誰知道明天怎樣呢？明天他們也許把我們送回集中營去。今天晚上，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這是大多數人的意願。明天是不可知的。明天也許是監獄。明天也許是苦刑。明天也許是死。只有今天！今天晚上！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花園裏散步時候，司關告訴喬治說那個侍者要立刻見他。喬治覺得詫異，祕密地到了廚房去會侍者。我們等候知道這個神密的造訪的原因等得不耐煩了。大約過了半個小時喬治回來了。

「我從未遇到這樣令人驚奇的事情，」他說。他十分激動。這是個異常的現象，因為喬治是我所見到的性情最沉靜的一個人。我從未見過他這樣興奮過。「怪極了，」他接着說：「我不是常跟你們說現實生活中有時發生想像不到的事麼？真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事！」

「什麼事？」我們問。

「侍者把錢都給我們退回來了。那兩個女人聽說我們是政治犯就不要我們錢。她們也是反對德國的！她們是被強迫帶到這兒的，而且不准她們回羅馬尼亞。她們說她們像我們一樣恨德國人！」



我們驚奇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喬治笑了，接着說：「希特勒敗了，憎恨在四面八方把他包圍起來時候，他不能戰勝。甚而他供給他的軍官玩樂的妓女都從事反對他的工作！」

兩個女人——人們不能在她們身上找到貞操或尊貴的兩個平常的妓女，爲了金錢出賣了她們肉體的兩個妓女投了反對希特勒的票。

釋放我和喬治的條件使我們不得不越發小心謹慎。德國進攻俄國之前三天，我們從醫院被解到阿森諾夫城警察監獄裏。警察監督親自個別接見我們，並且告訴我們內閣大慈大悲決定了「有條件地」釋放三十六名囚犯。

他們准許我們住在索非亞我們自己的家裏，但是我們的身份證還留在警察手裏，白天我們可以隨便出門，天一黑便不准出去了。跟反對派政治家的一切接觸是嚴格禁止的。只有得到警察的特別許，我們纔能旅行。最重要的是不准我們和任何人，甚而不准和最高的政府官吏談論政治問題或描述集中營裏的實在情形。

這簡直意味着他們是爲了有時間和機會來杜造對我們更重的罪狀才釋放我們的。但是希特勒進攻俄國把我們救下了。六月二十二日以後的幾個星期裏，警察集中力量迫害極端的左翼份子。警察佔了索非亞四個學校的大建築物，並且改爲臨時監獄。只七月一個月裏在索非亞就大約捕了一萬

人，其中有多少被害死的沒人知道。

喬治提議我們應該利用這個肅清的時候逃走，我同意了。我們的計劃是往薩隆尼加去，從薩隆尼加到希臘南部，那兒有喬治的朋友，他們可以幫助他到土耳其去。他說：「第一，我們得遊覽遊覽馬其頓，那一定是有趣的。」

六月底，我同喬治離開索非亞，我們在馬其頓和愛琴海岸消磨了一個月。我們到了瑪里薩河（Moritsa River），但有德軍嚴密地把守着，我們不得不轉回來。喬治回到索非亞，過了兩天我也回索非亞了。我到他家裏，他的太太告訴我他幾小時之前又被捕了。

我們到馬其頓和愛琴海這一趟是個最有趣的經歷。我們（當然喬裝）同一羣被派往比托里亞（Bitola）組織衛生站的保加利亞醫生和護士走。喬治的弟弟——後來被捕，並且被判處死刑——是一個救護車的司機，他讓我們裝作他的助手坐在他的車裏。

在往瓦達爾河（Vardar）流域的路上，我們經過幾處南斯拉夫的軍人墓地，墓地邊緣上還拋棄着許多被毀的和失了效能的德國坦克車。德國的坦克縱隊會沿着這條路往西推進，在戰鬥開始的第二天德國的坦克縱隊便攻陷了馬其頓一切強固據點。那時沿着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邊界築壕防守的，在水泥掩蔽部和機槍堡壘裏的南斯拉夫軍隊等待着德軍的進攻。但是德軍始終沒有進攻。德軍

沿着通入馬其頓的僅有的三條公路進了南斯拉夫，把南斯拉夫的邊界堡壘留在後面了。南斯拉夫軍隊投降之後幾個星期，邊界上的南斯拉夫軍官和兵士仍在他們的崗位上，他們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德軍已經進了貝爾格萊德。集中在邊界上的南斯拉夫大軍準備打退德軍，但是沒有得到戰鬥的機會。他們沒有看見德國兵。

我們一到馬其頓時候使我們最驚異的是馬其頓的地下運動興緻勃勃逍遙自在地和保加利亞佔領當局住一個房子。

鬥爭在斯科普里，晚上七點就打戒嚴幕鐘。我和喬治在那兒住了一個星期，沒有一夜街上沒有戰鬥的。

保加利亞民族主義者說比托里亞是「一切馬其頓城市中最保加利亞的」，然而比托里亞也是如此。我們發覺那兒的人民像馬其頓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樣反對保加利亞。他們組織了幾隊人，間或退到山裏去「訓練」。他們組織得十分好，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希臘的游擊隊都有聯絡。一九四一年七月我們在斯科普里時候，保加利亞軍事法庭把保加利亞佔領軍裏二十六名士兵判處死刑，原因是他們把他們的武器和彈藥給了這些游擊隊了。

後來在一九四二年，我從巴爾幹恐怖之鄉逃出想發表一些關於這些游擊隊——特別是在斯洛文



尼亞，克羅提亞，和西部塞爾維亞力量最大的游擊隊——的消息時候，有幾個朋友說我受了欺騙了。我對他們解釋不支持米海洛維支的南斯拉夫游擊隊比米海洛維支的軍隊更強大更活躍。他們有點兒懷疑我的話，但是一九四三年英美的報紙對於那個游擊隊的作用已經有了正確的估價了。

我的一個朋友——從貝爾格萊德來的一個塞爾維亞人，一九四二年冬天從南斯拉夫逃出來，他對我說：「有些人硬說在南斯拉夫只有米海洛維支在抵抗，狄托游擊隊是土匪。米海洛維支是俠客。我告訴他們說在狄托游擊隊裏和米海洛維支軍隊裏我都有朋友，雖然這兩支軍隊都打納粹，但是狄托游擊隊打納粹的時候多。這是一九四二年的事，今天許多人在說只有狄托游擊隊打納粹了。米海洛維支是個國賊。」

米海洛維支原來是個南斯拉夫皇家陸軍軍官，英國一個週刊描寫他是個持有「狹隘的大塞爾維亞主義態度」的民族主義者。狄托游擊隊散遍南斯拉夫各地，既不是民族主義的，也不持狹隘的態度。他們是聯邦主義者，他們的理想給了他們強固的精神武裝，他們的理想是社會正義和巴爾幹的親愛團結。



## 第十五章 唯有莫斯科知道

一九四一年六月底我同喬治到了北馬其頓的中心城市斯科普里時候，局勢還是混沌的。保加利亞當局有許多問題要應付，而且不論接受索非亞，雅典，或貝爾格萊德指令的當局，只要是奉守民族主義教條的都不能解決馬其頓問題。

馬其頓是個地理的和經濟的單位。馬其頓不是，沒有是過，而且永遠不是一個民族的單位。一九一三年以前馬其頓在土耳其統治之下，後來被塞爾維亞，希臘，和保加利亞分割了。一九一九年以來實際上情勢依舊沒有變化，只是保加利亞所佔的馬其頓那一部份有幾小塊割給南斯拉夫了。

馬其頓住着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其中沒有一個民族稱得起是多數的。在西部馬其頓和中部馬其頓（塞爾維亞），居民大多是斯拉夫人，說的是馬其頓方言——近似保加利亞語和塞爾維亞語的一種斯拉夫語。索非亞的民族主義者說馬其頓語是保加利亞的一種方言，貝爾格萊德的民族主義者認為馬其頓語是塞爾維亞一種方言。其實照哈里遜(Harrison)所寫的「南斯拉夫的靈魂」一書裏所說的，馬其頓斯拉夫人的起源和語言是「近似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的一個單獨的種族，但不是塞爾維亞人，也不是保加利亞人。」他們是馬其

頓人！

我和喬治從我們跟當地居民各種邂逅中得出同樣的結論。馬其頓人不希望證明他們是保加利亞人；他們尤其願意在和平安甯裏生活，不願意被任何人「解放」。真的，在南斯拉夫皇家陸軍裏他們沒有像塞爾維亞人似地打德軍。南斯拉夫皇家陸軍裏的馬其頓人——還有克羅特人——沒有打，因為他們覺得那個戰爭不是他們自己的戰爭。那似乎是個外國的戰爭，他們沒有認識威脅南斯拉夫的危險也威脅着他們。

貝爾格萊德的民族主義者用了二十多年工夫試着證明馬其頓並不存在。他們叫馬其頓爲南塞爾維亞；在學校裏只許教塞爾維亞文，只有貝爾格拉德政府核准的書纔能發行。一九四一年以來保加利亞當局也照樣做，在從前的「南塞爾維亞和戰前希臘統治的東南馬其頓，除去保加利亞語以外，其餘語言都是違禁品。」在這個時期裏，保加利亞政府告訴斯拉夫居民說他們不是斯拉夫人，不過僅僅是說斯拉夫語的人——他們若一旦學說希臘語，他們就自然變成百分之百的希臘人了。

但是統治馬其頓五百多年且在許多區域構成人口多數的土耳其人從未說過馬其頓人是土耳其人。其實土耳其對巴爾幹「殘暴不堪」的統治比起巴爾幹各民族主義政府的統治來真溫和仁慈得多了。沒有一個土耳其皇帝會像保加利亞國王鮑利斯在一九二三年那樣大殘殺的。

馬其頓人不願意「被解放」。最敏感的馬其頓人的領袖在下次大戰之後不久就發覺這個了。他

們採用了格蘭斯頓宣佈過的原則——「馬其頓人的馬其頓。」他們的目的是馬其頓應該統一而且獨立，不受任何再度「解放」的危險，成爲大巴爾幹聯邦裏的一個自治單位。這樣一來，馬其頓有許多民族居住的這個事實非但不妨礙更廣大的巴爾幹的團結，反而促進這種團結。

我想起第一個馬其頓聯邦主義者對我所說的話。他參加過對抗鮑里斯的警察的戰鬥。土耳其語，阿爾巴尼亞語，希臘語，馬其頓語，他都說得很好。他談諧地說他的國籍是希臘塞爾維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土耳其人！但是他愛他的馬其頓和他的馬其頓人，不管他的馬其頓人說的是什麼語言。他痛恨一切國家主義者和「解放」他的國家的僞解放者。我問他爲什麼非常推崇俄國呢。他用幾句話就說明了解決馬其頓問題的線索：

「我們願意在和平安甯中生活，」他說：「我們願意自由地說我們父親所說的語言。我們願意隨我們的高興在天主教堂或回教寺院裏禮拜。我們在索非亞，雅典，和貝爾格萊德的民族主義者來「解放」我們之前是快樂的。現在我們沒有快樂了。在索非亞我們被當作塞爾維亞或希臘間諜給判罪處死了。在貝爾格萊德他們說我們是保加利亞間諜。在雅典他們說我們是塞爾維亞間諜或保加利亞間諜。他們都要我們隸屬於他們，但是我們只願意隸屬於我們自己。西歐不明瞭我們的處境，把我們誤爲共產黨人，不理我們，因爲巴爾幹民族主義者只有把我們描繪成危險的共產黨人他們纔能聯合起來打擊我們。巴爾幹各國的警察雖然彼此敵視，但是互相交換關於我們活動的情報，互相幫

忙來迫害我們。所以我們眼前只開着一條道路——到莫斯科的道路。在那兒，只有在那兒，馬其頓人纔能一起工作。在莫斯科，阿爾巴尼亞的，希臘的或斯拉夫的馬其頓人可以和諧地一起工作，因為唯有莫斯科堅定坦白地支持巴爾幹的團結——這是唯一能够把和平與社會正義帶到巴爾幹的辦法，唯有莫斯科知道這個。」



## 第十六章 「南斯拉夫萬歲」

「這兒還有個緊急的問題，部長。」

「什麼緊急問題？」

「喬治的死刑判決書。」

陸軍部長把椅子推到身後，站起來在屋裏來回地走，怒視着用立正姿勢站在他辦公桌旁的上尉，他問：

「爲什麼還沒有執行呢？」

「我不知道，部長。前任陸軍部長……」

「不用說了！」陸軍部長吠叫起來。「我對於前任部長辦了些什麼或沒辦了些什麼不感興趣。」

現在陸軍部長是誰？」

「我只是要……」

「我問你現在陸軍部長是誰？」

「是您呀。」

「立刻擬好執行喬治死刑的命令！」

「是。」

「他在那個監獄呢？」

「索非亞中央監獄。」

「明天早晨執行。」

「是。」

二十分鐘之後把執行喬治死刑的緊急命令擬好了。陸軍部長在上面簽了字。

幾分鐘之後，陸軍部的一個信差接過一件送交「索非亞中央監獄典獄長」的公文。封套上寫着「親交」和「急件」。信差把公文裝進袋子裏，上了他的摩托自行車。天已經下了一夜雨並且還在下。街道是滑的，但是他不得不快走，因為這封公文是緊急的。不久大街已撒在他的身後，他進了所謂「三眼井」的貧民區裏。街道沒有鋪砌，又泥濘又臭。自行車在寬濶的水潭裏馳過。最後他看見中央監獄高大的灰牆時候，他滿身又濕又髒。甚而他的護目眼鏡都濺上泥了。他想把自行車停在大門入口的地方，但是那兒擠滿了一大羣人，大多是婦女。信差心裏想——「她們在雨裏等什麼呢？」他喊叫：「讓開路！」衆人讓開了路。兩個站崗的警察向他敬禮。

他把濕透的手套脫下，說：「有件陸軍部的緊急公文，必須親自交給典獄長。」

警察把監獄的大鐵門扭開，鐵門把信差吞進去了。

門外站着的一羣人離門最近的聽見了信差說的話，把信差的話傳給後邊的人們。一會兒人人都興奮地耳語起來。

「也許是復活節有個大赦罷，」一個年老的女人說。

「縱然有，也不能從陸軍部來，那是要從司法部來的，」一個青年回答。他顯然精通這類事情……「若不是他們要幾個囚犯送到軍事法庭去，便是一道執行死刑的命令。他們時常……」

他的話沒有說完。他旁邊的女人握住他的臂，後來微弱地嘆息了一聲暈倒在地上了。她帶着的籃子也倒了，籃子裏的東西散亂在泥裏——紙烟，幾雙襪子，兩件襯衫，一件深藍色的厚絨線衣，幾包食品：這差不多是那天下午每個到獄裏接見囚犯的人所帶的東西。那是星期四下午——一星期裏准許囚犯的親屬帶着食品和衣服來看囚犯唯一的下午。

這個青年和另外兩個男子彎下身去把她扶起來。她的衣服沾了許多泥。她的帽子掉了，雨滴在她的蒼白的臉上。她長着一副美麗的面孔，但是憂愁和疲勞在她的面孔上留下了印跡。有人拿來一小瓶白蘭地酒。他們使她吮吸，有個女人開始揉搓她的前額。看不見這件事情的人們在問：

「什麼事？」

「沒什麼。一個女人暈倒了。」

「不能讓她進去麼？倘若我們告訴警衛說她暈倒了，他們也許……」

「那是沒有一點兒希望的。這種事情不是一次了。時常有人在這兒等着等着便暈過去了……」

貝克萊 (Hans Adolf Becker) 現在自己覺得頗可滿意。兩年前他不過是德國佛朗克府一個警察署長。他固然是德國國社黨區黨部領袖，然而這也算不了什麼，因為國社黨區黨部領袖多得很多。但是現在在索非亞他是唯一有威權的人。德國公使！呸！他對於外交不感興趣，對於外交詞令沒有耐性。保加利亞人必須知道他不是個外交家，他來保加利亞不是以外交官姿態出現的。「德國和保加利亞的外交關係時代已經過去。我一來到這兒，德保的生死合作時代已經開始了！」好句子。他記得他第一次接見保加利亞新聞記者用這一套話歡迎他們時候他們是何等地驚異。但是保加利亞的記者在他們報紙上提到他時候仍說「德國公使」。他還記得他要求新聞檢查官，此後在報紙上應該稱他爲「區黨部領袖貝克萊」時候，新聞檢查官多麼詫異。他不是個外交官，他是德國國社黨代表。他不是來做外交工作的。他是來叫保加利亞服從希特勒命令的。

貝克萊把桌子上的電鈴鈕按了一下。門開了，他的秘書——青年國社黨員史耐爾巴赫進來用立正姿勢站着。

「史耐爾巴赫，陸軍部長什麼時候來呀？」



「六點半，區黨部領袖先生。」

「你知道他來訪的性質麼？」

「我跟他的副官別涅夫上尉說了，區黨部領袖先生。他說部長今天下午來見你，有件緊急的事情。他三點半鐘打來電話。您在您的屋子裏，我沒敢驚動。」

「好罷！」

史耐爾巴赫敬禮，出去了。

貝克萊燃着一根紙烟吸着，往窗外看，外面雨仍下得很大，使館花園那邊的人行道上連一個人都沒有。正對着人行道的那邊，德國海軍司令部大幅的德國海軍旗被雨浸透了，隨着風拍拍作響。「多麼暗淡的一個下午呀！」貝克萊心裏想。「究竟陸軍部長有什麼要求呢？」

貝克萊很知道陸軍部長米浩夫（General Mihov）。他不懷疑他的忠誠：他作陸軍部長是貝克萊的力量，他也不至於忘掉。還有什麼呢！貝克萊告訴他向領袖（指希特勒）爲他請求德國飛鷹勳章——貝克萊是可以借重米浩夫的虛榮心的。但是爲什麼米浩夫要這樣急迫地見他呢？他昨天還見過米浩夫，米浩夫沒有報告什麼特殊事情。莫非又和總理爭吵，還是共和黨人又做出什麼惡作劇了。貝克萊厭惡這些共和黨人。他想——允許共和運動存在真是愚蠢。宣佈共和運動非法是毫無關係的。承認共和運動領袖們的人格，而且容忍他們的存在，真愚蠢！他們應該把這些共和黨人，

民主黨人等等都逮捕起來槍斃！這是戰爭，沒有地方擺容忍和仁慈……

電話鈴響了：「米浩夫在這兒，區黨部領袖先生。」

「領他進來！」

貝克萊到屋門迎見米浩夫。他親切地握他的手，說：

「看見你，我高興。有什麼重要的事情麼？」這是貝克萊應付將軍們的技術。他試着造成一個嚴肅的軍人效率的印象。

「倒是重要的！」陸軍部長回答，坐在一個安樂椅裏。

貝克萊仍然站着。這又是他的把戲：他自己很知道他的高高的身材穿起制服來是很神氣的，說話時候他總是在屋子裏走來走去，好像預演一篇公開演講似的。

「什麼事？」

米浩夫從身旁的桌子上拿起一杯斯里佛維薩（一種強烈的梅子白蘭地）——貝克萊和保加利亞人在一起時候總吃土產的酒，他裝做喜愛斯里佛維薩。

「關於喬治死刑的事。」

貝克萊走到米浩夫跟前問：「噢，怎麼？他是二月十一日判處死刑的。我以為第二天就執行了。」

他又開始在屋子裏來回地走。米浩夫又乾了一杯斯里佛維薩，鼓起了他所有的勇氣大聲地說：「我也這樣想，但是今天他們告訴我還沒有執行他。」

「什麼？喬治判處死刑還沒有執行麼？你的意思是說我們柏林警察監督搜集的判他罪名的證據還不夠麼？」

「那你得問你的朋友達斯卡洛夫將軍（General Daskalov）了，區黨部領袖先生。我當部長才當五天呀。」

貝克萊對於米浩夫粗率的答案認為滿意。他知道他眼前的陸軍部長……

「這只是我們兩個人的話，」他開始了，慢慢地說，對於每個字都加重語氣，「我從未信賴達斯卡洛夫。我告訴你我會用盡我在宮廷裏的力量才使他走掉。他是個好人，但是個壞將軍。新秩序不用怕負責任的人。我們需要勇敢的人，需要知道怎樣行動和何時行動的人，需要毫不回顧在新歐洲的路上前進的人……」

米浩夫又拿起一杯斯里佛維薩。他又覺得安心而快活。他是個剛剛上任五天的陸軍部長，居然就用某種好消息使貝克萊驚訝。那個愚蠢的達斯卡洛夫恐怕不能再作陸軍部長了。現在是給德國人以印象的時候。米浩夫很清楚這個德國公使多麼有力量。

「我是個敢作敢為的人，」他得意地宣布了。「三小時之前我簽署了執行喬治死刑的命令。明

天黎明就絞決他。」

貝克萊的面容沒有改變——他不願意洩露他的滿意。米浩夫覺得貝克萊一定認為他是重要的。「那很好。但是你能保證他們不再拖延麼？」

米浩夫站了起來。他的矚矚受了損傷了。

「我在陸軍部裏是首腦！」他大聲說。「我下令時候就限定他們按時執行。我是個敢作敢爲的人。」

貝克萊坐在放着酒的桌子附近另個安樂椅裏。他拿起一杯斯里佛維薩——不看米浩夫——率直說：

「你要知道，米浩夫將軍，我們參謀總部要拿你引以自豪呢！」

米浩夫心滿意足地坐下了。這是貝克萊給他的最大的恭維。德國參謀總部要拿他引以自豪……他臨走時候又喝了幾杯斯里佛維薩。貝克萊送他到前門。

K 從電話上得到了喬治太太的報告之後，覺得十分難受。這幾天他幾乎完全沒有睡。他十分清楚新任陸軍部長比國王更忠於納粹，他恐怕不再延宕執行喬治死刑了。達斯卡洛夫將軍比較有人性。他終於答應了等待喬治的律師給他提出更多的證據，他允諾無論如何把執行日期延至四月



底。但米浩夫是陰險的；他在上任最初幾天裏要討他主子的歡心，執行喬治正是他達到這個目的最好的手段。自從索非亞軍事法庭宣佈喬治死刑時候，貝克萊就催促執行。

K立刻打電話。他先問國王的祕書是否知道這件事情，他得到的答覆：宮廷一點兒都不知道，而且也恐怕不能知道，因為按照新法律，特別法庭判決的死刑，除非陸軍部長決定送請國王簽字，否則就不送請國王簽字了。所以祕書說K應該向陸軍部打聽。

「該死！」K氣憤憤地把耳機放下了。他轉動陸軍部的號碼，竭力抑制他的憤怒。

「我找部長的副官別涅夫說話。」

「你是誰？」

「K，從前的部長。」

他很驚異，別涅夫幾乎立刻就在電話上說話了。他的聲調是傲慢不遜的。

「什麼事？」

「你可以告訴我關於喬治的新的消息麼？」

「我盼你別拿這類事情攪擾我。我不是辦理有關全國囚犯命運的情報局！」

「對不起，但是你知道喬治是我們最好的一個朋友，我關心他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你記得達斯卡洛夫將軍許諾過……」

「達斯卡洛夫許了什麼與我無關。現在米浩夫將軍是陸軍部長了。你最好早些把這個弄清楚！」

「那麼我能跟米浩夫將軍說話麼？」

「當然不能！你想將軍有時間……」

「但是，別涅夫上尉，你總可以請——請他。」

「不，我不能打攪他。」

K 抑制不住怒火了。

「別涅夫，你不要撒野。」

「你大概忘了你對我階級的尊重。你應該叫我別涅夫上尉，不該叫我別涅夫！」

K 大聲叫：「像你這類的混蛋真把制服污辱了！」

「閉口，你個賣國賊，我要把你捕起來。」

「我早準備好了。但是我們逮捕你們這類混蛋的時候也要來的！」

他把電話掛上了。過了幾分鐘，他又打電話了，別涅夫的粗野使他太生氣了。無論如何他是保加利亞最老的政治家之一，自己覺得至少也該受到政府官吏起碼的禮貌。但是現在他個人的尊榮算不了什麼——要緊的是援救喬治——他又拿起耳機……



了，這位捷克大總統喜歡他。照片下邊有兩張反法西斯的諷刺畫。一具強力的美國造的收音機佔了寫字檯的三分之一。喬治儲蓄了一年多才把它買來，他常說「我必須知道這個瘋狂世界中發生着什麼事情。」寫字檯的另一邊是維基和以憎恨警察出名的喬治的狐狗（名叫道基）的照片。警察時常光臨喬治的家，警察一進門，道基就大叫起來，於是喬治的鄰人都知道又是警察到了。他們信口說出：「喬治又被捕了。」

他們在等喬治的太太瑪麗亞，她在別的屋子裏。維基說她很疲倦了。那天下午她早就帶着每星期給喬治預備的小包出去了，她回來時候比平時晚得多，渾身是水和泥。他聽見她告訴他的姐姐「現在完了」。他不知道她的話的意思，但是他的姐姐哭起來了。她整晚上哭了又哭。

K覺得眼淚把他的眼睛遮得模糊了。他傾聽維基的簡單的敘述，但是不敢看這個孩子，也不敢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也靜默着。唉，在他的屋子裏，在他的太太和他的子女的跟前，坐在他的寫字檯旁，看着他的照片，知道他在幾小時之後就不在人世了——是多麼難受呀。沒有親自經驗過這種事情的人不知道這種滋味。K心裏想，倘若世上有地獄，這兒就是地獄了。在你最好的朋友被處死之前，你在他的家裏，在他的太太和兒女跟前。是的，被處死。倘若他經過長時的病痛或者年老而死在牀上，人們知道這不是人力所能阻止的，心裏多少還有點兒慰藉。然而喬治才四十歲，他滿身是活力和生命。爲什麼該他死呢？



電話鈴響了，K彷彿從夢裏醒來，走向電話。別的人用焦急的眼光看着他。這麼晚是誰打電話呢？有什麼事呢？門開了——瑪麗亞進來，臉是蒼白的，她吃驚地呆視着電話。

「你們不必動，」K說，「我來接。」

他幾乎不敢接那個電話。但是電話在收音機旁邊仍就響了又響，不停地響。

「喂！」

.....

「說呀。」

.....

「是，怎麼樣？」

K把臉轉開，恐怕別人看見他可能聽到壞消息時的表情。

.....

「當然，我認識他，他說什麼？」

.....

「好，好，多謝你。」

K的聲音裏有種慰藉和甚而鬆快的味調。他放下耳機之後說：

「好消息。律師巴甫洛夫的電話。半點鐘以前他和檢事長談話，檢事長告訴他說在司法部沒有聽到任何執行消息，他們一定可以知道，因為監獄當局總要告訴他們。……」

屋子裏的緊張空氣減鬆了，但是仍沒有一個人說話。

「這真是好消息，」K繼續說。「現在你必須去睡了，瑪麗亞。不要再發愁了。」但是她用奇異的眼光看着他。「我不能睡。」她小聲說。

「不要那麼傻啦，你睡個好覺就好了。」

「我心裏說不上來地難受。我不能睡。我要等！」

「等什麼？」

「我不知道。」

她回到另間屋子。維基輕輕地哭了起來；他們也決定等着。外邊仍下着大雨。

x

x

x

x

x

喬治躺在蓆子上，千頭萬緒的思想縈繞着他的心頭。判處死刑倒也不算太壞；最低限度能整天吸煙，能……

他起來走向門去。他的錶是兩點二十五分。倘若是今天，他們至少在半點鐘以前就來了。他知道這種程序。每個囚犯都知道。兩點鐘時候他們來了，把你架出去。典獄長告訴你時候到了。然

後把你架到有絞台的院子裏。牧師到了。檢察官也到了。他宣讀你的判決書，牧師說上帝饒恕了你，你攀上絞架下邊的小桌子罷。繩子繞到他的脖子上，他們把小桌子踢開。……

「我還要活一天。」喬治想。這是什麼生活呀！在六點鐘以前他在他的監房裏走來走去數牆上的黑點。然後吃早飯。然後在院子裏散步兩小時。他同別的囚犯說話，把紙烟給他們。可憐的囚犯！他們的紙烟是嚴格地定量分配的。他們沒有被判決死刑者的特權。被判決死刑者可以吸多少要多少。有好的東西吃。有書讀。別人做工時候你可以睡覺。你必須睡，因為你只能在夜間一點以前睡覺。被判死刑的人沒有一個會睡到夜間一點以後的；這是個監獄生活的不成文的條例。到時候你自然醒來。兩點至三點是生死關頭。三點以後，你就可以鬆快一點了，但是你不能再睡，因為有時——雖然非常稀少——三點以後他們也來的。

「是的，我還要活一天。」喬治開始在監房裏來回走。他想到戰爭。蘇德戰爭的消息很好。無論如何希特勒在俄國沒有辦法了。但是歐洲還要受個比較長時的束縛。囚犯都認為盟軍就要解放巴爾幹，把中央監獄大門打開。他希望他能活到那麼一天……戰後……他把他的報紙復刊。那時候沒有了新聞檢查。沒有人再逮捕他監禁他了。維基進學校，他有充足的錢，維基要什麼玩具和書都能買來。而且他願意寫什麼文章就寫什麼文章！

他突然站住了。什麼？啊呀，什麼呀？不能，不能。他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那一定是想像。

外面走廊裏的脚步聲，脚步声，在他的走廊裏，脚步声，在他的門前。他的心臟在撞擊他的胸膛，他的血在他耳朵裏跳動得音響非常之大，所以鑰匙在鎖裏轉動他都沒有聽見……

外邊的燈光比監房裏邊亮，三個人的側像映在監房上形成三個巨大的黑影。第一個進入監房的是典獄長。

「是今天，喬治。對不起。你知道我也是覺得不愉快的。但是命令，沒有辦法。」

喬治很沉靜。他覺得他肩上的重負，不安定的重負落了下來。

同日索非亞各報發表了下面的政府公報：「今天（一九四二年四月十日）陸軍部宣佈前『午報』主筆喬治在索非亞監獄絞決。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一日索非亞特別軍事法庭以叛國罪判處喬治死刑。」

一個政府機關報還發表了如下的社評：

「喬治的處死不只是一個賣國賊的處死。這是對於一個整個叛國系統和十五年來喬治及其同類在索非亞和貝爾格萊德所宣傳的違反國家利益思想的致命打擊。『午報』是所謂南斯拉夫『理想』的喉舌，喬治是『午報』的主筆。我們必須承認這種可憐的宣傳得到了一些人民信仰。只有偉大的第三帝國領袖粉碎了南斯拉夫時候，人們才知道和塞爾維亞人合作的觀念在原則上就是錯誤的，實



行起來是要倒楣的；因為貝爾格萊德是盎格魯薩克遜陰險的國際黑暗勢力的中心。這是喬治和他的「午報」匪幫無恥的叛逆行爲。五年前政府封閉他那張破報時候，他最後的一份報的整個封面版上印着「南斯拉夫萬歲」。

## 第十七章 天空游擊隊

倘若六個俄國兵在瓦爾納登陸，到索非亞的要有多少呢？

六百萬！

這是一九四一年夏天保加利亞全國最流行的俏皮話。這個俏皮話需要點兒解釋。保加利亞人口六百萬，這個意思是說倘若六個俄國兵在瓦爾納登陸，他們到了索非亞時候，保加利亞全國人民要參加到他們隊伍裏邊。

保加利亞人民的親俄情緒是難於解釋的。難在可能得出各種錯誤的結論。許多觀察家污蔑保加利亞完全赤化了。另有些說保加利亞農民心裏是個人主義者，結果是反共產主義者，但是他們，仍感激俄國，因為俄國解放過他們的國家。實情是保加利亞既親俄又親蘇維埃政府。這是有許多原因的，但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俄國不但解放過保加利亞，而且在過去六十年裏幫助保加利亞發展成一個歐洲國家。整個十九世紀裏，民族主義的浪潮把歐洲許多民族捲入革命裏，保加利亞人請求俄國援助。一八七六年——所謂四月革命——保加利亞人起來反對土耳其皇帝，那時他的疆土已擴展到整個巴爾幹。幾星期的血戰之後，革命黨人被擊潰了。好幾個鄉村和城市被毀，居民被屠殺了。單在一個

小小的縣區裏就死一萬人左右，那時歐洲還沒有見過希特勒的大規模的屠殺，於是非常驚訝。格蘭斯頓寫了著名的小冊子「土耳其暴行與東歐問題」，這個小冊子使英美的輿論沸騰起來。國際委員會調查真相，搜集的證據不利於土耳其皇帝。最後在一八七七年俄國出兵了，從羅馬尼亞越過多瑙河，經過了傷亡二十萬的長時而困難的戰鬥之後打败了土耳其人，到了波斯普魯斯海峽和達達尼爾海峽。保加利亞解放了。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聖斯台凡諾村裏和土耳其簽訂和約，於是劃定了保加利亞國家的新邊界。

但是英國的狄思拉里 (Disraeli) 和德國的畢斯麥不滿意；他們覺得這個新的巴爾幹國家太大了，他們害怕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立足點太強固。於是在一八七九年的柏林會議上重新劃定邊界，俄國不得不同意。結果保加利亞剩下的領土不够聖斯台凡諾條約確定的領土三分之一，但是保加利亞從土耳其統治之下解放了。從那時以後，濃厚的感激俄國的情緒深深地植在每個保加利亞人的靈魂裏了。這種情緒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我想永遠不至消逝的。

一般的農民提到俄國時候仍說「俄國母親」(Mother Russia) 或「伊萬祖父」。「伊萬祖父要做這個或那個。」「伊萬祖父要怎樣想法呢？」這是質樸的人民談到俄國時用的成語；他們說「俄國」時候太少了。

俄國思想和俄國文學的影響也不小。每個學校裏都研究俄國的作家和詩人。受過教育的保加利

亞人沒有不熟悉托爾斯泰，杜斯退耶夫斯基，屠格涅夫，郭戈里，普希金和高爾基的。當然語言的近似促成了這種事實；在斯拉夫語系的一切語言之中，保加利亞語是最接近俄語的。每個保加利亞人都能讀俄文，而且有一本簡單的字典輔助，甚而最難的科學和技術書籍都能看明白。一九三八年國王鮑里斯政府經過長時的猶疑之後許可蘇聯政府在索非亞開設一個俄文書店，警察監視着書店，買書的人很多。一九三八年秋天，莫斯科的「消息報」終於准許售賣了。雖然這個報用飛機運送，但是到得很晚，就技術上說這個報不是個好報，但是它的成功是奇異的。全國派報社大批定購，倘若許它自由傳送，它的份數要超過索非亞出版的任何一家報紙的發份數。經過嚴格檢查之後准許放映的俄國影片也是一樣地成功。俄國電影幾個月連續放映，票在幾個星期之前就賣光了。影片檢查員把俄國新聞影片裏一切有史達林和蘇聯政府其他官員的部份剪掉，因為觀眾看到他們時儘要站起來不停地歡呼。

最大最有趣的親俄示威運動之一是一九四〇年八月在索非亞舉行的示威運動。機會是平常的——莫斯科狄納摩足球俱樂部要到索非亞和保加利亞兩個足球隊賽球。

索非亞首都警察局請求各省警察增援。好幾火車警察從全國各地按時開到。這次足球比賽只准在下列條件之下舉行：索非亞駐軍兩國人監視體育場，體育場的入口在週圍半英里的地方，場內雖



滿可容納觀眾三萬人，但是只准兩萬觀眾入場。球場週圍由三層密集的士兵監視。

這種戒備每個人都知道了——我一向驚異郵電新聞檢查箝制了一切思想與消息的表現自由，人民怎能這樣消息靈通呢——首都人民很氣憤。「我們要給他們一個教訓！」

他們果然這樣辦了。

外國記者和當地記者都到索非亞郊外五英里的保久里希特航空站迎接莫斯科的足球隊去。

雖然下着雨，有一萬多農民在飛機場周圍等候着。那是個動人的景象。他們裏邊有許多人一清早就到了，他們濕了，也疲倦了。他們耐心地站在那兒，緊握着他們帶去的一束束的野花。特務兵把航空站包圍了，看見這麼多的人心裏不安的司令官宣佈俄國人不能在那天到了。但是農民們一點兒都不信，這是他們對於一切官方的話經常的反響，他們仍在雨裏站着。

五點鐘時候蘇聯飛機到了，雙引擎的銀色飛機在雨裏閃耀。農民們高呼「萬歲」。他們不顧刺刀的阻礙擁向前去，衝過監視線。幾分鐘之後，他們克服了一切阻撓，勝利地進了航空站。他們圍着兩架飛機狂熱歡呼。他們恨不得把兩架飛機舉到他的肩頭上。

俄國足球隊員走出飛機時候，無數花束投向他們。航空站外等待他們的汽車離飛機不到一百碼，幾乎用了一小時的工夫他們才上了汽車：這真是非常的事情了。

我們記者坐的汽車緊跟在俄國足球隊員坐的汽車後邊。從我們進了城的時候到俄國隊員住的飯

店用了一點半鐘的工夫。平常只用五分鐘。我們的汽車沿途離地十一次。（羣衆以爲我們也是俄國人，他們實在太興奮了，他們想把所有的汽車抬起來在全城勝利地遊行。）那天下午街上的人在十五萬以上（索非亞人口二十五萬）。從各省調去的警察和特務兵沒有一點辦法。沒一個人睬他們。我們的汽車被花朵氾濫了，許多狂熱的人民拍敲我的肩背。

那天晚上有七千人被捕，但是因爲沒有地方拘留他們，不得不釋放了許多。警察的傷亡有幾百人。直到深夜時候成千動萬的人民還圍聚在飯店周圍和附近街道上高喊：「俄國萬歲。」

保加利亞工人同盟的領袖對於這次示威的成功都表示驚異。

保加利亞工人運動的力量與風行的原因之一在於工人運動最初的領袖之一狄米特羅夫（前第三國際首領）。他確實是個具有偉大的人格，能力和特性的人。有一次杜蘭提（新聞記者）告訴我他認爲狄米特羅夫是他見過的最有才智的人們中的一個人。狄米特羅夫的侄子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常給我講關於他叔父的許多令人神往的故事。那時（一九三四年）他的叔父已是世界馳名的一個政治人物了。我記得他曾狂熱地給我讀他叔父在德國國會縱火案審訊時的講辭，我記得我們對於狄米特羅夫駁斥納粹法官的詼諧的言詞如何發笑，狄米特羅夫提出證據反駁戈林，戈林張口結舌，窘迫萬狀。

後來我研究保加利亞國會史的時候，我在滿佈塵埃和被人遺忘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保加利亞國會的記錄裏發現了一些最有趣的政治講演辭——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狄米特羅夫的講演辭，那時他是保加利亞國會議員，也是工人黨的領袖之一。那些講演辭是勇敢的——他用最猛烈的詞句批評政府和軍事當局，縱然過後是死或監禁，他都沒有放在心上。那些講演辭是預言——早在一九一六年他就談到一九二三和一九二五年發生的悲慘的事件了。那些講演辭是贊成共和的——他說國王及其王朝沒有一點合乎保加利亞人民意志的，所以應該回到他的老家去——德國。講演辭的結構和詞藻都非常好。我讀過之後，我才明白爲什麼他對他的從衆有這麼大的影響。

狄米特羅夫生在索非亞，一個工人的兒子，他還是個小孩子時候，他父親便死了。他的母親沒有再嫁，一個人獨自謀生。現在她仍是一個人，因爲她二十年來沒有見面的著名的兒子被放逐到保加利亞國外，他一點都不能幫助她。我到狄米特羅夫老太太家裏那一趟我永遠不能忘掉。那是在一九三七年。她那時住在，現時也許仍然住在城外的一個小房子裏。我是同英國照像記者賈許和一個後來成了學生工人運動領袖現在不在監獄裏就是死了的朋友去的。狄米特羅夫老太太的房子太小了，小得不能叫它爲房子了——只是一間屋子和一個作了廚房的小小的地下室。但是異常簡潔。我們走進她的房子時候，她正帶着眼鏡坐在一個木椅子上看書。我的朋友把我們介紹給她：

「這是我跟您說過的新聞記者。他們很想和您談話。」

「坐下，我的孩子們，」這位老太太帶着友誼的微笑說。「我給你們作點咖啡去。」  
我們不能阻攔她，因為却之不恭。她在廚房裏時候，我看她的屋子，我看見牀邊有一架小風琴，琴鍵上邊放着一本美國的讚美詩篇，我奇怪。

「她是基督新教徒，」我的朋友小聲說。「她最大的娛樂是坐在風琴跟前奏讚美詩。」  
老太太拿着咖啡回來時候，我開始向她問起她兒子孩童時期的情形。我才知道前第三國際總書記狄米特羅夫是在嚴格的宗教紀律中長大的，他母親希望他成個新教牧師。我想起史達林的母親的野心也是如此，她最大的願望是史達林當個正教牧師。

毫無疑問，狄米特羅夫的特性很受他母親的影響，她也是最有趣的人物。她讀的東西很多，她的政治知識淵博而且健全。她對社會正義和工人權利問題跟她兒子的態度沒有差別。她認為社會正義的意義是財富的平均分配，她解釋這個主張的基本原則在聖經裏有。她認為耶穌是她兒子力求實現的理想的第一個宣傳者。但是她不贊成革命。她說：「也許因為我是個女人，我們不信仰暴力。當我們聽到許許多多的人被打死時候，我們最先想到的是這些人們的母親。只有母親能瞭解別的母親的悲哀。」

她說話時候，我注視着小風琴，小風琴上邊的牆上掛着兩幅用美盪鏡框裝着的大像，一張是狄米特羅夫的像，一張是耶穌的像。像片中間是個小小的耶穌受難像。賈許不由己地要求狄米特羅夫



老太太准許他把屋子的那個角落拍照下來。她微笑，回答，「你願意照就照罷。」她站在兩張畫片下邊。那是一張奇異的照相。一個質樸的工人婦女和她信仰的兩個男人的像在一起的照片。

x

x

x

x

x

一九二三年狄米特羅夫不得不離開保加利亞，那是在斯丹包里斯基被刺之後，鮑里斯政府發動了全國大規模的恐怖行動。鎮壓工人黨，工人黨的領袖大多被殺害或被監禁了。總理贊科夫（Zhekov）組織了歐洲第一個法西斯的衝鋒隊。這個衝鋒隊的組成是十人一組，二十人一組，或三十人一組，通常由馬其頓恐怖份子領導，這是唯一忠於鮑里斯和贊科夫的武力。因為正規的警察隊仍在農業黨勢力之下。至於軍隊，大部份構成分子是農民，完全不能用。所以衝鋒隊打擊「反國家份子」的權力是十分大的。他們的人數是祕密的，但據可靠方面估計不過一千人。然而他們非常殘酷，組織也非常嚴密，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的兩年期間暗殺了三萬人，我說「暗殺」的意思是沒有宣佈，沒有合法根據，遇難者沒有經正式法庭或其他任何當局審訊。在那時人口只有五百萬的一個國家裏被害的有三萬人！這等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保加利亞死傷總數的三分之一。然而實際上的損失比數字所表示的大得多。因為這三萬人是保加利亞最寶貴的精英。他們是城市和農村的知識階級，人民的真正領袖——教師，醫生，公務員，合作社職員，市長，技師。

鮑里斯和贊科夫主要的打擊是向着足有抵抗力量的兩個政治運動的：農業黨和工人黨。農業黨

人看出他們不能再用法路線繼續鬥爭，他們自己的政府已被暴力推翻，他們的領袖大多被慘殺了，他們和非法活動着的工人黨攜起手來，共同開始組織以煽動羣衆革命爲目的的全國各地革命委員會。狄米特羅夫負責組織保加利亞西北部的革命委員會。

但是聯合戰線的鬥爭是艱苦的。駐歐洲各國的鮑里斯國王的外交官把反對鮑里斯政府的人們描述成企圖蹂躪保加利亞然後進侵中歐的赤化份子。那時共產主義惡魔是個很有力的辯解。這個辯解太有力了，英國和法國不顧限制保加利亞軍隊二萬人的巴黎和約，居然允許了鮑里斯另外動員一萬人。一九二三年誰要提議修改巴黎和約，誰就被目爲大逆不道，但是鮑里斯說了「共產主義」一個字就得到了英法對於鮑里斯的奇異的讓步，就明目張膽地改變了巴黎和約。

一九二三年九月聯合戰線發動了第一次變亂。狄米特羅夫在保加利亞西北部宣佈成立共和國，革命軍司令部設在貝爾科維薩 (Berkovitsa)。保加利亞南部的變亂也一樣順利。索非亞巷戰開始的時候，鮑里斯和贊科夫已心驚膽戰，準備隨時逃走，鮑里斯實際上已在計劃到德國他父親那兒。突然得到了意外的西歐的援助。可是仍用了兩年時間才把全國「平定」了。

那時鮑里斯制定了他的著名的國防法——現代史上最殘忍的法律。對於任何非法組織的成員處以斬刑。宣佈共產主義運動爲非法，於是法庭也隨便把同情共產黨的人判了死刑。所以其後幾年，死刑太多了，甚而鮑里斯都拒絕全數畫行了。結果是幾個囚犯整年整月地在長時求死不得的苦惱中

活着——判決死刑了，可是有時半途赦免，有時批准了。在我們集中營裏有個判決死刑而已消磨了三年時光的人，他每天早晨醒來盼望那天把他絞決，他每月送上請求執行的呈文也被批駁了。所以這些囚犯在生與死的半空中懸着，這種痛楚非常之大，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瘋了。同時鮑里斯的宣傳家贊揚國王不把這些死刑判決書批准表示對於人民的珍愛。憲法給了鮑里斯赦免被判死刑的人們的權利，但是他不行使這種權利，他偏要玩這種新式的誦詐的毒刑。

工人同盟雖然受了迫害和大規模的暗殺，它的影響越來越大。一九三二年選舉結果，有三十二個工人的議員返回國會，同時全國各地的工人候選人和他們的選舉主持人被捕並且被害。選舉過後不久國會裏工人領袖在他的門口被宮廷僱用的兩個馬其頓刺客槍殺。後來，鮑里斯目無憲法，把工人的議員開除並且逮捕，他們大多被害了。

一九三八年選舉結果，有七個工人的議員返回國會。這幾個議員是在城市裏選出的，因為在鄉村裏政府的人不敢自找麻煩叫農民到投票棚去，却把他們的票登記在政府候選人名下完事！一九三九年工人的議員又選出來了。工人的議員領袖是杜克美捷夫 (Dukmejev) ——索非亞的律師，一個特別能幹的人，曾在巴黎研究法國法律，萊翁布倫 (Leon Brunn) 的一個好朋友。他的講演——准許他講演的時候很稀少——談諧而有力。一九四一年六月他和支持他的十個人被捕，受了毒刑。在岡達佛達集中營過了一個短時期之後便和七百名工人同盟員被送到愛琴海一個荒僻的小

島上了。從那以後他們的情形怎樣，誰也沒有聽到。

我是個記者，我和工人同盟的工人的關係純是個人的。一九四一年八月形勢又開始極度惡化起來，甚而像我這種非共產主義的反法西斯份子都有被捕的危險了。喬治第二次被捕就是明證。工人同盟的一個朋友對我說八九月德國祕密警察又要大事搜捕，凡是同情民主的人都是他們的目標。另一個朋友——他的弟弟在內政部作筆——警告我說官方又在注意我，內政部的文件夾子裏有幾件報告說我忽視了我不談政治的約言，說我公開講俄國要勝利。我決定隱藏起來——我離開我的家跟我的朋友住在一起——沒有留下通信地址就離開家了。

我住進一個已經有十一個人住着的房子，這十一個人也是有被捕危險的。這個房子是用一個從來不到那兒去的人的名字租下的。付得起租錢的人付錢，付不起的不付。工人同盟爲它的盟員付租錢。

其中六個是工人同盟的盟員，兩個是社會民主黨人，一個是農業黨人。這是個小小的真正反法西斯勢力的聯合戰線。

就在這個房子裏我遇到從俄國來的一個傘兵。有天晚上一個工人同盟盟員把他領來。我們看過德國關於這種傘兵的公報。公報上說這種傘兵有六十二個被捕，大約有五十個給打死了。其餘的就



散在巴爾幹各地做着優異的工作。

來到巴爾幹半島的這種天空游擊隊員究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只見到他們六個。但是我看見過他們的一些工作，而且是真正優異的工作：要了幾百納粹士兵和警察的性命，嚴重地擾亂了巴爾幹德國的運輸系統。歐洲這種地下戰爭插話的全部經過在希特勒崩潰之前不能宣佈。我只把我在一九四一年看到的那些天空游擊隊簡短重要的生活描寫一些。他們使我最驚異的是他們的精誠團結的力量——他們國際的精誠團結。

這些人不是俄國人，他們是從巴爾幹每個國家和幾乎每個區域來的。他們是爲了巴爾幹各國政府極端反對和否認的巴爾幹團結而來奮鬥的。他們以整個巴爾幹力量的前鋒姿態來打擊法西斯主義，來保護巴爾幹人民的共同利益。他們是現代的十字軍。這個名詞不是我造的，這是考克斯(Gaithy Cox)在他的「保衛馬德里」一書裏描寫國際縱隊的名詞。在馬德里，法國人，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義大利人和奧國人以精神的力量聯合起來共同作戰，考克斯說這是自從十字軍以後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力量，我在那些傘兵裏又發現了這種力量。

來到我們房子的那個傘兵對我說傘兵們願意在普洛夫狄夫他們的支持者的幫助之下襲擊岡達佛達集中營解放囚犯，囚犯裏有許多人不但不是他們最好的朋友，而且是反納粹活動前途的無價之寶。

因爲我在那個集中營裏住過，他請我詳細描述營裏的組織，它的環境，它的防禦等等。

我興奮極了。我們整夜討論襲擊集中營問題。我畫地圖。最後決定在某日黎明襲擊。一隊游擊兵祕密進入一座房子裏。同時另隊游擊兵在樹林裏立刻從各方面放槍使警察不知道他們有多少人。又一隊游擊兵把住大部份警察睡覺的建築物的入口，不讓他們一個人出來。還有一隊闖入警務長的房子裏把他就地處決。

兩天之後，這位傘兵回來告訴我們說他的「領袖們」同意這個計劃。普洛夫狄夫的工人同盟盟員設法預先通知營裏一些囚犯，爲的是他們能實行內應。充足的武器和彈藥在某地給我們預備好了。

夜間我們出發了。我們坐着汽車到了索非亞附近的一個小火車站，我們趕上了一趟第二天早晨七點到普洛夫狄夫的慢車。我們一共四個人，傘兵，同住的兩個工人和我。我們帶着偽造的身份證明我們是索非亞大學的學生，我們上了車分開坐在個別的車廂裏。因爲燈火管制，在車裏識破我們的機會是很少的。

到了普洛夫狄夫車站，我們遇到了一個令人不快的奇異的情景。車站上滿是兵，不准任何一個旅客離站。我們被推進一個候車室裏，那兒已有兩百多人，他們也在等着。兵把守着門。不久我們就弄明白是要檢查。因爲普洛夫狄夫發生了「共產黨騷亂」，警察，德國軍隊和保加利亞軍隊把全

城家家戶戶都搜查了。阻留火車旅客就是因爲這個。據說可疑份子最近正來普洛夫狄夫。

我燃着一支紙烟，我覺得我的手在顫動。我看了看他們三個人——我們商量好了，不論發生什麼事情，誰都不認誰。他們也在吸烟。

## 第十八章 革命的襲擊

我們選擇了納喬沃村作爲我們攻擊集中營之後聚合的地點，因爲納喬沃村非常貧窮，僻靜，孤離，搜尋「危險份子」的警察要以爲它是不值得注意的。它是散漫在羅多普（Rodope）山裏的好幾百小村之中的一個。

我們順利通過了普洛夫狄夫警察的檢查。但是普洛夫狄夫工人同盟盟員受了驚人的犧牲。那天夜裏五十個人——內有當地的工人同盟組織的大部份領袖——被害了。和我們從索非亞同走的一個工人的妹妹——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也被害了。

因爲警察最後一分鐘的搜捕，對集中營的進攻便沒有完善地組織起來。參加進攻的只有二十一個人，十五支步槍，十支手槍，和五個炸彈。普洛夫狄夫的工人同盟盟員想延期，等到弄到更多的武器時再進攻，但是他們接到命令要趕快進攻。

我因爲不善使用武器，他們不准我參加進攻，於是我和另外三個非戰鬥員被派到納喬沃裝運食品 and 衣服等待二十一個人勝利地帶着被解放的囚犯回來。

但是二十一個人只剩回九個人，他們帶來了十四個囚犯。據說還有十個囚犯往別的方向逃走



了。抵達納喬沃村的九個人都受傷了，彼得羅夫在襲擊剛一開始就被一個警察用槍打死了。

不幸這次襲擊沒有成功。他們估計警察喪命的有二十人，受傷的還要多。集中營裏的囚犯未能實行很有效的協助，攻擊開始時候，他們正在睡夢中，因為先前送的信沒有傳到。

我們在納喬沃逗留了一星期。我們只有三個人回到索非亞。其餘的人南下到愛琴海岸去了。

過了一個月，愛琴海便被得拉馬城的「十月革命」的血和火給燒熱了。

得拉馬是北愛琴海岸的一個小城市，在斯特魯馬河與斯塔河之間。位於巴爾幹最肥沃的一個區域裏，居民是希臘人，但是也有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散在它的周圍的鄉村裏，一九四一年十月得拉馬周圍有十七個鄉村變亂起來。他們組織了一個臨時政府，進攻得拉馬火車站。攻陷了車站，佔據了四天。

這是反對保加利亞當局的局部變亂。這是巴爾幹變亂的一個縮影。變亂的領袖除去希臘人之外，還有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的「共產黨人」。臨時政府設在被解放的鄉村裏。臨時政府發表宣言，後來我看到一份：是用希臘文和保加利亞文印的。猛烈抨擊保加利亞當局，指斥保加利亞當局是法西斯壓迫者，同時責備希臘當局。這個宣言率直地說，只有組織巴爾幹聯邦纔能把和平與繁榮帶給巴爾幹人民。

這個變亂的特質使索非亞政府大爲震驚。秘密的工人同盟機關報「工人行動報」對於這個「巴爾幹友愛的真正前鋒」——對於得拉馬變亂的定義——全力支持。倘若得拉馬革命只是保加利亞佔領軍和敵愾的希臘居民之間的衝突，索非亞當局把它鎮壓下去也就完事，不必再費腦筋在公報上杜撰什麼荒唐的希臘散匪的故事了。但是保加利亞當局看出得拉馬變亂不只是這麼一個衝突。得拉馬是革命的進攻。得拉馬是又一次而且規模更大的岡達佛達集中營的攻擊。許多徵象指出將來更大更好的得拉馬多得很呢。

索非亞政府氣瘋了，它用最殘忍的手段把得拉馬變亂鎮壓下去。這些暴行的負責者當然到戰後要處置他們的。鮑里斯除去派了幾十架俯衝轟炸機把幾個鄉村炸成平地之外，還派了一隊殘忍嗜殺的衝鋒隊到亂變地點。

這使我想到的最重要的和平問題之一——戰罪問題。許多人認爲確定個人責任是不可能的，第一次大戰停戰後「絞死德皇」之類的口號不能也不該再提出來。另有些人認爲不應該只懲處犯罪的領袖，應該懲處全體國民。這不但有顯然的技術上的困難，這也不能解決戰後正義問題。從罪大惡極的戰爭罪犯到協助和默許暴行的罪犯有許多等次，不能爲了手續的便利或感情用事而不加以區別。

但是我認爲不加區別的危險是很小的。我更怕的是再有一次人道主義的浪潮。上次大戰後，大

多數人民痛恨保加利亞戰爭罪犯因爲索非亞的協商國外交官干涉而逃脫了應得的處分。後來他們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他們成了鮑里斯的法西斯政策及親德政策最熱心的支持者。這些人活了，於是多少萬無辜的人民死了。

我認爲「絞死德皇」的政策是正確的政策，而且應該用到巴爾幹及其他歐洲各地一切軸心傀儡領袖和他們助手的身上。倘若要和平徹底，應該允許人民法庭審訊罪犯，而且不應該受外界人道主義干涉的暗傷。因爲這次問題更複雜。對於巴爾幹軸心傀儡任何同情的待遇將招致一個新的流血更多的混亂。今天巴爾幹人民組織得更好，他們的地下運動得到了俄國的支持。與反俄政客勾結終必引起內戰，並且減少俄國對民主國家意向的信任。沒有俄國的衷心合作，歐洲和平永無保證。

納粹推着巴爾幹人民在走向團結的路上走過了長的一段！——這不是在新秩序的結構中走過的，而是在打倒新秩序的鬥爭中走過的。這是在監獄裏，在德國的槍口前邊，在游擊隊裏實現的。倘若巴爾幹容忍任何盟軍在北非的權宜政策——達爾朗主義——一切團結希望都要潰滅。倘若盟國許可那些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德國人的人們投最後之機，改變立場，盟國就要喪失爲盟國戰鬥和甚而在最黑暗的時候還相信盟國而且最有能力建立一個新歐洲的那些人們的同情和支持。於是血還要再流。

作爲反抗象徵的巴爾幹各國流亡政府把這記在心裏也是好的。這還適用於一切「自由運動」。



巴爾幹各國人民已經得到許多爲了人民的「自由運動」的成就，這種成就不是由流亡政府締結的協定得來的。而是由共同痛苦和共同目的得來的。

民族偏見和民族怨恨必須拋在一旁，一個維琪傀儡和一個法國愛國志士——縱然他們是生在一個村子裏的——之間的差異比同在西班牙對法西斯主義作戰的一個西班牙人和一個捷克人之間的差異大得多。共同的理想是唯一真正的共同。



## 第十九章 蘇妮雅

我第一次和最後一次看見蘇妮雅是在索非亞監獄裏，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的一個下午。我同一個當律師的朋友看另一個朋友B去，B是個二十歲的大學生，一個月前他和另外十四個學生因為散發反德傳單被捕。裏邊八個被判死刑，其餘的被判無期徒刑。我的律師朋友為B竭力辯護，但是沒有救下他，他被判死刑了。他說願意執行之前見到我。因為說不定那一天B就要執行死刑，所以准許他在監獄律師室裏接見家屬。我冒充他的哥哥，帶着一張假的許可證進了監獄。

律師室面對着寬大的監獄的院子。B坐在窗口近傍，我和他談話時候，他突然說：「來，看她。」

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我走到窗戶跟前。我看見院裏有個悽愴的行列——大約五十個男子和一個女子在許多警衛監視之下做他們每天的強迫散步。監獄條例禁止女犯離開她們特定的監房和她們特定的院子，為什麼這些男子之中有個女子呢？這真奇怪了。在監獄裏男犯和女犯永遠不能見面。B解釋了：

「他們是傘兵。那是蘇妮雅……他們不准我們和他們接觸。他們的房子和監獄裏其餘的房子完

全隔離。而且只有我們在屋裏時候才讓他們出來。」

我用我的臂環抱B的肩頭，從窗戶往外看。我很喜歡看這個久仰大名的蘇妮雅。她穿着一件黑衣服，樣子疲倦而且蒼老。我知道她已四十歲以上了，但是樣子似乎還老。頭髮擺到耳朵後邊，差不多都白了。她不時把手放到前額上，似乎有所回憶。她稍微有點曲背，她慢慢地走。因為離得遠我不能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臉，但是我想她的臉上深思的表情一定多於憂愁的表情。堅決與反抗照明了她的人格。

我想繼續看她，但是警衛來了，告訴我們的接見必須結束，因為我們同B講了一個多小時了；

兩天之後B和他的朋友在監獄的院子裏絞決了。執行他們沒有宣佈——他們不是十分重要的。關於執行的事情，現在顯然採用了新的辦法。不再預先通知被執行的囚犯的家屬，也不准家屬看他們兒子，兄弟，丈夫，或父親的屍首。只在執行完了埋在監獄墓地之後才通知家屬。

一九〇三年蘇妮雅生在索非亞一個中等家庭裏，一九二五年因從事反政府活動被捕，並且被判死刑。由於懷孕，依照保加利亞皇家法令減為無期徒刑。一九二六年在獄裏生了一個孩子。孩子的父親是誰，不知道。一九三九年因為品行優良獲釋。同年離開保加利亞。一九四一年七月在特羅燕

城 (Troyan) 被特警隊逮捕。一九四二年七月被特別軍事法庭判決死刑。她是一個傘兵游擊隊長。

蘇妮雅的傳記是最有趣最動人的傳記。

x

x

x

x

x

蘇妮雅沒有兄弟姊妹。她父親是個鐵路小職員，他一生大部份時間消磨在保加利亞小城市的車站裏。二十一歲以前她的生活是平平淡淡的。真的，這個女孩子很使她的母親——一個簡樸，肥胖，好心腸的女人——煩惱。因為她到了十八歲時候對於結婚毫無興趣。她念書，這更使她母親煩惱。這位老太婆常對她的朋友說：「書只能給人們狂妄的念頭。」她母親向她父親訴苦時候，他只回答：「由她去罷！」蘇妮雅覺得她父親是個極可愛的老人，她敬重他，她疼愛他。也許因為她父親的死，她的生活才完全改變了。

過了幾年，蘇妮雅告訴她的朋友說她一生裏有過她永遠不能忘掉的一夜，她最後一次看她父親的那一夜。那是一九二三年美麗的九月的晚上。有人用力敲門，蘇妮雅去開了門。三個男子進來。他們穿着便衣，但是拿着槍。她認得他們是全城害怕的特警。她知道幾個月來政府有了些變動。她父親告訴她總理遇刺了，已經有了一個新政府。他還告訴她好幾個城市裏發生了騷亂，死傷的人很多。他們這個城市新任市長組織了一個特警隊。蘇妮雅的父亲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當過下級軍



官，所以市長叫他加入特警隊，但是他拒絕了。他說他不喜歡這個計劃。現在他們來了。

「你父親在那裏？」

蘇妮雅不必回答，因為她父親已走進屋子裏了。

「穿上衣服，跟我們走！」他們之中一個人說。「找你有特別的任務。」

「我明天還須很早起來呢，」她父親反對。

「叫你怎樣你就怎樣。」這個人憤怒地打斷了他的話。「你知道我們是軍人。你當過軍人，你該知道不服從是什麼意味！」

不到十分鐘，他們走了，蘇妮雅和她的母親哭了一夜；她們直感地知道一定出了什麼不幸的事。三天之後，離火車站不過十英里的大路附近的田野裏有三十七個死人，蘇妮雅的父親就在裏邊。他們都是被槍殺的。他們的身體上有的有十處彈洞，甚而有十五處彈洞的。蘇妮雅父親的頭部有三個彈洞。

特警甚而沒有掩飾這三十七個人是他們槍殺的事實。關於蘇妮雅的父親，他們說他是危害國家安全的份子，因為他不加入特警隊來盡他愛國的義務。全城人民都驚恐起來。……

她離開她的母親（一九二八年這個可憐的婦人在痛苦貧困之中死去了）來到索非亞，進了太



學。她的同學都用種異常的眼光看她。有些人說她太誠懇太自愛了；另有些人說她太真摯。有些人甚而認爲她輕浮，另有些人說她自大。但有一件事情是確實的：蘇妮雅和男子處得比和女子處得好。男子們喜歡她，愛她，敬重她。女子們裝作喜歡她，其實怕她。那時認識她的人都說她是十分迷人的。她有美麗的藍眼睛。她有對於某些人的熱情的火花，對於某些人的愛情的火燄，對於某些人的強烈的憎恨。她的頭髮是棕色的，好似微微的天然的波浪垂到她的肩頭。有些人認爲她的嘴太大，其實沒有什麼特殊。她的聲音——她的朋友都認爲有種非常的音色，有時是種堅硬沉重的發號施令的聲音。有時是種輕柔甜蜜能把最細膩的溫存仁慈的字句低聲地說出來的聲音。她的身材是黃麗的，亭亭玉立。她才二十歲，看去樣子還不够。她知道自己的美麗，所以總穿很樸素的衣服。

她住的房子很簡單——一間很小的屋子和一間作廚房兼浴室的小地下室。打掃房子，洗衣服，作飯，什麼都自己幹。她在同學之中是最有人緣的，她的茶會——客人們都帶點東西來，自己烹飪，後來幫助她洗食具——人們也極熱烈地參加。她時常只請男子。她太有人緣了，她每天早晨到了學校時候，男同學都要向她微笑，站住跟她說話。男同學們認爲引起蘇妮雅注意是個大的光榮，作了她的朋友是最大的光榮。

她和男同學一起工作也許是她偏喜歡男同學的原因之一。一九二三至一九二五年兩年裏她是學生勞工同盟的實際首領。這是個祕密組織：政府把一切勞工組織都解散了。但是分盟依然存在。那

時有個合法的學生團體名叫包介夫 (Orino Bodov)——保加利亞的革命志士，也是保加利亞最偉大的詩人。一八六二年和土耳其人作戰陣亡。但包介夫的領袖也是祕密的學生勞工同盟的領袖。蘇妮雅是包介夫書記兼勞工同盟的副主席。勞工同盟主席是貝拉達 (Macho Parata)，一個二十五歲的精明強幹的勇敢的學生，因為他的講演充滿熱情，人皆呼之為「烈火」。他是蘇妮雅最好的朋友。「烈火」常在蘇妮雅屋子逗留到深夜，但是她的其他許多朋友也是如此。遇到有的朋友灰心喪氣時候，她就在晚上把他帶回她的住處鼓勵他，於是他就恢復信心了。他們一致認為她是可愛的，而且誰都能够成爲她最好的朋友。他們一致認為她的工作是極可寶貴的。他們都欽佩她，她叫他們做什麼他們便做什麼。可是每個人都守着蘇妮雅單獨對他們說的話的祕密，沒有第三者時她對他態度的祕密。難道她是大家的情人麼？還是大家的姊妹呢？誰也不知道，誰也無法知道。

學生勞工同盟的領袖知道全國正在計劃某項事情。包括一切進步的政黨和運動，一致努力推翻政府的聯合戰線成立了。聯合戰線要求學生形成一個大的組織支持反對派的合作。他們組織了許多學生小組，必要時和政府的軍隊戰鬥。每個小組組長由蘇妮雅擇定，組長和勞工同盟的聯繫要通過蘇妮雅。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五年同盟收到了武器，手槍，炸彈和手榴彈。這些小組由城外的專門教官訓練。

但是全國的革命小組並沒有像學生小組似地組織完善。這也是政府的警察隊把這個運動鎮壓下去的原因之一。第一次起事是在快到一九二三年底時候，直至一九二五年底還有散漫各處的單獨的變亂。在索非亞差不多每星期都有衝突。革命領袖被圍在他們戰至最後的房子裏或隱藏的地方。他們的堡壘被炸毀燒光了，但是他們仍不屈服。地下勞工運動的組織一點一點地被摧毀了。被俘的領袖大多未經審訊就處死了。

十月初警察決定逮捕蘇妮雅。一天早晨六個便衣警察到她的住所叫門。沒有人應聲。他們把門闖開了，但是最先進去的兩個警察就中彈斃命了。於是許多警察把房子圍起來，叫別的住客都出去，然後警察攻擊蘇妮雅的房间。從蘇妮雅的窗戶射出幾槍，警察又有受傷和死的。她顯然同幾個朋友設了障礙物抵抗，他們決定打出去。警察從窗戶投進兩枚炸彈，他們還敬了更多的炸彈。戰鬥了一個多鐘頭，蘇妮雅的房子沉靜了。警察進去時候，只發現兩個人，蘇妮雅和「烈火」，都昏迷了，臥在血泊中，但是還活着。警察把他們送到醫院裏，男的過了幾小時就死了，始終沒有醒過來。蘇妮雅沒有死，她受了八處傷，但都不是致命的。過了三個星期她出了醫院進了監獄。第二年一月，索非亞特別軍事法庭審訊她和另外一百學生。

軍事法庭把這些學生分成三種：組織者，盟員，和同情者。組織者有三十一個人判決死刑；盟員，判決無期徒刑；同情者刑期不等，從三年至十年。這羣學生裏有十五個女的，但蘇妮雅是唯一



被判死刑的女學生。她聽到判決死刑時候泰然自若。有些男學生臉色都變了，但是她一看他們，他們立刻恢復了正常的神色。法官宣讀關於蘇妮雅的判詞時，她做出一件驚人的事情：她唱起老革命家包介夫的歌子。男學生們也唱，沒有一分鐘工夫他們都唱起來了。法官，衛士，警察都顯得毫無力量了。他們甚而不想阻止。反正這是學生們一個最後一起唱的機會了。

關於這次審訊的可驚的事實是沒有把蘇妮雅判罪的證據。她顯然是整個組織的中心，可是沒有一個人提出證據來。她最好的朋友和助手遇難了。在受審的學生之中有許多知道她過去兩年一切工作的，可是檢察官問他們的時候，他們都回答：「關於蘇妮雅的事我一點兒也不知道。」檢察官告訴他們倘若說出組織的眞正首腦可以留下他們的性命。但是他們甯可死而不願意說出對她不利的一個字。因為沒有別的證據，法官只好說她的罪名是武裝反抗警察當局。

蘇妮雅的死刑要在二月中旬才執行。但是在執行她的死刑之前的幾天，蘇妮雅的死刑減爲無期徒刑了，這是蘇妮雅傳裏最神祕的一頁。直到而今還是個神祕，也許將來永遠是個神祕了。依據保加利亞法律，一個被判死刑的女子懷了孕就不能執行了。她的死刑依法減爲無期徒刑。蘇妮雅向典獄長聲明她懷孕了，典獄長向司法部遞了一個呈文請求派遣醫藥檢查委員會來。檢查結果。醫生簽署了一張證明書證明她有孕了。於是蘇妮雅的律師沒用一天的時間就把她減刑的事輕易地完成了。因為關於這點在法律裏規定得十分明確。



但是醫生的檢查暴露了她只懷孕一個月。這裏邊就神秘了。她是前一年十月初間被捕的。她於警察監視之下在醫院裏逗了三個星期，在監獄裏逗了三個半月多。監獄裏她的監房是經常有人把守的，而且三個半月除去她的律師和典獄官之外，她沒有單獨見任何男人。她見典獄官不過兩次，每次大約十分鐘，而且那時典獄官的祕書還進過他的房裏，看見沒有異狀。她見她的律師次數比較多，可是每次都在律師室裏，律師室是個大廳，裏邊有好些桌子和椅子，一天裏每小時至少有五個囚犯接見他的律師。再者，典獄官和蘇妮雅的律師都是可敬的中年的已婚男子。

這件事情惹得人們紛紛議論。有的懷疑蘇妮雅的律師，有的懷疑典獄官。懷疑律師的人們說，他顯然在愛戀蘇妮雅。他不收費爲她辯護，他把其他一切工作撇開好把全部時間用在她的案子上。懷疑典獄官的人們說爲什麼典獄官對待蘇妮雅特別好呢？爲什麼他許可她的朋友把特別的食品送給她呢？爲什麼她要什麼書就給她什麼書呢？爲什麼他許可她享受比別的囚犯寫更多的信的權利呢？他爲什麼在三個月裏在他的辦公室裏接見她三次呢？但是他爲什麼終年不接見叫囚犯呢？這不都是很神秘的麼？每個人都有一套理論，但是誰也不知道真情。

蘇妮雅什麼也不說。司法部派了一個特別委員會調查這件事，叫她坦白地說出來是誰使她懷孕的。她只回答：「我自己。」再不作任何解釋了。同年九月，把她送入監獄醫院，十月她的孩子出生了：是個男孩。監獄當局又想弄明白這件神秘。他們叫蘇妮雅把孩子的父親的名字填在出生證

上。她在填寫母親名字的空格裏簽了自己的名字，把填寫父親名字的空格留下了。

「你必須填個名字，」他們告訴她。「這個孩子必須有個父親的。不然在官廳裏就要把他登記爲私生子了。」

蘇妮雅拿過出生證，在填寫父親名字的空格裏寫了個「無名」。

蘇妮雅身體復原以後不得不到監獄。她堅持帶着她的孩子。她的朋友勸她爲了孩子的健康還是把他送到國家育嬰堂裏，但是無效。「我不讓我的孩子由政府給養大。」她堅持着。「我要親自教育他。我要親自照看他。長大時候，我要告訴他我做過些什麼好讓他自己決定他應該做些什麼。」

蘇妮雅終於得到了許可，她把她的孩子帶到他的監房裏。許多人認爲實際上她是害這個孩子。但是不久人人都同意她的選擇是最聰明的選擇。在一個政府孤兒院裏，這個孩子所得到的待遇和其他所有的孩子是一樣的，但在監獄裏他成了大家的孩子。兩千政治犯同一個孩子，所有的女犯都給他做衣裳，男犯給他做玩具和鞋，監獄奶場裏最好的牛奶給他留起來。別的囚犯得到城裏的朋友送來的禮物時候一定把最好的留給孩子。蘇妮雅給他起了一個美麗的名字——佛拉狄米爾——一個俄國偉人的名字。這個名字使他越發有人緣了。人人都叫他佛拉狄（表示親愛的稱呼法）。他成了監獄裏全體政治犯的掌上珠。每天要問監獄醫生幾次佛拉狄怎樣，有一次這個孩子病了，全體囚犯都

垂頭喪氣的。沒有一個人敢大聲說話。因為怕驚擾他。孩子好了時候，囚犯在食堂裏舉行了一個「宴會」，並且給他和他的母親送禮。

但最有趣的是刑事部的囚犯一樣喜歡佛拉狄。他們是兇手，竊賊，騙子，土匪，犯偽造罪者——被視為社會的渣滓的人們，對於佛拉狄和他的母親却變成溫和慈善的了。他們每天送他禮物。蘇妮雅每天接到捐錢幫助孩子的信二十多封。

「爲了這個孩子，我情願什麼都做。」這是一個因爲殺妻被判無期徒刑的男子寫的。

「蘇妮雅，倘若有人對你或者你的孩子無禮，你就給我寫個條兒來。我們會對付這種人。」這是一個因爲劫奪被判十五年徒刑的惡漢寫的。

她知道這些信是出於真心的。她知道這些人甘心爲了她和她的孩子什麼都做。於是在一九三〇年——那時佛拉狄已經四歲了，她在監獄裏度了五年了——有一天她要求這些人爲她作一件事情——殺一個人！

那天蘇妮雅接到刑事部送來的一封信（這封信當然是經過全世界每個監獄裏都有的那種傳遞方式祕密送到的）：

親愛的蘇妮雅：

前幾天來了一個可能使你發生興趣的人。起初他說他認識你，但是我們讓他跟你通信的時候，



他又拒絕。他說大概你已經忘掉他了。他的名字叫巴爾多夫，因為盜用公款被判五年徒刑。我們猜他大概往特警隊裏做過事。他說他曾當過省裏邊的官吏。你知道他的來歷麼？

這封信由刑事部的一個囚犯E簽字。E和政治犯們關係最好。他的刑期只有三年，每天在監獄附近的一個工廠裏同另外一羣囚犯做工。因為他和「外界」接觸，能在政治犯和他們城裏的朋友之間傳遞書信，報紙和各種消息。囚犯們信任他，時常把危險困難的工作交給他做。他忠實可靠，盡力幫助他們。

蘇妮雅看完了信，立刻寫了個簡短的條子送回刑事部：「無論如何要調查出來一九二三年這個人在什麼地方，那時他做什麼。」答覆立刻來了，蘇妮雅寫回來：「我要你弄死這個人！」

晚上E接到了蘇妮雅的要求，念了又念。他立刻下了決心：蘇妮雅要做這件事情，所以就必須做。只有一個問題：全部事情必須立刻完成——就在當天夜裏。那個人明天也許解到別的獄裏，那麼她就永遠不能滿意了。是的，必須現在就辦，必須第二天讓她得到信告訴她她的指令已經執行了。E找了三個最好的朋友公開討論這件事情。他們一致同意當天夜裏做這件事。這是蘇妮雅的要求。

他們商妥計劃，E和兩個朋友負責完成這個任務。他們兩個人到了巴爾多夫的小室裏把他叫起



來，打昏在地上。他們把失掉知覺的巴爾多夫慢慢小心地移到窗口把他的頭聳出去。把他的牀也移到窗下。

砰！砰！砰！響了三槍。

他們把他拖回牀上。

「我們要弄清楚他是否確實死了。」

「死了，看他頭上的血。」他們兩人走了。

話：

早飯一過，鐘響了，點名。所有的囚犯都在走廊裏列隊站着，典獄長親自來做了一個簡短的訓話：

「你們每個人都知道從窗戶往外看和攀登窗檻是絕對禁止的。外邊的警衛奉令不論誰由窗戶往外看就不加警告立刻開槍。五個月以前發生過這麼一次意外事情，你們之中的一個人被打死了，現在你們之中又有一個巴爾多夫，也是因為攀登到窗檻上邊被槍殺了。這次事情發生之後五分鐘我親自到了他的監房裏。事情的經過是十分顯明的：這個人甚而爲了更容易攀到窗戶上還把一個床放近窗戶下邊。他已經死了。我再一次警告你們，外面的警衛受有明確的指令。我重覆一遍，除非你們想自殺，絕對沒有理由攀登你們監房的窗戶。攀登，你們就挨槍。完了，現在做你們的工去罷。」

典獄長走了之後，囚犯們一羣一夥地談論這件事情，死者是個新來的人，誰也不大知道他，不過他是沒有人緣的。到了吃午飯時候，這件事情人們差不多都忘了。

午飯後，E收到從政治部送來的一個條子。那是蘇妮雅的條子，上邊寫着：「做得漂亮！謝謝你！」他讓他的朋友看過之後把條子毀了。

「好個令人驚佩的女子！」這是E的唯一的評語。「現在我才明白爲什麼工人同盟裏的人們都對她那麼狂熱了。」

「她是生來有指揮天才的。」E的一個朋友說。「我不明白那個小子是誰呀？」

「我也不知道，」E回答。「這是蘇妮雅的技巧。她發命令，別人服從。沒有別的話說……」

「那就是說我們永遠知道了。……」

「是的，我們永遠不知道。」

E的話是對的。他們不知道巴爾多夫是一九二三年那天晚上闖進蘇妮雅房子裏的三個人之中的一個。

她從未忘記她最後一次看見他父親的那一夜。

## 第二十章 沒一個德國人活着離開巴爾幹

這兒我要介紹一個現實的英雄——格里哥羅夫 (Grigor Grigorov)。他長着一副猴子的面孔，大約三十歲，小個子，穿着華美的衣服，嘴裏總啣着紙烟。他確實是我一個最好的朋友。德國未佔索非亞之前，他是我的「秘書」。他不把我的文章信件之類整理得好好的，他也從不記得我的約會。但是除此而外，沒有他不能作的。從兇手到警察都有他最好的朋友。他和政治家，酒店老闆，牧師，女雜役交遊。沒有一個政府機關，他若想從那兒弄點什麼東西而在最短的可能時間之內弄不到的。因為他認識得用的人——構成政府機關骨幹的無名的科員們。

他的政治信仰跟我不同，或者說到了一九四〇年秋季，他才跟我的政治信仰相同了——但是他對我非常忠誠。在那時以前，他雖然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他憎恨納粹（他說他痛恨一切壓迫者，甚而稅吏也在其內！），他對於西方的民主國家不特別同情，特別是在蘇芬之戰以後，在蘇芬戰爭期間他像大多數保加利亞人一樣站在俄國方面。但是一九四〇年九月，他的態度改變了，他成了熱烈的英國的崇拜者。

我時常驚異一般的英國人沒有意識到英國長久的歷史上「最好的時機」——一九四〇年的夏季。



甚而有些英國人說法國崩潰之後希特勒沒有立時進攻英國弄了個大錯。希特勒確實弄了個大錯，但是錯在他進攻英國了。他進攻了，失敗了。英國皇家空軍小小的戰鬥機隊打破了他的白晝空中攻勢——登陸進攻的第一階段。這是重大的軍事失敗，這個失敗使他不能走上第二階段——登陸進攻。我記得索非亞德國公使館印了一項情報傳單，一九四〇年九月在保加利亞全國各地散發，這個傳單裏十分輕率地說：「當你看見這個傳單的時候，光榮的德軍已經完成對英倫三島的征服了。」

我再來說格里哥羅夫。

我被捕的時候，他想最好他也能被捕，跟我在集中營裏共患難。他罵部長，和警官吵嘴，侮辱宮廷秘書，這樣連續了好幾個星期都沒有達到目的。最後他去見權力最大的德國秘密警察的德萊克斯勒，他對德萊克斯勒說非立刻釋放我不可。否則他就向德萊克斯勒報復。結果他被捕了。但最令他煩惱的是沒有把他送到我住的集中營裏，却送到北部保加利亞的一個勞動營裏了。他在那兒拘留了三個月，最後在一九四一年夏季允許他回到了索非亞，他立時開始計劃逃走。

他努力地勇敢地計劃着。他首先想到要弄一個船，坐上這個船從保加利亞黑海沿岸渡到土耳其。他冒着生命的危險有五次秘密到了黑海沿岸的幾個港口，尋找能够幫助我們的人。他買到一個船，他立刻給它命名為加里福尼亞號，因為他一生最大的野心之一是到加里福尼亞去。他和兩個希臘人搭伴，這兩個希臘人也在被警察追尋着，所以急於逃到中東去，他們湊起錢來向一個德國人買



了一具引擎。這兩個希臘人是優秀的水手，他們把引擎安裝在船上。前途顯然十分光明了。一個寒冷的秋日我逃到了我們開船的那個沿海的小城裏。

但在最後一刻，我們的計劃被人向當地警察告密了。起因是賣給我們船的那個人突然覺得他的船沒有賣上十足的大價錢，格里哥羅夫又給了他些錢，但是他「越吃越饑」仍不滿足。於是格里哥羅夫和另一個希臘人把他打了一頓。他們自信他不至於向當局告密的，因為這個船登記的還是他的名字，倘若他告密，他也要吃麻煩的。但是他給警察寫了一封匿名信，告訴警察到我們住的房子裏逮捕我們。幸而格里哥羅夫善於交結朋友，他和當地一個警官有了交情。這個警官告訴我們趁機走開。後來查明了寫匿名信的人就是船主，他也被捕了。他完全招認，結果他的船被沒收，他也被送入監獄了。他是罪有應得，可是於我們無補。

我們離開了海岸到保加利亞東南部的斯里文(Shiro)去。沿途多受工人同盟盟員的幫助，一村又一村地走下去。斯里文是個小工業城市而且完全是「赤色的」。居民是棉織和毛織工廠的工人及其家屬，在那兒至少我們是安全的。我們住在格里哥羅夫的一個朋友家裏。

斯里文除去大約一千五百名政治犯——主要的是士兵——的一個特別監獄之外，還有個組織良好的有效的小游擊軍。當然那是個工人的軍隊，人數是變動的。我同格里哥羅夫去看它的司令部時候，我想它至多不過一百人。但是我聽說有時要增到四五百人，形成了地方的「人民軍」的核心。

奇異的是大部份工人住在斯里文城裏，在各工廠裏做工，然而這支軍隊在城北的山裏繼續着正常的  
生活。我們走了整整一天才到了那個山裏，我們逗留了一個星期，過了愉快的一個星期。格里哥羅  
夫拿出他的烹飪才能，結果他變成了一個極受歡迎的客人。

那時這個小小的游擊隊還沒有做什麼引人注意的事情。我聽說自從一九四二年春季以來他們就  
從事實際戰鬥了，但是我在他們那兒的時候，他們的領袖之一——一個索非亞大學的學生告訴我  
——他們還在訓練時期。這些工人的希望寄托在俄國紅軍未來的進展上。

「紅軍到達巴爾幹邊界的時候，」這個學生說，「我們就從背後打擊德國人。但是我們必須有  
充足的武器來做這件事情。那時候」——他的眼睛放着光——「那時候……沒有一個德國人能够活  
着離開巴爾幹的！我們還沒有武器，但是我們相信將來我們要得到武器。現在俄國紅軍正受着大的  
壓力，一切東西都須用到它的前線上。」

我們和斯里文工人處了一個月，然後動身到普洛夫狄夫去，那兒有我們的老朋友，從那兒我們  
到土耳其邊境去。這是格里哥羅夫細心想出的計劃。他得到緊住在邊界的一個農民的名字和住址。  
問題是怎樣到達位於軍事地帶的邊村，但是這個問題格里哥羅夫也解決了。他弄到了偽造的許可  
證，按照這項許可證，我們是修路工人。

格里哥羅夫說：「真的，這項許可證上唯一虛假的東西就是姓名。不久以前你和我不是當過修

逃出巴爾幹

「路工人麼？」

## 第二十一章 無人之地

我們隨着冬季的時光到了蜿蜒邊界的山嶺的附近。我們到過的那些鄉村非常偏僻，幾乎完全和外界隔離，我們落入警察之手的危險小極了。但是山離土耳其邊界很近，成了所謂軍事地帶，直接由德國軍事當局控制着。不過我們有偽造的許可證和修路工人的衣服，我們是很安全的。我們也不至於碰到認識我們的人。我和格里哥羅夫在這些村子裏漫遊，大多數村子裏有許多的德國兵，我們拼命尋找能對我們有用的人。最後我們發現了一個老農願意從一條祕密的山中小路把我們引進土耳其。他的村子只離土耳其領土幾英里，他知道他村子周圍每一英寸的地形。

不幸他害了熱病。他讓我們等着，我們等了一個星期，他告訴我們行期要無限地延長了，我們大失所望。他說他不能冒那個危險了；他得到消息說邊界上的那條路線守兵增多了。所以太危險了。我們只好自己往邊界上走。我們到了一道河給分成兩半的最後的村子。這道河已是土耳其領土。但是甚而在這兒都不能越過邊界。幾層很深的壕溝，展望哨，砲位等等攔阻我們的進路。我沮喪地看着格里哥羅夫，但是他不失望。

那天晚上，我們在鄉村酒館裏坐着的時候，一個保加利亞軍官來到我們桌子跟前，熱烈地握我



們的手。

「這是想不到的事！那一段風把你們颳到這兒來啦？」

我茫然若失，什麼都答不出來。這是我自從一九三七年以來沒有看到的一個老朋友，一九三七年他在巴黎求學。倘若他發覺我們帶着偽造的證件並且決定暴露我們真實姓名的時候我們就要在那兒被槍斃了。難道我裝作不認得他麼？格里哥羅夫已開始跟他說話了：

「請你住嘴，」他囁囁地說，「我們慢慢地講。但是我們先要點兒酒喝。你要什麼呢？」

我們知道這個年青的中尉R像在軍隊裏服務的他這一代的大多數人一樣是親俄而且同情共有的。可是那也不能保證他對於我們的冒險採取同情態度，特別是因為倘若他照拂我們，他自己要冒生命危險的。

格里哥羅夫對R說明我們的處境。R的神氣是嚴肅的。他招呼酒館主人再給我們拿酒來。他慢慢地說：

「告訴你們是我的責任。一會兒——我告訴你們。但是我要先聽聽你們的經歷。你們真實的經歷。現在你們跟我到我去住的地方去好麼？」

我們點頭，站了起來。

他住在離酒館非常近的一個破爛的小農舍裏。他佔一間小屋子，裏邊放着他的行軍牀和兩把可

以攜帶的椅子。我們坐在牀上，他從他的手提箱裏取出一些乳酪和一瓶好紅酒來，他的手提箱又當桌子用又當碗櫥用。

「真沒有辦法，」他抱歉。「我們這兒過的生活像牲畜一樣。天天如此。月月這般。這種生活的單調實在要我們的命。我寧願不論那天打了起來。」

格里哥羅夫喝了幾杯酒，開始說我們的經歷。R聚精會神地聽，不加任何批評。他不斷地吸着紙煙，吸完一支又一支。

格里哥羅夫結束說：「完了。我再沒有告訴你的了。隨便你怎樣處置我們罷。你一認出我們的時候，我便知道向你隱瞞是無用的。」

「你們這種碰運氣的辦法太危險了。」R說。

「我們再沒有別的辦法。」格里哥羅夫說。

R微笑了，又燃着一支紙煙。

「倘若你們一年前來到這兒——那時我已經在這兒了——我要毫不遲疑地把你們送交當局的。交情是交情，責任是責任。那時我要這樣想。現在我不大相信這些了。我在這個地方見的事情太多了。現在對於事情的看法不同了。」

空氣很緊張。小小的屋子裏迷漫着煙，我和格里哥羅夫靜靜地等待R的判決。

「我幫助你們離開這個村子。我今天夜裏給你們預備好一輛大車。這些大車是明天黎明到城裏往回裝運我們供應品的。」

「那簡直是把我們往虎嘴裏送。那兒到處都是警察。」

「我給你寫個安全的地址，你們到那兒去，從那兒你們可以到普洛夫狄夫。從普洛夫狄夫你們必須設法回到索非亞。」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越過這個邊界的唯一方法是按照合法手續越過。」

我們不明白，我們注視着R。

「那就是說要有某種護照和某種簽證。我把你們介紹給能夠幫助你們的人。你們用別的什麼方式都不能越過邊界。那簡直是自殺。這不是邊界，這是個前線。倘若你們穿着便衣走近邊界的任何地方，你們立刻就要挨槍的。」

「夜裏不要緊罷。」

「夜裏監視得更嚴。」

「有別人會越過去呀。」

R 搖頭。



「那不是最近幾個月的事。幾個月之前也許能夠。但是現在沒有一點兒希望了。你們要相信我——我在這兒逗久了，我什麼都知道。」

我們只好同意R。我們除去信賴R之外沒有別的選擇。我相信他不至居心出賣我們。

他接着說，「你們也許以爲我們愛當傳奇裏的人物罷。我願意幫助你們，我也曾幫助了別人。起因完全是一個女孩子——一個女人。我尊重她。我沒有跟她戀愛。我想你也許認爲她是個妓女。」

「一個妓女？」我奇異地問。

「是的，彷彿是個平庸的戀愛故事。然而不是一個戀愛的故事。是一個憎恨的故事。是無數的憎恨故事中的一個故事。在邊界這兒我聽到許多這類故事。各種人們和歐洲各地的故事。現在歐洲完全是充滿憎恨的大陸。我也懂得了憎恨它，憎恨這個可恨的制度。你們一定覺得很離奇罷。」

他中止了，然後突然問道，「你記得在巴黎的馬塞爾麼？」

「娶那個美麗的女孩子的滑冰選手麼？」

「你的意思是說你也知道佳甯麼？」

「我當然知道。」



「她現時在這兒，」

「就在這個村子裏麼？」

「她就是我談的那個女孩子。」

羅瓦葉哥拉爾街是巴黎拉丁區裏典型的小街道，又窄又彎曲，連輛汽車都幾乎走不成。我初到巴黎的時候，請求站在盧森堡公園前面的警察指給我到羅瓦葉哥拉爾街去。他在他的雜記簿裏尋找，找不着，最後不耐煩地說沒有這麼一道街。

其實這道街只有二百碼遠，就在聖米雪爾路的左邊。但是這道街太不重要太微小了。所以沒有畫在警察的地圖上。你從聖米雪爾路進了這道街，第二家房子就是羅瓦葉哥拉爾飯店，這個飯店常引以自豪的是有二十間臥室，一個浴室和一個十分美麗的巴黎型的女侍者。實際上這不是個飯店，是學生的公寓，房子很老，不大乾淨，租價便宜，但是由於女店主而出名了。女店主十分胖十分醜陋。但是她時常欣然色喜地准許房客在手頭缺錢時延期付租，當然這些房客是常常手頭缺錢的。飯店的經理沒什麼人緣，時常假借客廳壞了的口實向房客要錢，他的名字叫塞爾治，他說他的祖先是俄國貴族。可是他連一個俄國字都不說。他完全是個可疑的人物：他是女店主的情人，人們推測他們的關係純是建立在強固的金錢基礎上的，因為女店主不但又胖又醜，而且過了五十歲了。

我看見塞爾治我就討厭他。我租房間的時候，他用懷疑的眼光看着我，要我預付一星期的房錢。我當然拒絕。他也沒有堅持。不過他說最好還是我先大方一點把錢拿出來。不然更糟……以後三個星期我們要有很大的吵鬧。我把一本沉重的法律教科書打向他去，正打中他的頭，他的禿頂流起血來。若非馬塞爾出來勸阻，我要被他們打出去的。馬塞爾在那兒住了兩年了，是女店主喜愛的人物之一。他是個有趣的人。他在索非亞美國學校和我同學，他的綽號叫密西干。（因為有次考試他想不起來密西干湖的名字，沒有及格。）他提琴拉得很好，他的數學很壞。但是據我所知道的，他的出名主要地是由於一個美麗的女子，他每逢星期天要去看她。她比他大十歲，一個離婚的身材苗條的女子。我暗中羨慕馬塞爾的艷福。

馬塞爾得到學位之後到巴黎研究化學。兩年後——我在羅瓦葉哥拉爾飯店遇見他的時候，他已放棄了科學事業。他又弄起戀愛來了。佳甯是個十九歲的美麗的黃髮碧眼白膚的女子，也是個風流人物。知道她的許多學生預料他倆的戀愛也要像前者一樣半途而散。但是居然發展成正式訂婚，這真使他們驚異不止。我是一九三七年末到巴黎的，這件重大的事情剛剛過去——這在學生界裏簡直是件比人民陣線的騷動還重大的事情。

塞爾治受傷就是在紀念馬塞爾訂婚的筵會上。參加宴會的有五十個學生，而且屬於許多的國籍。法國人，美國人，俄國人——白的和赤的——斯堪狄納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希臘人，保加利

亞人。那是喜愛法國的酒和法國的學生生活的人民的國際集會。塞爾治來叫我們安靜的時候正是早晨五點鐘。大家當時拒絕了，但是我覺得讓他不帶點兒傷出去實在有傷我的尊嚴，我把一眼看到的一本書打向他去。那是佳甯的書——她讓我給她買本新的，因為塞爾治把我這項武器沒收了。

我漸漸和佳甯熟了。後來的幾個星期裏我們差不多每天要聚會——她，馬塞爾，我，和另外幾個學生。他們是在一月初幾結婚的，繼續住在羅瓦葉哥拉爾飯店。他們兩個人都很左傾，佳甯參加過許多次人民陣線示威，在一個援助西班牙政府軍的志願組織裏工作。她活潑，嬉笑，有能力。她稱我們「我的孩子們」，我想她一定像我們喜愛她似地喜愛我們。

馬塞爾的父親是索非亞一個銀行的小職員，他是個猶太人。佳甯的父親也是猶太人的後代，但是她記不起他來了。他死的時候她還是個嬰兒，她是由她的姐姐養大的，她的姐姐嫁了一個法國官吏——一個基督教徒。佳甯從不提她母親，我們聽見一個學生說她的母親撇了她的丈夫跑到南美洲去了。但是我們只對馬塞爾和佳甯感覺興趣，對他們的先人不感興趣。他們倆是幸福快樂的，他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在一起都興高采烈的……

我回到索非亞之後，馬塞爾經常給我寫信，他在一家樂曲出版公司得到一個很好的工作，佳甯在巴黎學生圖書館工作。他們租了一組房間，當然房間裏時常擁擠着從拉丁區去的他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夏天我接到一封電報叫我為他舉薦稱賀：佳甯生了一個小女兒，後來佳甯來信描寫她的孩



子跟她自己一樣好玩。

一九四〇年五月希特勒匪徒開始向巴黎進攻，我非常焦急。那個美麗的城市悲劇和佳甯與馬塞爾的悲劇無論如何在我的心裏聯成一體。淪陷的法國和巴爾幹之間的一切交通都斷了。我沒法知道我的朋友的情形。我萬萬想不到一年半之後在土保邊界一個偏僻的鄉村裏聽到了他們的經歷。

德軍佔領巴黎的最初幾天，馬塞爾和佳甯沒有受到什麼騷擾。馬塞爾在德法停戰協定簽字之前已經失業了，因為那個出版公司關門了。佳甯還在圖書館工作，不過生活也壞了，所掙的錢勉強出入相抵。一九四〇年夏天突然一件不幸臨到他們身上。他們的小女兒死了。她起初感冒，後來很快地發展成肺炎。他們沒有錢請一個好的醫生，也沒有錢購買那時已告缺乏的必需的藥品，過了幾天小女兒就死了。後來一個暗淡的十一月的早晨，馬塞爾接到了警察的一個通知叫他在兩個星期之內離開法國。因為他是保加利亞人，他可以到保加利亞公使館請領護照。但是保加利亞公使館已經遷往維琪了。他們費了些時候才弄到保加利亞護照和簽證。他們把為數不多的手頭的東西賣了大部份，湊够了買兩張到索非亞的三等火車票的錢。

但是出境護照問題依然存在。德國護照是談不到的。沒有錢沒有勢力弄不到德國護照。請求義大利領事館也沒有辦法。幾次延長了馬塞爾居住許可期限的法國警察不再忍耐了。一九四一年一月



馬塞爾被捕，佳甯又工作了一個月，也被捕了，同他的丈夫一起由警察解到未佔領區。他們從馬賽又由警察送到義大利邊境。最後幾個月的痛苦和最後的打擊使他們太受刺激了。他們不大關心自己的命運了。他們希望關在一個義大利監獄裏或者集中營裏，但是他們萬萬想不到給了他們一個經由義大利到南斯拉夫邊界的護照。到了南斯拉夫邊境他們聽說德軍已經進了保加利亞，他們到了保加利亞得拉哥曼邊境車站的時候，他們雖然有保加利亞的護照和簽證，但仍被捕了。護照檢查員抱歉說：「自從你上次到過這兒以後事勢大變了。」他一面說一面用眼瞅着在站台上來回走着的德國兵，爲的是證明他的話是對的。

馬塞爾和佳甯在得拉哥曼警察監獄裏逗了幾個星期。他們兩人分開關在兩個房子裏，馬塞爾固然很難受，但是至少能用本國的語言跟監獄當局說話。佳甯痛苦極了。那兒沒有一個人知道法國或會說法語的。他和看守唯一表達意思的工具是她還記得的斷斷續續的俄語。幾年前她曾熱烈地學習俄語，絕沒有想到用在這個地方……飯吃不飽，居住的條件壞極了。

四月六日德軍進攻南斯拉夫，佳甯和馬塞爾在監獄裏傾聽大砲的吼聲，聽見納粹的坦克在邊界那邊滾動的聲音。一星期之後他們獲釋了。警務長陞到馬其頓的一個城市裏了。他高興之餘，把這對青年夫婦釋放了。他們一到索非亞就發現馬塞爾的父親已經依照新的反猶太法被銀行革職了。他的母親患了中風，半身不遂了。但是他們見了馬塞爾和他的女人都喜歡極了，因爲他們早已認爲馬

塞爾和他的女人已經死了。他們一起在城郊的兩間鄙陋不堪的屋子裏住了兩個月。十六歲的馬塞爾的弟弟被學校開除了，也跟他們住在一起。

六月初間，一天早晨前門的鈴響。佳甯開了門。兩個警察拿着逮捕狀進來搜查。他們把全家逮捕了：老馬塞爾，他的輾轉牀榻的太太，馬塞爾，佳甯，和十六歲的孩子。警察限他們一小時之內把他們的東西捆包好，然後由警察押解到斯維稜格勒——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之間的邊境車站。警察告訴老馬塞爾說：因為他反對國家的行動，他的國籍已被取消，他和他的全家要被放逐到土耳其，這是警察總監得拉哥羅夫的命令。

老馬塞爾知道自己有法律的根據來抗辯。依據法律，保加利亞人民不論是基督徒或猶太人，不能被取消國籍。他堅持倘若有人告發他，應該把他監禁起來依法審判。他看見這種爭辯無效的時候，他請求可憐他的臥病的太太。她不能行走，而且隨時都能死。沒有護照和簽證不能進入土耳其。當地的警務長只聳了聳肩。

晚上他們開始了他們悲慘的旅行。馬塞爾攬着他的母親。一輛警察載重汽車把他們送到最後的邊境哨上。邊界守兵告訴他們說：

「你們看見遠遠的那邊麼？那是土耳其的邊境哨。最好你們一直向那兒走去。永遠不要再回到這兒來。倘若回來我們就開槍打。」

到了土耳其邊境哨，土耳其守兵不准他們進土耳其領土。他們在邊境哨上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走回保加利亞境內。士兵們給了他們一點食物，勸他們往南朝着瑪里薩河方向走，躲過邊境哨。他們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聽從這個勸告，他們又開始走。

到了瑪里薩河附近，他們看見了和他們命運相同的人。從歐洲各地來的猶太人。他們裏有許多人經過了多少困苦危險走過了六七個國家渴望實現到達遠遠的巴力斯坦的夢。有的在匈牙利被捕，被放逐，從一國邊境到另一國邊境，現在到了瑪里薩河。他們裏有許多人在這個兩國邊界之間的無人之地住了幾個月了。在德軍進攻南斯拉夫之前，成百的猶太人集聚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之間及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間的無人之地。另有許多猶太人聚在波蘭和羅馬尼亞的邊境。安多尼斯基的越入羅馬尼亞邊界的猶太人處以死刑的法令公佈之後，許多猶太人都不敢走羅馬尼亞了。有些幸運的猶太人在保加利亞找到了幫助德國勞特勞動團的工作——修路。這種猶太人數目非常之少，但是只有年青力壯的人纔能做，而且最後都要被拋到無人之地的。

過去若干月的經驗雖然使我對於本國的法西斯爪牙創造的人類痛苦的記錄覺得司空見慣，但是當我聽到無人之地的故事的時候，我由不得打了一個寒慄。R和我一樣心裏非常地煩亂。

「現在你可以明白我爲什麼憎恨這個制度了，」他說，「我看到的太多了，或者是我看到的足夠使我憎恨這個制度的了。」



「馬塞爾一家的人怎麼樣了呢？」

「老太太死了。他們在無人之地給她掘了一個墳坑，一個猶太老人朝着她的墳墓禱告禱告。馬塞爾的弟弟修路去了。馬塞爾同着一些年青的猶太人逃到別的地方去了。我不知道他逃往那兒，也不知道他是否到了目的地。恐怕沒有到了目的地。老馬塞爾同着一羣老頭子被送到薩隆尼加附近希臘邊界一帶。我聽說他從那兒又被送到阿爾巴尼亞一個勞動營裏，以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消息。我想現在恐怕他已經死了。」

「但是馬塞爾怎能把他的女人扔下走呢？」

「他沒有扔下她。她把他扔下了。」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看，我們在這兒邊境上，我們不是正常的人。兩邊都是這樣。我們在這兒逗留着，成年成月沒有任何休假。寒冷，荒涼，無窮的單調。我們永看不到一個女人。所以我們第一次看到佳甯的時候，我們的神經怎樣你就可以想像了。」

他停止住。「往下說呀，」我低聲說。

「她同幾個兵走了。我不知道那幾個兵是保加利亞兵還是土耳其兵。反正這沒有關係。他們都愛女人。而且他們在這一點上還有種友誼的諒解精神。聽起來你要打寒噤麼？是的，當一邊的兵士



把一個女人用够了的時候，他們便把她送到戰線的那邊去。我們把女人送到土耳其兵那邊，他們把女人送到我們這邊。生活污穢到極點。」

「佳甯也那樣子被交換麼？」

「是的，我在一個露天帳篷裏看見她同我的幾個兵在一起。」

「好吓人呀！」

「實際上大多數女人是自願這樣做的。否則她們就挨餓。」

「那麼你們不給無人之地裏的人們吃的麼？」

「不。可是土耳其兵和我們剩下的口糧就給了他們。那是爲數無幾的。所以年青的女人大都願意離開無人之地。」

「她們那樣就可以得到吃的了。」

「有時也能掙到錢。」

「佳甯掙到錢了麼？」

「我看見她的時候還沒有。後來我把她帶走了。這是馬塞爾一家全部的經過。」

R 在他士兵的帳篷裏看見佳甯的時候，他立刻認出了她。她也認出了他，但是她沒有說話。他

不能對士兵說什麼，於是他說了幾個無意思的笑話，向中士握手叫中士同他到帳篷外邊去。他叫中士告訴他關於佳甯他知道些什麼。中士一點兒也不知道。那天她從隣近的一個邊境哨來到他們帳篷裏。她美麗，甚而還快活，他們喜歡她。她說着古怪的保加利亞語——好像壞的俄語。早晨他們就要把她傳送到緊隣的帳篷裏。

「在她早晨到別的帳篷之前我要見她。」R微笑着說。中士敬禮，走了。

早晨，她到了他的帳篷裏。她悲苦地，聲調平板地對他述說了她的經過。她沒有哭，也沒有要求援助。她似乎一切都聽天由命了。「我太懦弱了，我沒有勇氣死，」她解釋，「我想活下去——甚而這樣子地活下去。」

R親自照顧了她幾個星期，告訴她不必再回到兵們那兒去了。她漠然地聽着。她毫無所動。後來他因公到附近一個城市，他把她交給他的一个朋友照拂。這個朋友駐在隣近一個村子裏。

「就是這個村子麼？」我問

「是的。」

「我能看看她麼？」

「倘若你願意，你就能看她。」

「爲了她，也許不看好。她住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兒附近的另一個酒館裏。軍官們在那兒吃飯。她作女侍者。」

「但是不只作女侍者罷？」

「是的，不只作女侍者。」

「這那兒是人的生活呀！」

「那不是生活。但是比起一些別的人來，她還算舒服呢。軍官們都喜歡她。」

「你常看見她麼？」

「常看見。昨天夜裏我還看見了她呢。」

「我想我還是不看她罷。但是請代我向她問候。」

x

x

x

x

x

第二天早晨我和格里哥羅夫上了一輛農民的大車。R預先吩咐了一個兵把我們送到城裏。黎明時候我們動身，過了十多分鐘到了一個俯瞰這個村子的山頂。

「你能看見邊境哨麼？」車夫問。「在那邊左面的樹林與小河中間是無人之地。」

我百感交集地注視着無人之地。那兒沒有什麼異常。小溪在清晨的靜寂中愉快地潺潺地流着。

看去好像跟任何有人之地一樣。



## 第二十二章 逃出

許多關於納粹佔領下歐洲的地下活動的小說和紀實確把獲得足可擋過德國祕密警察檢查的假護照的可能性誇大了。我從辛酸的經驗中知道有幾件事情是特別難的。我對於今天在納粹歐洲弄得這麼一個假護照的人真要佩服得五體投地。我說這話不是給自己臉上貼金，我沒有給自己弄到護照。給我弄到護照的是格里哥羅夫。

他有不倦的活力和創造的才能，但是用了他三個月的時間才把護照弄到。我當然不能洩露他的努力和冒險的詳情，不過他的努力和冒險大部份我還不知道。那時我所知道的只是格里哥羅夫利用我們的無人之地的朋友給我們的地址和一些設計獲取護照的人們認識了，此外他又用了他自己的一些微妙的關係幫助完成此事。這個需要錢，我忙着借錢，我也不知道我是否能活着把債還清。最後我們弄到了兩個克羅提亞護照——用巴維里支 (Anto Pavolich) 使僞政府的名義發的護照。這是我第一次「承認」克羅提亞國，這個納粹新秩序的妄想的產物至少對於我有了一項用處。雖然我們相信這兩個護照一旦印上簽證之後就要和真的一樣，可是我們對於兩個護照的價值仍然懷疑。

簽證問題和護照問題一樣用了多少妙計才解決的。我們靠了忠實的朋友們的幫助，我們從邊境



平安到達索非亞，我們住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格里哥羅夫只能夜間在最窮僻的處所去見他的同謀者。他又被列入警察的黑名單了，一個星期裏，便衣警察到他的住處去了兩次逮捕他。當然他們沒有在他的住處找到他。但是極端謹慎的必要又把我們動身的日期延長了。

最後一個星期六晚上格里哥羅夫告訴我簽證弄好了。簽證清清楚楚在護照上印着。這時候彷彿世界都改了樣子了——一個美麗的世界。但是能擋過德國祕密警察麼？我們希望能夠擋過。

那天夜裏我們搭到普洛夫狄夫的火車。格里哥羅夫把一切都辦好了。護照裝在一個小小的行囊裏，行囊放在我們頭上的架子上，他佯作毫不關心那個行囊的神氣。因為萬一警察認出我們，我們可以說那個行囊不是我們的，我們先前從未看見它。行囊裏邊還放着格里哥羅夫在索非亞搜集的幾封商業函件和一兩本德文書（我們兩人都不懂德文）。

直到普洛夫狄夫一路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但是過了普洛夫狄夫三個小時之後，我遇了最麻煩的事情。還是多虧格里哥羅夫特別的冷靜和急智，我們得以應付過去，若是沒有他，這部書恐怕永遠寫不出來了。

那天下午我們的火車進了邊界車站。在未到邊界車站以前的一小時，我們已經入了沒有特別軍事許可證不能走的軍事地帶。格里哥羅夫有這種許可證，但是檢查火車的軍官挑剔許可證上缺乏必要的簽字。我覺得沒有辦法了，可是格里哥羅夫的辯才依然在他身上。他解釋：「我們的許可證是

上校親自簽字的，因此我們就不願意麻煩地辦全套的手續了。」軍官問那一個上校。他立刻把上校的姓名答了出來，他還說上校是他的舅舅，上校是個很有人緣的人——帶點兒警告的語氣——他就要陞爲將官了。軍官有點兒畏敬的樣子走去了。

（其實這個上校只在格里哥羅夫的想像裏有。）

後來檢查我們的人是個便衣警察，他問我們究竟到那兒去（車上滿是到邊界去的德國兵和保加利亞兵，只有我們兩個人是平民）。格里哥羅夫回答說我們是爲了買賣出來的。我們是肉商，和德軍訂有合同，供給德軍吃的肉。他問我們爲什麼沒有祕密警察的特別許可證呢？格里哥羅夫說因爲城裏的祕密警察大隊長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們是同班同學，格里哥羅夫是他的未婚妹夫，當然我們下車之後就住在他家裏，他說的逼真入神，連我自己都幾乎相信了。

我們下車之後，煩惱來了。保加利亞和土耳其已經沒有直接的鐵路交通。瑪里薩河上的橋在巴爾幹閃擊戰時已被炸毀，德國工程師雖在加工趕修，但是還沒有完成。所以從保加利亞到土耳其和從土耳其到保加利亞的旅客不得不坐汽車。兩邊都是軍事地帶。土耳其的軍事當局和保加利亞的（德國的）軍事當局只准自己的汽車駛入軍事地帶。

我們下了火車，格里哥羅夫立刻到廁所裏去毀掉我們已經用不着的許可證。從此以後我們就倚賴我們的護照了。幸而先前查詢我們的警察只在火車上值班，否則他要看見我們進了爲出國旅客預

備的小小的候車室，格里哥羅夫對他講的那些天才的創造很快就崩潰了。候車室裏已有六個普魯士面孔的「旅客」，還有三個義大利人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倫不類的乘客。我們把護照交給了保加利亞當局，沒有半點鐘便拿回來了。我出了一口長氣，格里哥羅夫向我皺了皺眉。他用鼓勵的口吻低聲說：「還有一關呢，最難的一關！」

他對了。緊接着就是德國邊境當局——換句話說就是德國秘密警察。我和格里哥羅夫的名字都在秘密警察的文件夾子裏，文件上有我們的照片和有關於的記錄。我想他們認不出來我們的機會太少了。格里哥羅夫喃喃地說着「不冒險者無所獲」。我覺得這是個很冷的慰藉。

我們前邊是一個義大利的人，一個德國人，和一個始終沉默的不明國籍的人，我們上了汽車。司機的旁邊坐着一個保加利亞兵緊握住他的槍。我們聽說德國當局把我們的護照檢驗完了拿來之後，汽車立刻開到土耳其邊界。義大利人說檢驗護照往往需要半小時的工夫。

半小時過去了，一小時，一小時半過去了。我竭力隱飾我的不安。格里哥羅夫吸煙。兩小時過去了。護照還沒有送回來。司機漠然地說：「一定有什麼毛病。他們沒有讓我們等過這麼長的時候。」

我覺得我要暈倒了。義大利人用拙劣的法文埋怨天氣冷。沉默的人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法文小說亂翻着看。我對格里哥羅夫說我覺得疲困。我把我的帽子拉下遮住我的眼睛，向後一靠裝睡。格里



哥羅夫也學我，但是他和我不同，他真入睡了。

每分鐘都彷彿有無限的沉重壓在我身上。我盡力使我的思想離開可詛咒的護照，想些有趣的事物來排除我的憂慮。我回到我最喜愛的問題——巴爾幹人的團結。巴爾幹人正在血和破壞的紛擾之中。就在這個車裏——保加利亞兵的刺刀在我的眼前，我左邊坐着一個德國人，右邊坐着一個義大利人——三個都是巴爾幹分裂與壓迫的同義字。就在這個車裏，我第一次想到倘若我能通過「還有一關——最難的一關，」我要寫這麼一部書。

那時我想我要把現在巴爾幹的真相和未來最可能的形勢，不懷一點偏見和如意的想法，描繪出來讓大膽的公正的讀者看。

毫無疑問，這本書使我在德國秘密警察文件中的地位更要陞高了。德國秘密警察的非難算不了什麼，他們認為凡是反對他們的壓迫政治和他們的貪污的人們都受英美俄的支持和津貼。我也不管在英美流亡的某些巴爾幹政界人士的異議。因為在英美有些巴爾幹人士依然按照邊界領土和戰略邊界來考慮問題，依然懷着佔取鄰國領土和用賠款方式毀滅一個巴爾幹國家的幻想，他們依然緊緊握住過去，不承認現在，也不敢正視將來。

我對於那塊巴爾幹領土該屬於那個巴爾幹國家的假定的爭論不感興趣。我已經強調過這些領土



屬於全體巴爾幹人民。這些人民的問題是社會的，不是國家的。我們的政府不大刀潤斧地解決社會問題，却用人爲的容易燃燒的國家主義火焰溫暖着民心。

我憎恨塞爾維亞極端的國家主義，希臘極端的國家主義，我同樣憎恨保加利亞國家主義和羅馬尼亞國家主義。我認爲這種國家主義運動是危害整個巴爾幹的。大多數巴爾幹人民——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羅馬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克羅特人，斯洛文尼亞人——確實爲了他們的國家主義者狂妄的誘惑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他們的國家主義者在愛國外單之上給了人民不可言狀的傷害和無限的痛苦。例如羅馬尼亞的安多尼斯哥元帥「爲了響應希特勒的反共十字軍」的呼號屠殺了無數的青年，羅馬尼亞能在三十年甚而五十年之內從安多尼斯哥這種瘋狂的國家主義摧殘中恢復元氣麼？

巴爾幹一切國家主義者都反對巴爾幹團結的思想，損害人民的利益。但是我想我盼禱他們是屬於過去的東西。將來他們在巴爾幹的地位恐怕微不足道了。

自從上次大戰以來，巴爾幹各國政府就利用「共產黨」這個籤條獲取自私的便利。現在尤其如此。在貝格萊德建立了傀儡政府的納粹代理人內狄支把一切反對他的賣國政治的塞爾維亞人，指爲「共產黨」。克羅特傀儡國的領袖對於克羅特人也是如此。羅馬尼亞的安多尼斯哥對於膽敢抨擊他的對德合作的人均目爲「共產黨人」，處以死刑。鮑里斯也用同樣的藉口在保加利亞殺了成千動萬

的保加利亞人，馬其頓人和希臘人。雅典的希臘傀儡總理指責向征服希臘的敵人作戰的游擊隊是「共產黨」。地拉納（阿爾巴尼亞京城）的法西斯黨人說甚而在阿爾巴尼亞山裏革命的游擊運動也是很活躍的。

這都不是新的東西。現在巴爾幹向納粹主義及其同類壓迫進行鬥爭的人們在德軍佔領他們領土時他們還沒有開始作戰。他們就是在宣戰很久以前向鮑利斯，加羅爾，保羅，和希臘獨裁者鬥爭的那些人。

倘若我們記住過去十年裏巴爾幹半島沒一個國家有過任何自由選舉這個事實，巴爾幹的形勢便更容易瞭解了。巴爾幹各國政府宣佈革命的政黨是非法的，監禁殺戮它們的領袖，破壞它們的組織。凡非政府包辦的勞動組合運動和工人協會都不准存在。

巴爾幹的如火如荼的革命現象是政府與人民分離的結果。巴爾幹各國政府認為自己是對政策擔負全責和只對自己負責的全能政府。人民的團體，人民的政黨，和人民的勞動組合組織被宣佈為「違反國家利益」的東西。戰爭爆發的時候，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希臘的一切政黨都被禁止。保加利亞的鮑利斯，羅馬尼亞的加羅爾，南斯拉夫的保羅及斯多雅丁諾維支和希臘的美塔克薩斯都是出類拔萃的法西斯獨裁者。希臘人民所以英勇反抗法西斯侵略者，因為他們在國內已經受過本國法西斯統治者的壓迫，他們深知這種壓迫是什麼滋味。

所以在納粹來到之前領導反壓迫鬥爭的人們今天成爲反抗軸心的主要動力是不足爲異的。巴爾幹內戰必然導致歐洲內戰，我們要避免巴爾幹內戰，我們必須從現實方面去看巴爾幹問題。

x  
x  
x  
x  
x

「逮捕他！」

我的政治夢破碎了。一個德國祕密警察，一個保加利亞軍官，和兩個兵站在車門口。他們一直看着我。完了。我用臂肘輕輕推動格里哥羅夫，他揉擦他的眼睛。保加利亞軍官仔細地看一個護照上的照片——我心裏想那一定是我的照片。

後來他問：「你們那一個叫拉辛斯基？」

「我是。」沉默的那個人用俄語回答。

「逮捕他。」軍官重覆說。

兩個兵把那人拉出車外，他蹣跚地走向警察房子。兩個兵陪走在他的兩旁。那個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跟着他進了警察房子。

「他們爲什麼逮捕他呢？」最後格里哥羅夫問道。

「他的護照可疑。」司機大聲地說。他等了三個小時，少掙了錢，非常不高興。但是車終於開



了……

我同格里哥羅夫在無人之地的雪裏走向土耳其領土，我越走越快。我到了土耳其邊境才發覺我在跑呢。

「你彷彿糊塗了罷。」義大利人說。

格里哥夫回過頭去罵他：「你管不着，你個法西斯豬仔！」

我還不大清楚，驚異地注視着格里哥羅夫。我看見他的放光的臉的時候，我才知道我們真逃出來了。這是土耳其領土。

義大利人溜開了，格里哥羅夫笑：

「我想說那句話已經好幾個月了，來，我們找個喝酒的地方。」

邊境哨左邊有個小小的酒館。我們要了許多拉齊酒，喝了幾杯之後，一個漂亮的瘦長的青年來到我們桌子跟前。

「你們說俄國話麼？」

「說……」

「我的名字叫西曼斯基。」



他是個波蘭人。一個年青的波蘭軍官，他同一個朋友從匈牙利一個集中營裏逃出，在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山裏及村子裏藏了幾個月。最後他們設法弄到假護照，決定到土耳其。他過了邊界，他的朋友被捕了。

「他就是車裏的那個人」  
他往窗外凝視。

「我也許回去……」他喃喃地說。

我想不出什麼說的。我只說：「我們喝酒罷。」

「我們喝酒罷。」這個波蘭人也說。

格里哥羅夫又要了些酒。我給這個波蘭人斟滿了杯，滿得溢在桌布上了。那個義大利人在相當遠的座位上注視我們。我們繼續喝。格里哥羅夫舉觴稱祝：

「自由！」

這個祝詞太令我們興奮了，我們又喝了許多。

